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論文



革命群眾報刊視野下的地方文革：
以重慶、武漢爲例（1966—1968）

指導教授：楊開煌博士

碩士研究生 許陳品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摘要

1966年，中國現代史上爆發一場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由中共最高領導人所發動，數千萬青年響應，做出許多難以理解的瘋狂行徑，例如「破四舊」、使用熱兵器的大武鬥，嚴重衝擊當時的黨政機關與社會秩序，甚至徹底洗滌了中國人的內心。官方宣稱的文革已經結束了近40年，卻仍有許多老人挺身而出，對著媒體述說著往日的故事，懺悔昔日的罪過。

是什麼原因讓這些老人願意在遲暮之年揭開傷疤悔過？甚至開記者會或登報道歉？儘管有個人的回憶錄紛紛問世，中國大陸媒體也在2013年的夏秋之際密集報導紅衛兵懺悔的種種故事，但那都屬於個人的故事，過於瑣碎。要重建歷史現場，除了高層政治活動以及底層群眾的回憶，筆者試圖使用基層革命群眾組織報刊（又稱文革小報、紅衛兵小報），去揭示一個廣泛具有群眾基礎，卻又代表地方基層觀點的「文革」。

筆者希冀能用「文革」研究去釐清一些歷史真相，還原本來面貌，也為了療癒廣大曾受這場政治運動迫害的民眾，達成生命、心靈上的救贖。因為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被遺忘。

關鍵字：文化大革命、革命群眾報刊、文革小報、紅衛兵小報

目次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文革」的史料依據.....	4
第三節 文獻回顧.....	8
第四節 研究途徑.....	12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4
第二章 「文革小報」的理論根源.....	15
第一節 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對於新聞媒體的態度.....	15
第二節 「文革」前夕中共對報業的管理.....	23
第三節 「文革」初期的新聞界奪權與小報的萌發.....	28
第三章 革命群眾報刊的功能	39
第一節 爭奪印刷工具與輿論戰.....	39
第二節 中共中央文件與紅衛兵批判地方領導人的關聯.....	44
第三節 對中共中央領導人言論、「兩報一刊」社論的反應	47
第四節 革命群眾報刊的其他面向.....	52
第四章 革命群眾組織報刊編輯以及經歷者的反思.....	58
第一節 《八·一五戰報》主編周孜仁（重慶，「八一五」派）	58
第二節 「六大司令部」總勤務組組長李木森（重慶，「反到底」派） ..	66
第三節 《新華工報》編輯魯禮安（武漢，「新華工」）	72
第五章 結論.....	77
第一節 參與者對「文革」的懺悔.....	77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中共定義的報刊功能.....	80
第三節 革命群眾報刊對於「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	84
參考文獻.....	101
附錄	
表一 2013-2014 年關於「紅衛兵道歉」之媒體報導.....	1
表二 重慶日報沿革.....	30
表三 武漢地區「革命小報」報導主題統計.....	56
表四 重慶武鬥大事紀.....	87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3年夏天，中國大陸雜誌《炎黃春秋》突然發表了一則「道歉廣告」¹，署名是前山東省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長劉伯勤，爲了「文革」初年錯誤的批鬥師長，誠懇的登報道歉。看似普通的一則讀者來信，豈料引起了中國媒體的廣大迴響。從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間，筆者觀察到廣州《南方都市報》、北京《新京報》、長沙《瀟湘晨報》、共青團的《中國青年報》、《中國新聞周刊》等媒體陸續刊登了關於「紅衛兵道歉」以及相關評論文章，共計有17篇之多（見表一）。

表一 2013-2014年關於「紅衛兵道歉」之媒體報導 作者製表

作者名	文章名	報導媒體	報導年月
劉伯勤	鄭重道歉	《炎黃春秋》	2013.06
高龍	那個瘋狂年代，把人性惡的一面全激發出來了	《南方都市報》	2013.06.18
程仕才	紅衛兵道歉，個體反思彌足珍貴 紅衛兵登廣告向受害者道歉	《新京報》A02版 《新京報》A22版	2013.06.19
宋繼超	我也來道個歉	《南方周末》第1531期	2013.06.20
盧嘉善	這句對不起壓在心頭40多年	《快樂老人報》第14版	2013.06.27
范承剛等	「我們仍是少數」—「文革」懺悔者的努力與困頓	《南方周末》第1535期	2013.07.18
王歡 等	趟過45年的心靈救贖	《瀟湘晨報》A05版	2013.07.27
朱柳笛	一名紅衛兵的懺悔：永不饒恕自己 「弑母」	《新京報》A24版	2013.08.07
王晶晶	遲到的懺悔	《中國青年報》第12版	2013.08.14
社論	遲到的公民懺悔在爲民族清「毒素」	《南方都市報》AA02版	2013.08.15
陳小魯	陳小魯反思文革真誠道歉 爲心道歉—元帥之子與同學直面往事 造反學生47年後向老師鞠躬	南方網 《中國青年報》	2013.08.21 2013.10.15
張鳴	再不道歉就遲了	《中國青年報》02版	2013.08.23
劉丹青	我們爲什麼懺悔	《中國新聞周刊》總第626期	2013.09.02

¹ 劉伯勤，〈鄭重道歉〉，《炎黃春秋》（2013年第6期，總第255期），頁83。

作者名	文章名	報導媒體	報導年月
朱柳笛、張寒	北師大女附中部分參與文革學生道歉	《新京報》A15 版	2014.01.13
劉霄	武鬥懺悔者楊里克：開槍是為了掩飾膽怯	《廉政瞭望》2014 年第 7 期	2014.04.01

其中最受人矚目的，即已故解放軍「十大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以及「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陳小魯在「文革」期間是北京市第八中學高三學生、該校革命委員會主任，其道歉聲明稱：

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鬥過校領導，後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今天我想藉網絡向他們表達我真誠的道歉，.....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²

（上述陳小魯的道歉聲明，已於 2013 年 10 月 15 日的《中國青年報》中，〈為心道歉—元帥之子與同學直面往事 造反學生 47 年後向老師鞠躬〉³一文證實確有此事。）

宋彬彬在文革爆發時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革命師生代表會」副主席，她在 2014 年 1 月 12 日的見面會上稱：「卞校長⁴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劉進⁵曾兩次阻止，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就走了。」「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裝。」「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⁶宋只將責任歸咎於沒有保

² http://news.southcn.com/c/2013-08/21/content_76928826.htm，

陳小魯，〈陳小魯反思文革真誠道歉〉，南方網，檢索日期 2013 年 8 月 22 日。

³ http://zqb.cyol.com/html/2013-10/15/nw.D110000zgqnb_20131015_1-03.htm，

林衍、高四維，〈為心道歉—元帥之子與同學直面往事 造反學生 47 年後向老師鞠躬〉，《中國青年報》03 版，檢索日期 2013 年 10 月 15 日。

⁴ 卞仲耘，時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中共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

⁵ 劉進，「文革」爆發時北師大女附中的「革命師生代表會」主席。

⁶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1/13/content_489922.htm?div=-1，

朱柳笛、張寒，〈北師大女附中部分參與文革學生道歉〉，《新京報》A15 版，2014 年 1 月 13 日，

護好遭批鬥的人員，迴避了作為革命群眾組織領導人約束組織成員之責任。

然而道歉卻不是每個當事人或家屬可以接受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於2014年1月27日公開發表聲明，斥責宋彬彬、劉進以「『沒有有效阻止』、『沒有保護好』、『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開脫了她們在『八五事件』中應負的責任」，並指稱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殺害卞仲耘的兇手，當時紅衛兵也並未救治卞，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之前，拒絕接受宋、劉等人「虛偽的道歉」⁷。

事實上，早在2008年就已經有曾經落戶到陝北的北京知青王克明，為當年毆打前大隊書記谷志有的往事，有著深刻反思，並稱：「個人的懺悔反思具有反抗非民主的人性價值……不要放棄對災難的記憶，否則災難會降臨於你。」⁸王文為筆者目前搜集到最早的紅衛兵道歉文。很可惜的是，在當年並沒有輿論界廣泛的注意。到了2010年，王友琴於發表〈「帶了個好頭」：紅衛兵道歉〉⁹一文，公開展示當年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申小珂、胡濱，向該校前黨總支書記程璧的道歉信。然而該文僅僅引起南方周末網站、《中國青年報》的各兩篇評論¹⁰，並未有如2013年夏季爆炸性的反思風潮。

作者觀察到親歷者噤聲的原因，如同劉伯勤的家人所說：「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認為你是惡棍了」¹¹；或者是長期的鬥爭經歷讓他們害怕「犯錯誤」或「惹麻煩」，在過去政治運動中受批鬥的老師們則認為：「你怎麼還提那些事情？過去

檢索日期 2014 年 1 月 13 日。

⁷ <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4-02/2255105.html>，

〈文革受害校長丈夫拒受道歉 斥責宋彬彬虛偽〉，大公網，2014年2月1日，檢索日期2014年2月2日。

⁸ 王克明，〈我打谷志有〉，《炎黃春秋》2008年第5期，頁67。

⁹ 王友琴，〈「帶了個好頭」：紅衛兵道歉〉，《南方周末》E23版，2010年10月21日。

¹⁰ <http://www.infzm.com/content/52202>，朝格圖、楊繼斌，〈歷史深處的來信〉，南方周末網站，第1394期，2010年11月5日，檢索日期2013年10月15日；

王波，〈紅衛兵懺悔記〉，《中國青年報》，2010年11月10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52173>，楊繼斌、朝格圖，〈一個開始，只能是一個開始〉，南方周末網站，2010年11月10日，檢索日期2013年10月15日；

黃秀輝，〈我們為什麼要懺悔〉，《中國青年報》，2010年11月11日。

¹¹ 程仕才，〈紅衛兵道歉，個體反思彌足珍貴〉，《新京報》A02版，2013年6月19日。

的事就過去了。」¹²其中以王克明說的最為真誠，他說：「道歉之所以難，在於有否定自己的東西在裡面。」¹³許多人並不見得是不願面對歷史，而是害怕否定自己，故避而不談；而受害者們經歷長期精神上的折磨，出現了「選擇性遺忘」。但是這種「選擇性遺忘」，以及「法不責眾」的傳統，正成了加害者迴避的藉口。

中國共產黨在 1981 年對「文革」做出歷史評價，特別是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標誌，由官方正式徹底否定長達「十年」的「文革」，並稱其為「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¹⁴而且，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曾針對「文革」說：「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結語講我們黨還是偉大的，勇於面對自己的錯誤，勇於糾正自己的錯誤。」¹⁵然而，為什麼在這個運動結束的 36 年後，官方已經定調否定「文革」、對此事「集體負責」，而且已經「糾錯」，卻仍然還有這麼多當年的紅衛兵至今耿耿於懷、心懷愧疚，需要用公開的登報道歉，甚至是開同學會的形式來達成「自我救贖」呢？「文革」除了高層的路線之爭，以及個人際遇，介於兩者之間的基層群眾組織對「革命」抱持什麼樣的想法？群眾組織所理解的「文革」是什麼樣的景象？在「文革」期間，中央權威是否真的對地方失去控制？紅衛兵組織當年又做了什麼樣的行為才需要多年後來悔過？

第二節 研究「文革」群眾報刊的史料依據

本文之目的，在於利用群眾報刊檢視地方「文革」，本節就與「文革」相關的官方文獻與媒體、群眾報刊，以及革命群眾的個人回憶錄作介紹。

¹² <http://www.infzm.com/content/92485>，記者范承剛，實習生 蘇桐、廖梅、周楠、潘夢琪，〈「我們仍是少數」—「文革」懺悔者的努力與困頓〉，《南方週末》第 1535 期，2013 年 7 月 18 日，檢索日期 2013 年 9 月 9 日。

¹³ <http://politics.inewsweek.cn/20130902/detail-70387-all.html>，劉丹青，〈我們為什麼懺悔〉，《中國新聞周刊》總第 626 期，2013 年 9 月 2 日，檢索日期 2013 年 9 月 3 日。

¹⁴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 年 6 月 27 日。

¹⁵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296。

一、中國大陸的官方文獻與媒體

1. 《人民日報》

雖然中共宣稱「文革」已於 1976 年 10 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時結束，國家邁向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事實上，在 1976 年 10 月之後《人民日報》仍然繼續刊載頌揚「文革」的文章，例如中共河北省委的文章〈「四人幫」破壞文化大革命罪責難逃〉稱：「重溫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教導，……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把毛主席開創的革命事業進行到底。」¹⁶甚至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都說：「由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¹⁷，僅將「四人幫」倒台視為「第一次文革」的結束，言下之意，革命不會結束，也許還會進行第二個、第三個「文革」。

2.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與十二大政治報告

1981 年 6 月底《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布，將「文革」正式定調，隔年中共召開十二大時，胡耀邦做政治報告推翻了十一大肯定「文革」的立場，他說：

「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傾錯誤，影響很深廣，危害很嚴重。……在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但是，這次大會的政治報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這就起了嚴重阻撓撥亂反正的消極作用。¹⁸

之後《人民日報》刊載〈第五部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學習《關於建國

¹⁶ 中共河北省委大批判組，〈「四人幫」破壞文化大革命罪責難逃〉，《人民日報》1976 年 12 月 16 日第三版。

¹⁷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449/4526440.html>，華國鋒，《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1977 年 8 月 12 日，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檢索日期：2013 年 6 月 9 日。

¹⁸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448/4526430.html>，《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胡耀邦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82 年 9 月 8 日，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檢索日期：2013 年 6 月 9 日。

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5))¹⁹一文，以及社論〈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²⁰一出，使得中共各地黨委紛紛表態支持中央立場²¹。意即「文革」結束的1976年至1981年間，中共黨內的認識才逐漸由讚揚「文革」轉為否定「文革」。

3. 新華網

進入廿一世紀後，網絡的發達促進了資訊的傳播。而最近一次中共官方在公開場合提及「文革」，並見諸網站上，是在2012年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的閉幕記者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說：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雖然作出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²²

溫家寶談話主旨雖然只是當代的「政治體制改革」，但也不忘回首「文革」，將其作為重要的歷史教訓，並認為改革不繼續，「文革」就會重新發生。「文革」也就成為中共至今非常重要的歷史教訓與政治遺產。

二、「文革」時代的出版物：革命群眾報刊

中共在建政前，對私營報刊的態度是選擇性的管理，例如在國共內戰期間，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新解放城市中中外報刊通訊社處理辦法的決定》²³，將解放區的國民黨政府及各「反動黨派」組織發行之報紙、刊物、通訊社全部接收；對於同情人民解放戰爭或持中立立場的私營媒體，應予以保護並令其向政府登記。

¹⁹ 〈第五部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學習《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5)〉，《人民日報》1981年7月17日第二版。

²⁰ 〈就是要徹底定「文革」〉，《人民日報》1984年4月23日第一版。

²¹ 例如《遼寧日報》1984年4月30日刊載的〈不能用「響應號召」做掩飾—談就是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轉引自人民日報1984年5月6日第四版。以及〈從理論上思想上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北京市對首批整黨單位認真補課〉，《人民日報》1984年10月17日第一版。

²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lh/zhibo/zongli/wz.htm>，〈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見中外記者〉，新華網，2012年3月14日，檢索日期：2013年6月9日。

²³ 《中共中央關於新解放城市中中外報刊通訊社處理辦法的決定》，1948年11月8日，<http://www.cmjc.zju.edu.cn/old/cmjkj/web-zqxwsys/fujia/10-22.html>，檢索日期：2012年12月13日。

國共內戰大勢底定後，中共在 1949 年 10 月的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相隔不到半年，據 1950 年 2 月底統計，當時全中國尚存私營報紙 55 家²⁴，而 1950 年全大陸有各類鉛印報紙 382 種²⁵，私營報紙在中國如此遼闊的地域僅僅佔 14.3%，可謂鳳毛麟角。在「社會主義改造」政策快速推動下，至 1953 年所有尚存的私營報紙都進行了公私合營²⁶，意即當時的中國已經沒有獨立辦報的自由。也因為如此，革命群眾報刊的出現更具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

在 1966 年 5 月 25 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發表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鼓吹開大會、寫大字報，經同年 6 月 2 日《人民日報》的轉載，特別是毛澤東對該文的批語：「康生、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²⁷後毛又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說：

整風，關門整風才不行哩！過去《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裏，中宣部不在我們手裏，文化部不在我們手裏，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裏，這些都不在我們手裏。不發表聶元梓那樣的大字報，那才不行哩！²⁸

上述這些都間接形成對「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肯定；王家平認為，這象徵中共中央對新聞與出版自由的放鬆，所有群眾組織都可依自己意願，創辦、編輯、發行該組織的刊物²⁹，在該年的 6 月份，單是北京的清華大學就出現了六萬五千張大字報³⁰，上海的大字報在 6 月 18 日就已達到八

²⁴ 轉引自 李斯頤，〈也談建國初期私營傳媒消亡的原因〉，《當代中國史研究》第 16 卷第 3 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2009），頁 26。原載於 方漢奇等，《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 3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頁 3-17。

²⁵ 葉言都，《臺海分治初期兩岸報業之比較分析（1949-1958）》，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9 年 12 月，頁 40。

²⁶ 曾憲明，〈解放初期大陸私營報業消亡過程的歷史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 年第 2 期（北京：新聞與傳播研究編輯部，2002），頁 77。

²⁷ 毛澤東，〈關於播發《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大字報的批語〉，1966 年 6 月 1 日。收錄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年）。

²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 601。1966 年 7 月 24 日。

²⁹ 王家平，〈紅衛兵詩歌研究〉（臺北：五南，2002），頁 2。

³⁰ 轉引自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rick MacFarquhar）、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著，

萬八千張³¹。「文革小報」就在如此的社會氣氛下，受到「政治正確」的肯定，形成大量發行的現象，這也是筆者在本文欲討論的重點之一。

三、 革命群眾個人之回憶錄

王紹光認為，中共在《建國以來歷史決議》迴避了群眾在文革中的作用，只提到「『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³²若「文革」脫離群眾，又是誰構成了這麼大的一場群眾運動的社會基礎？很顯然的，很重要的群眾基礎就是以大中學生為主的紅衛兵。

紅衛兵作為行動的主體，在「文革」結束後，曾經當過紅衛兵的民眾也透過書寫回憶錄的方式，對過去的「往日事蹟」做出交代。例如重慶大學紅衛兵組織的刊物《八一五戰報》主編周孜仁、重慶工人組織領導人李木森、武漢華中工學院學生、《新華工報》編輯魯禮安、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陳煥仁等，都以第一人稱視角敘述他們所經歷過的「文革」。

筆者目前的觀察發現，對「文革」時期的研究似乎出現了一種現象：以官方「獨佔性的話語」為主，同時造成個人與基層無法自由表達意志的「失語」狀態。由於《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官方文件與十二大政治報告的影響力，使得對「文革」的歷史評價已經從上而下的「定調」，限制了對「文革」這項歷史事實的解釋空間。除了上述現象，研究者也缺乏深入探究小眾媒體（例如革命群眾報刊、大字報）對於大眾媒體（例如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影響力及其意義。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 對革命群眾報刊之研究

(一) 革命群眾報刊的定義

關心 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臺北：左岸文化，2009），頁 84；原載於 新師大文革籌委會，《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上冊（上海：1966），頁 1、27。

³¹ 王家平，《紅衛兵詩歌研究》，頁 84；原載於《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上冊（上海：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2），頁 35-37。

³²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 2-3。

本文探討的文本資料「革命群眾報刊」（以下簡稱「文革小報」），並非是一般性的期刊或報紙，而是在特定時空中，由革命群眾組織所刊行的特殊報刊。根據王家平的研究，全中國最早的革命群眾報刊創刊於 1966 年 8 月 22 日的北京，刊名為《新北大》³³，此後「文革小報」如雨後村筍般的冒出。這些報紙版面有大有小，常以 8 開大小的版型為主，且多由三、四人組成的小團體所編輯、印行，故稱為「小報」。然而當時的紅衛兵刊物，編輯者一般都不會署名，而是署「某某戰鬥組」、「某某編輯部」，周孜仁指出，這是由於避免突出個人，萬一出了問題，責任可由組織集體共同承擔³⁴。如此一來，革命群眾報刊編輯者之名經常闕而弗錄。

（二）學者對革命群眾報刊的研究概況

從筆者搜集到的文獻中，印紅標早在 1992 年就關注到「文革小報」。他指出「文革小報」不爲了營利，編輯群也不支薪，是專門爲了「文化大革命」吶喊呼號。「文革小報」編輯部未納入黨政部門的組織體系、未設立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也無總編輯負責制。出版未經或無須向有關部門申請、登記註冊。出刊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多爲不定期出刊，能辦則辦，辦不下去就停刊。以重慶《八一五戰報》爲例，從 1967 年 1 月 27 日的第八期後開始休刊，到同年 2 月 17 日第九期復刊號出版（中間相隔 20 天），且在該刊第九期刊登〈告讀者〉：「爲了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運動的大方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應廣大工農兵群眾的強烈要求，我報決定從本期起暫行復刊。」³⁵

根據何理的統計，在北京出版的近千種報紙中，連續出刊超過 10 期的有 185 種，出刊 2 至 9 期的超過 700 種，僅出版 1 期的有 61 種，出刊最多的是《新北大》，共有 200 期，其次是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已知有 156 期。它們經常披露正式報刊所不刊登、而又引人注目的「小道消息」。所有這一切使「文革小報」

³³ 王家平，〈紅衛兵小報及其詩歌的基本型態〉，《文藝爭鳴》2000 年第 6 期（吉林：文藝爭鳴雜誌社，2000），頁 4。

³⁴ 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台北：新銳文創，2012），頁 33。

³⁵ 〈告讀者〉，《八·一五戰報》第九期，第 2 版，1967 年 2 月 17 日。

帶有強烈的非正式、非官方色彩，這就是被稱作「小報」的主要原因³⁶。

印紅標認為，「文革小報」就是群眾組織的喉舌，例如臨時權力機構性質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籌備委員會)，群眾組織或群眾組織的聯合體，為某一專題而組成的聯絡站，幾個志同道合者以某組織名義辦報³⁷，都可以是「文革小報」的主辦者，來源十分多元。他也歸納出「文革小報」的主要功能：**1.**刊登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們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相關指示。**2.**刊發群眾組織的文件。**3.**政治評論，同時也反映了基層群眾的思想狀態，例如：對業已存在的社會弊病（對官僚主義、特權、腐化現象）之憎惡，以及追求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還有對平均主義、軍事共產主義的崇尚，在工業化過程中經濟管理體制的不滿，對世界潮流的無知也在其中。**4.**時事新聞。例如「文革」初期群眾及部分領導人的大量活動。³⁸

然而印紅標此文也許受限於當時政治氣氛或資料蒐集不易，主要集中介紹北京的「文革小報」概況，例如講述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新北大》、北師大的《井岡山》，著墨在統計北京地區各種「文革小報」主辦單位和辦報人，對北京以外地區的情況不甚瞭解。其次，文中提及 1967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發佈的〈關於改進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並且十分彰顯該文件的作用，甚至稱其為「在這樣的監督和指導下，兩年間，小報的出版發行雖然有違背當時中央宣傳政策的現象，但就總體方向而言，是緊跟毛澤東及其「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部署，為宣傳「文化大革命」服務的。」³⁹根據何蜀的研究，革命群眾組織雖然不違背「革命」的大潮流，但未嚴格遵守該文件第 2 至第 7 點的指示，代表在具體細節上，大多時候是違背文件精神的。（關於此文件，筆者在第二章第三節中另有詳述。）

除了印紅標的研究，古陽木也對革命群眾報刊做出介紹與評價。古認為「文

³⁶ 印紅標，〈文革中的群眾組織小報〉，《新聞與傳播研究》1992 年第 1 期，頁 146-147。

³⁷ 同註 36，頁 155-156。

³⁸ 同註 36，頁 157-159。

³⁹ 同註 38，頁 154。

革」時期的新聞、報刊發展並未有概括的研究，仍處於空白階段，亟待學界加以夯實。而藉由對「紅衛兵報刊」的研究，可填補中國現代報刊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史的文革空白時期。古陽木文中敘述「紅衛兵報刊」的興起背景、內容、銷售通路，甚至受到毛澤東的注意，大量閱讀小報。最後卻總結「『紅衛兵報刊』是一種錯誤的歷史陳跡，對其內容，除少數專門研究者外，不應當任其傳播。……作為一種扭曲的文化現象。」⁴⁰ 在史料價值上，古是將其否定的。

郭若平對「文革小報」有了更系統的描述。他的觀點可以總結為三點：1. 地區「文革小報」提供了不同於中央觀點的地方性視角，也為地方政治運動的分層結構提供了原始素材。2. 「文革小報」同時擁有「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雙重歷史敘事」，「不但能用來表述文革的地方史，同時還以互證互釋的方式，印證地方文革史敘事與上層文革史敘事的相互關聯。」3. 突顯了「文革小報」的史料價值—「維繫『文革』政治運動分層歷史的可表達性資源」、「重構地方文革史」⁴¹。但郭還是對「文革小報」持批判、否定的態度，他認為「『小報』大都以極『左』的『造反』面目出現，是『文革』期間地方政治運動的表現形式之一，對『文革』期間地方的社會動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由於中共當局的否定文革，郭在文末也說到：「『文革小報』在其自身的限度內，承載了這些歷史記憶，分析與闡釋這種歷史記憶，對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有積極的作用的。」郭對於「文革」以及「文革小報」的歷史評價，都不脫中共目前否定文革的定調。

賀吉元的研究與郭若平相似，但主要以上海的「文革小報」為例，說明小報編輯為求謹慎，刻意模仿《人民日報》與《解放軍報》，避免犯政治錯誤⁴²。例如聯篇累牘的批判文章，積極呼應中央或地方領導人的講話、指示。另外也和古陽木相同，提到毛澤東關注「文革小報」，甚至給紅衛兵造反派組織主辦的報紙

⁴⁰ 古陽木，〈紅衛兵小報興亡錄—中國報刊史上的亂世奇觀〉，《炎黃春秋》1994年03期（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1994），頁49。

⁴¹ 郭若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小報」文獻及其研究價值〉，《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第5期（總第198期）（福州：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省中共黨史學會，2007），頁9-13。

⁴² 賀吉元，〈「文革」小報——運動初期的亂世奇觀〉，《黨史博采（紀實）》2009年第4期（河北石家莊：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黨史學會，2009），頁50。

題詞。1967年10月，上海市革委會政宣組開始整治文革小報，原則是「主辦單位必須是市一級各條戰線的革命群眾大聯合組織，區、縣、局機構基本不辦報刊」，並規定全市只辦12種群眾報紙、4種群眾雜誌⁴³。配合報刊整併，紅衛兵報刊陸續停辦或合刊，至1971年才完全劃上句點。賀文並未探究紅衛兵組織辦報之動機，對其評價僅有「『文革』小報給『文化大革命』運動以錯誤的導向，……小報對整個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和破壞，並造成紙張的極度浪費。」流於簡單的說法，也未說明「文革小報」的史料價值與時代意義。他在「筆者注」中提到：「當然這不能完全歸咎於『文革』小報，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整個大政方針本身就是錯誤的。」仍然將關注點轉向「文革」運動的本身，符合中共黨史研究傳統「宜粗不宜細」的原則。

此外，樊星認為小報也是一種「啓蒙」，怎麼說呢？他認為小報揭露許多中共黨幹部的腐敗現象，例如每週吃熊掌宴、多次玩弄強姦女兵兵等行爲⁴⁴。在四人幫倒台以後，王洪文被揭發曾過著燈紅酒綠、夜夜笙歌的生活。樊文最後提到「我相信，在未來的當代文化史上，那些小報和民刊一定會佔有不可取代的一頁。它們在主流的聲音之外，發出了民間的聲音。」雖未多加論述，至少繁星肯定了小報具有媒體最原始的功能：扒糞者（暴露陰暗面），起了通俗文學（「黑幕文學」）的作用。

第四節 研究途徑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將採取文獻分析法。過去「文革」研究大多數都集中在中共高層之間的權力鬥爭，以及政策的轉變，缺乏對底層民眾的關懷。雖然目前市面上已有許多經歷過文革的民眾出版回憶錄，但還是缺乏統整性、對比性的研究。而筆者在周院所編《新編紅衛兵資料 I》、宋永毅所編《新編紅衛兵資料 III》中發現，這套

⁴³ 賀吉元，〈「文革」小報——運動初期的亂世奇觀〉，《黨史博采（紀實）》2009年第4期，頁52。

⁴⁴ 樊星，〈「文革」小報也算一種啓蒙〉，《粵海風》2010年第6期（廣州：廣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2010），頁74-75。

資料蒐集大量鉛字印刷的紅衛兵報刊，屬於一手史料。《新編紅衛兵資料 III》的編例說明就提到，該套資料以北京地區以外的群眾組織出版的小報為主，其餘尚有文告、海報、宣言、傳單等，並且都為鉛版小報和印刷品，油印小報暫不收錄。而各類印刷出版品近 700 種，共有 52 冊之多⁴⁵。

本文希望從「文化革命」的政策內容出發，以《新編紅衛兵資料》為基礎，並將「武鬥」作為「文革」激烈程度的觀察指標，挑選出武鬥最激烈的兩個城市：四川省重慶市（1997 年重慶才成為直轄市）、湖北省武漢市，以該套資料蒐集到最多的兩個小報：《815 戰報》（重慶）、《革命造反報》（武漢，後來改名《武漢鋼二司》）為分析文本，時間斷限設定在報刊的起迄年代：1966-1968，著重探討革命群眾如何理解「文革」以及「中央指示」，在其報刊又是如何呈現？實際的行為又是如何？改成「由下而上」，從基層群眾的視角觀看文革，也許會有不同的發現。

（二）研究文本

由於在現有的文獻資料上，筆者並未發現有任何研究紅衛兵報刊之專著，僅有中國大陸出版的寥寥幾篇論文提及。而且根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的說法⁴⁶，中國社科院收藏大量的紅衛兵報刊，惜因種種原因而未能對外開放閱覽，對中國大陸地區研究紅衛兵報刊造成困難。

本文選擇《新編紅衛兵資料 I》、《新編紅衛兵資料 III》為研究文本的原因有四：1. 這是目前為止，市面上可以得見搜集紅衛兵小報最完整的套書。2. 「文革」時期的革命群眾報刊，用紙張印刷，品質良莠不齊，況且紙張本身亦受環境因子影響產生劣化，難以保存。3. 由於中共官方本身對「文革」徹底的否定，該時代的產物也被大量封存，非經允許不得閱覽，增加取得之困難。4. 革命群眾報刊為各個組織自己發行的期刊，可以充分代表當時基層群眾的思維。

⁴⁵ 宋永毅 (Yongyi Song) 主編，《新編紅衛兵資料 III》第 1 冊 (Oakton, VA :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7)，頁 1。

⁴⁶ 汪朝光，《二十世紀的中國電影》講座，國立政治大學百年樓國際會議廳，2012 年 9 月 11 日。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第一章為導論，從老紅衛兵們的個人懺悔行為談起，講述全文研究動機與宗旨，介紹目前學界對於「文革」的革命群眾報刊研究現況。

第二章，筆者從馬克思、列寧對新聞媒體的態度著手，描述馬克思主義者對媒體報刊的基本態度，以及實際之作為，接著談到毛澤東的新聞觀，並將 1949 年之後分成兩個時段：中共建政至「文革」前、「文革」爆發後。考察「文革」前夕中國報刊發行的種類及數量大致的狀況，以及中共在逐漸收緊媒體，使得發行報刊數量大量減少，最終在 1953 年所有私營報業皆轉為公營或公司合營。分析「文革」爆發後，是什麼原因促使中共在 1966 年起放開對於個人或團體發行報刊的限制。

第三章，筆者試圖分析革命群眾報刊包含的功能。分別有：1. 爭奪印刷工具和輿論戰。2. 中共中央文件與紅衛兵批判地方領導人的關聯性。3. 革命群眾報刊對中共中央領導人言論、「兩報一刊」社論的反應。4. 革命群眾報刊的其他面向，諸如批判地方黨委及其領導人的統計，緬懷為「革命」英勇犧牲的「烈士」，重慶、武漢兩地小報的互動等。

第四章為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編輯以及經歷者的反思。筆者搜集到四川重慶兩大造反派的代表人物：周孜仁（八一五派）、李木森（反到底派），以及湖北武漢「新華工」的魯禮安等三人回憶錄，摘出他們三人對「文革」當下的不同認知，行為模式，以及事後反省、懺悔。

第五章為結論，檢視「文革小報」對中共黨史研究的歷史意義及其侷限。

第二章 「文革小報」的理論根源

要研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共政權，為何會在 1960 年代中期的「文革」運動中萌發了基層群眾報刊？那就必然不能忽略馬、列等人的新聞觀及其相關論述。下文筆者試著從馬、列的理論根源去爬梳，並且如何體現在中共建政後的具體措施。

第一節 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對於新聞媒體的態度

研究「文革」的群眾報刊，追根究柢，筆者簡單談一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根源—馬克思主義，對於新聞或報刊的理念根源。

一、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觀

1. 書報檢查制度

馬克思對於當時的書報檢查制度有著諸多批評。陳力丹教授對此有相關的歸納，筆者略舉其中幾點。首先，馬克思與恩格斯反對書報檢查制度是一種基於當事人思想為衡量標準的法律或制度¹。馬克思曾說：「我們將同樣認真嚴肅地反對查禁《埃爾伯費爾德日報》、《漢堡記者》或是在柯布倫茨出版的《萊茵—摩澤爾日報》，因為合法的地位不應該由於個人的道德品質或者甚至於他們的政治觀點和宗教觀點而有所變更。」²

其次，書報檢查是一種政府壟斷的非理性批評。馬克思認為：書報檢查制度是為了政府所壟斷的批評。對新聞出版真正的檢查應該是批評，但書報檢查制度禁止了正常的批評，把批評變成一種專橫的發表意見的權力。報刊就完全被剝奪了批評政府的權利³。

第三，書報檢查制度創造了社會普遍偽善。馬克思說：起敗壞道德作用的是受檢查的報刊。最大的惡行——偽善——是同它分不開的。……政府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它也知道它聽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卻耽於這種幻覺。似乎聽見

¹ 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158。

²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401。

³ 同註 1，頁 159-160。

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樣耽於這種幻覺⁴。

最後，馬克思總結該制度：整治書報檢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因為這種制度本身是惡劣的⁵。陳力丹認為，馬克思不贊成書報檢查制度的原因在於，該制度凌駕於人的基本權利之上，是對人權的蔑視⁶。

2.提出「人民報刊」的觀念

馬克思對於報刊的內容，是有其大原則的，例如報刊報導的內容要貼近人民日常生活與情感。他說：「報刊只是而且只應該是『人民（確實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開的『表達者，誠然這種表達往往是充滿激情的、誇大的和失當的。……它生活在人民當中，它真誠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與憂患、熱愛與憎恨、歡樂與痛苦。它把它在希望與憂患之中傾聽來的東西公開地報道出來，並尖銳地、充滿激情地、片面地對這些東西作出自己的判斷，它這樣做是同它的感情和思想在當時所處的激動狀態相吻合的。今天它所報道的事實或所發表的見解中的錯誤之處，明天它自己就會推翻。』」⁷顯然他對報刊具有自我修正能力是加以肯定的，並且有著理性和感性雙重因素存在。然而馬克思使用「人民」、「階級」等團體性的字彙，意即個人希望獲得自由的前提是階級獲得自由、解放，個人對自由的爭取並非馬克思主義新聞自由的主要內容⁸。

3.堅持新聞出版自由

馬克思對於新聞自由有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堅持。他認為「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會成為泡影。自由的每一種形式都制約著另一種形式，正像身體的這一部分制約著另一部分一樣。只要某一種自由成了問題，那麼，整個自由都成問題。只要自由的某一種形式受到指責，那麼，整個自由都受到指責，自由就只能形同虛設。」⁹自由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新聞自由不能缺少，否則自由

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上冊，頁 183

⁵ 同註 4，頁 134。

⁶ 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頁 161

⁷ 同註 4，頁 352。

⁸ 楊開煌，〈社會主義新聞自由之評析〉，收錄於《台大新聞論壇》第一卷第二期，頁 4。

⁹ 同註 4，頁 201。

就不完整了。接著，恩格斯談到共產黨人爭取新聞自由時的目的，他說「出版自由，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就意味著允許在出版方面進行階級鬥爭。」¹⁰「沒有出版自由、結社權和集會權，就不可能有工人運動。」¹¹陳力丹將其歸結為，以完善新聞出版自由為基礎，為工人階級解放創造條件¹²。

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時代，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新聞出版自由也獲得良好的發展環境。然而馬、恩認為，這代表自由的形式和實質間的矛盾以及明顯的階級局限性¹³。恩格斯說到：「出版自由就僅僅是資產階級的特權，因為出版需要錢，需要購買出版物的人，而購買出版物的人也得有錢。」¹⁴陳力丹解釋，工業革命初期，工人收入有所剩餘，報刊售價下降，工人得以接觸到大眾媒介的機會與條件增加，但是財力的限制在新傳播技術條件下，成為新聞出版自由全面實現的最大障礙¹⁵。

4.新聞出版自由與法規的關係

馬克思反對書報檢查制度，支持用法規保障新聞自由。他說「沒有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就是從法律自由領域中取消新聞出版自由，因為法律上所承認的自由在一個國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¹⁶筆者以為，基於立法是為「保障大多數人利益」的原則，是一種「正義」的象徵，儘管統治階級不一定是無產階級，馬克思還是希冀用法律制度保障新聞自由不受侵害。

5.報刊的職責

除了上述觀點，馬克思還認為「報刊最的首要職責，即揭發招搖撞騙的職責。」

¹⁷恩格斯也說，報刊的「首要職責—保護公民不受官員逞兇肆虐之害。」¹⁸馬、

¹⁰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六卷，頁 528。

¹¹ 同註 10，頁 84。

¹² 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頁 177。

¹³ 同註 12，頁 179。

¹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卷，頁 648。

¹⁵ 同註 12，頁 179。

¹⁶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上冊，頁 176。

¹⁷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四卷，頁 755。

恩二人皆認為監督是報業對政府的責任¹⁹，而監督的根本在於陳述事實。楊開煌總結認為，基於新聞自由的原則，報刊的任務就是對政府官員、人民代表的監督，以及維護人民的利益²⁰。透過媒體的監督，對當權者、現行法規與政策等不斷提出批評，自由報導、討論問題，是在民主國家裡使社會更完善的一種機制²¹。

6.對「黨報」的工作原則

在馬克思、恩格斯生存的時代，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並未出現「共產黨」。1864年9月「國際工人協會成立」，故此處「黨報」意指依據馬、恩兩人思想指導原則下活動的工人政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才多了一條內容：黨報。

陳力丹認為，馬、恩二人對「黨報」工作原則的要求是，報導和理論探討的基礎是實事求是²²。馬克思說：「出版應對一種所有這些派別和觀點採取批判態度的綜合性雜誌完全符合時代的需要；不過，這種批判不能從先入為主的原則出發。」恩格斯在創辦《社會明鏡》時也提出，要求它「完全立足於事實，只引用事實和直接以事實為根據的判斷。」²³不同於一般報刊，馬、恩二人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報刊的基本任務是宣傳、維護黨的精神。「黨的精神」，接近現在「黨性」的概念，判準是黨的綱領。恩格斯說「黨的出版物是做什麼的呢？首先是組織討論，論證、闡發和捍衛黨的要求，駁斥和推翻敵對黨的妄想和論斷。」²⁴防止社會主義理論遭到曲解。

基於政黨會日漸茁壯，人員愈多，理論討論，以及對領導人、黨的綱領及政策，都開放「自由交換意見」²⁵。恩格斯認為，黨員對某些理論問題可以有意見分歧或爭論，這是正常的現象²⁶。他也呼籲黨員「要使人們不要再總是過分客氣地對待黨內的官吏—自己的僕人，不要再總是把他們當作完美無缺的官僚，百依

¹⁸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六卷，頁 280。

¹⁹ 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頁 172。

²⁰ 楊開煌，〈社會主義新聞自由之評析〉，收錄於《台大新聞論壇》第一卷第二期，頁 3。

²¹ 同註 19，頁 172。

²² 同註 19，頁 191。

²³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二卷，頁 413。

²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四卷，頁 300。

²⁵ 同註 19，頁 201。

²⁶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十九卷，頁 221。

百順地服從他們，而不進行批評。」²⁷楊開煌認為上述只是爲了鞏固黨、發展科學社會主義，以及對人的監督，並不涉及對黨這個信仰的討論²⁸。簡言之，這個「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

二、列寧對於新聞自由、黨報刊及黨性的看法

1. 列寧對於出版自由的論述

「所謂自由的報刊是指它不僅擺脫了警察的壓迫，而且擺脫了資本，擺脫了名位主義，甚至也擺脫了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²⁹他所說警察的壓迫，意指沙皇專制政權對出版自由的限制；擺脫資本，也就是資產階級出版自由要擺脫對資本的依賴；擺脫名位主義，也就是解構被追求名望的文化人所壟斷的新聞自由；第四個擺脫，是針對俄國特色的無政府主義而來³⁰。列寧的理念，有很大程度都與馬、恩的概念接近，更具體的是藉由對刊登廣告的限制去截斷資本家隨著控制大型報紙而來的財源³¹。

2. 對於報刊印刷工具的控制

不同於馬、恩，列寧想到了更具體可以實現出版自由的手段：公平分配印刷廠和紙張。分配對象是：能在兩個首都獲得 10 萬或 20 萬選票的大黨、比較小的政黨以及一定數量成員的公民團體³²。從源頭管控，確保出版自由可以擺脫資本的控制。然而透過「分配」制度，選取什麼樣的政黨可以獲得印刷工具的決定權，仍然掌握在執政的共產黨手上。

蘇聯誕生之後，政權仍處在風雨飄搖的階段，資產階級展開有組織的反抗之後，列寧在 1919 年 3 月蘇共八大上對黨綱的說明指出，「剝奪政治權利以及對任何自由的限制只有作爲同剝削者維護和復辟其特權的企圖進行鬥爭的暫時手段才是必要的。隨著人剝削人的客觀可能性的消失，這一暫時手段的必要性也就

²⁷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十八卷，頁 33。

²⁸ 楊開煌，〈社會主義新聞自由之評析〉，收錄於《台大新聞論壇》第一卷第二期，頁 4。

²⁹ 《列寧全集》第二版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 95。

³⁰ 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頁 370。

³¹ 《列寧全集》第二版第三十二卷，頁 229。

³² 同註 30，頁 372。

消失了，黨要為減少乃至完全取消這些手段而努力。」³³「黨是自願的聯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傳反黨觀點的黨員，它就不可避免地會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後在物質上瓦解。」³⁴列寧說限制特定群體的自由只是權宜之計，最終仍要達到全面普遍性的自由，但是，在階級敵人以及對立的孟什維克派仍存在，為了統一思想，管控制度就有存在的必要。

3. 列寧論黨性與「黨報」

列寧對黨性基礎有著三條標準：黨的綱領、策略規定、組織經驗。符合這些言行的就是具有黨性，不符合即是違背黨性。黨性的重要性在於，若「非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群眾一下子湧進黨內來。那時黨就會淹沒在群眾之中，黨就不成其為階級的有覺悟的先進部隊，而將淪為群眾的尾巴。這無疑是一個可悲的時期。……如果黨性基礎(綱領、策略規定、組織經驗)十分缺乏或者薄弱、動搖，那麼毫無疑問，這個危險可能是很嚴重的。」³⁵在此他意識到黨必須堅守意識形態的陣地，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角色，而不能完全融入群眾之中。

1905年11月26日，列寧在《新生活報》(布爾什維克最先公開出版的日報)上發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這是他對於黨報的黨性原則做出詳細的論述。他說：「寫作事業無論如何必須成為同其他部分緊密聯繫著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一部分。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寫作者一定要參加到各個黨組織中去。出版社和發行所、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營業所，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向黨報告工作情況。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注視這一切工作，監督這一切工作。」³⁶這段引文顯示，黨要牢牢掌控報刊、無孔不入。

三、毛澤東的新聞觀

1. 毛澤東對「新聞自由」的施用範圍

毛澤東根據個人的認識去理解詮釋馬、恩、列等人的意識形態。基於長期對

³³ 《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二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42。

³⁴ 《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頁662-667。

³⁵ 〈論黨的改組〉，《列寧全集》第二版第十二卷，頁79。

³⁶ 〈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列寧全集》第二版第十二卷，頁93。

敵鬥爭的經驗，毛認為，對待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等必須實行獨裁、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權³⁷。

毛在 1957 年 5 月對吳冷西說：

我們的新聞統制，是否比國民黨更厲害？很難說。我們在全國解放後的頭幾年，新聞統制比較嚴，很有必要，因為政權剛拿過來，還不穩固。……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情況有了變化，應當研究一下，統制太多、太嚴要有所改變。³⁸

陳力丹對此的總結是，在新的社會主義正常秩序下，毛對言論自由的論述，一是強調社會主義自由和資本主義自由的區別，第二點更重要，強調社會主義的自由只給人民而不給敵人³⁹。毛和列寧不同，他還是要劃分人民與敵人，自由最終並不具有普遍性質。對於敵我的區別對待，「新聞自由」就是有或沒有的區別。

2. 報刊的階級性

在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多次提到報紙、新聞是具有階級性的。例如 1957 年反右派運動前夕他說：

我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份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他們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原則區別，他們混同反映社會主義國家集體經濟的新聞事業與反映資本主義國家無政府狀態和集團競爭的經濟的新聞事業。……他們反對為了實現計劃經濟所必須的對於文化教育事業（包括新聞事業在內的）必要的但不是過分集中的領導、計畫和控制。⁴⁰

同年 6 月，毛為《人民日報》寫社論批判《文匯報》之後⁴¹，又撰〈《文匯

³⁷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 1364。

³⁸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 34。

³⁹ 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頁 587。

⁴⁰ 〈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 424。

⁴¹ 毛澤東，〈《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4 日。

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文匯報》說：『而所以發生這些錯誤認識，是因為我們頭腦中還殘存著的資產階級辦報思想』。……替反動派做了幾個月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喉舌，報紙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向，即資產階級的方向。」⁴²總而言之，「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此話可以相當程度上代表毛澤東對新聞媒體的定性。

3. 新聞事業的功能

至於對新聞業的功能，毛認為它是經濟基礎反映的上層建築，例如他說：「比如報紙，這是屬於意識形態範圍的……至少在帝國主義消滅以前，報紙，各種意識形態的東西，都是要反映階級關係的。」⁴³或者同樣在批判《文匯報》的《人民日報》社論上他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報紙是社會主義經濟即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畫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⁴⁴

毛澤東和馬、恩相同，主張報導要有事實根據而且真實，但是他主張要用辯證的觀點去理解。例如 1958 年「大躍進」發動之後，許多地方領導虛報成績，毛發現後指出「做報紙工作的，做記者工作的，對遇到的問題要有分析，要有正確的看法、正確的態度。……對運動的成績和缺點要有辯證的觀點，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絕對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壞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極一面。……記者的頭腦要冷靜，要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講什麼，就宣傳什麼，要經過考慮。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頭腦要清楚，要冷靜。」⁴⁵

然而毛不願因個別問題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踩煞車，在 1959 年他說：「而所謂缺點，事後檢查，不過是十個指頭的一個指頭，或者還不到一個指頭。那時有些人卻大驚小怪，驚惶失措，是一種右傾情緒的表現。」⁴⁶筆者以為，毛認為新聞工作者要適時反映真相，但要配合政策去做報導，符合「政治正確」原

⁴² 〈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437。

⁴³ 〈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444。

⁴⁴ 毛澤東，〈《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4 日。

⁴⁵ 講話時間為 1958 年 11 月 21 日，出自《毛澤東年譜》第三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 523-524。

⁴⁶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 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 8。

則，以免損及運動的積極性。

4. 中共對報紙的黨性原則要求

中共中宣部在 1942 年發出〈為改造黨報的通知〉，其中提到：「報紙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群眾生活，要這樣做，才是名符其實的黨報。」⁴⁷這就是新聞的黨性原則——新聞為黨的喉舌和工具。⁴⁸從此處可以得知，既然報紙以「政治正確」的黨性掛帥，必定會犧牲其報導的自主性與時效性。

總結本節論述，社會主義國家以「真理掌握在黨的手中」為前提，黨的自由就是人民的自由，黨就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如 2002 年江澤民所作的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所說）。由此可知，中共對於馬克思所說的「新聞自由」已經限縮到只有黨才擁有新聞自由。黨對於新聞媒體也就有了控制權的制高點，中共建政之後，也就循著這個思路並且出台各種規定，將公、私營媒體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節 「文革」前夕中共對報業的管理

1949 年，隨著國共內戰的軍事行動順利推進，中共於北京建立新政權。此年中共對於私營報刊通訊社的管理方式就已經有了具體作法：

一、事後審查

例如：「在軍事管制時期，對私營報刊通訊社，也實行事後審查，將來有某種必要時，可能實行事前的軍事新聞檢查，及外國記者通訊稿的事前檢查，但現在不必作一般規定，也不要接受事前審查的要求。」⁴⁹顯示中共建政前後雖然使用「事後審查」的方式，卻也給了私營報刊通訊社一定的發揮空間。

二、報導任務

時任新聞總署署長的胡喬木認為，全國報紙應用首要的篇幅報導人民從事生產工作和經濟管理工作的成功經驗與錯誤的教訓，並討論解決問題的辦法。除此

⁴⁷ 〈為改造黨報的通知〉，1949 年；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頁 126。

⁴⁸ 楊開煌，〈社會主義新聞自由之評析〉，收錄於《台大新聞論壇》第一卷第二期，頁 10。

⁴⁹ 〈中共中央關於私營報刊通訊社等問題的指示〉，1949 年；同註 47，頁 293。

之外，他還指示所有報紙應減少關於會議、機關活動、負責人員的不重要言論行動，缺乏廣泛重要性的文告文電之篇幅。再者，將建立領導通訊員網、讀報組的工作視為重要的政治任務，並需特別注意對政府工作、經濟建設等議題的讀者來信，對其認真回覆，作為副刊的主要內容⁵⁰。

三、推動企業化經營

除了內容上「事後審查」，在 1950 年中共中宣部也極力推行報紙「企業化經營」，華北及其他地區共有 33 家公私營媒體已經實行該政策，目的在於促使省級以上報紙於 1951 年能達到「自給自養」的目標，並且批評有些報社工作同仁不重視企業化的方針，認為「辦報是文化事業」、「不能當作生產事業來經營」的錯誤觀念。而厲行簡約、民主化管理、改進廣告工作等作法，都是在減少虧損、把政府對報業的補貼降到最少⁵¹。由此可知，中共希望報業能夠在財政上自負盈虧，也算是一種寬鬆的政策。

四、轉向較嚴格的控制

然而到 1952 年底卻出台了一個相關規定：「凡創辦鉛版的向人民群眾公開發行的報紙，在行政上應經當地出版行政機關核轉出版總署申請核准登記」，名義上是減少編輯、發行等力量的浪費，避免積壓或強迫攤派，事實上對報刊的名稱、出版地點、發行對象、性質與內容、編輯方針、領導機關與負責人、編輯人員簡歷、出版頻率、每期出版頁數與份數、發行範圍、預訂和零售比例等，都需經由當地黨委向上級黨委宣傳部報告，最後呈請中宣部批准。特別是省市以上的報紙及主要雜誌，發行份數皆要經過中宣部審核、出版總署通知執行，未經批准不得自行增加發行份數⁵²。「定期定額計劃發行」是最主要的精神⁵³，方法是推行報刊預訂，也符合當時中國計劃經濟建設的總體方針。

⁵⁰ 胡喬木，〈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1950 年 5 月 1 日，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中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頁 75-77。

⁵¹ 〈中宣部關於報紙實行企業化經營情況的通報〉，1950 年 9 月；同註 50，頁 20-21。

⁵² 〈中共中央關於報刊發行問題的指示〉，1952 年 12 月；同註 50，頁 231。

⁵³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郵電部黨組和出版總署黨組關於報刊發行工作的報告的指示〉，1953 年 11 月 8 日；同註 50，頁 260。

五、郵發合一，強迫攤派

對於報紙的銷售通路，1950年中共學習蘇聯採行「郵發合一」，即報紙發行由郵局接辦，統一全國發行系統，也增加了郵電業務，可謂一舉兩得。根據統計，1950年報紙有205種，由郵局發行者為78種，占38%，而透過郵局發行者的發行人數（每期80萬份）占全國32%；到了1952年，全國報紙總類增加到276種，由郵局發行者為233種，已經達到84.4%的程度，而透過郵局的總發行人數（每期980萬份）已占全國發行人數96%⁵⁴。「郵發合一」對於增加報刊種類與發行人數來說，可說是十分成功。但中共也承認這是因為基層幹部以行政命令「強迫攤派」才造成這種錯誤現象，經過1953年初調整後，同年10月全國總發行人數已從1020萬份下降到700萬份左右⁵⁵。除了發行人數的調整，當時的報紙發行雖然已覆蓋了城市與農村，但在農村經常有「收不到、看堆報」的普遍現象，發行地區分配也過度集中於城市等問題⁵⁶，主要還是受限於交通條件未能改善造成。

六、對報刊內容、題材的規定

1954年，中共意識到報紙的內容有很大問題，例如：黨性與思想性不強，也未密切聯繫實際與群眾，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宣傳不足，關於中共黨內生活的宣傳過於薄弱。其次是新聞報導的方式流於公式化、概念化、冗長、不夠通俗等缺點。再者，對於國際問題的宣傳也不夠。更重要的是，當下報紙缺乏配合經濟工作，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及「一五計畫」⁵⁷。於是中共中央在同年7月下達〈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有幾項具體的改革方向⁵⁸：

1. 理論宣傳。如馬列主義、黨的總路線、社會主義思想。
2. 黨的生活重大問題的宣傳，並批判個人崇拜、黨內紀律不佳、組織生活不

⁵⁴ 〈郵電部黨組和出版總署黨組關於報刊發行工作的報告〉，1953年10月8日；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中卷，頁261-262。

⁵⁵ 〈郵電部黨組和出版總署黨組關於報刊發行工作的報告〉，1953年10月8日；同註54，頁262。

⁵⁶ 〈郵電部黨組和出版總署黨組關於報刊發行工作的報告〉，1953年10月8日；同註54，頁265。

⁵⁷ 〈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1954年7月17日；同註54，頁319。

⁵⁸ 〈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1954年7月17日；同註54，頁320-322。

健全等現象。

3. 經濟宣傳，硬性規定經濟宣傳篇幅不得少於版面的 40%。
4. 國際問題的宣傳，介紹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建設成就，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內部矛盾，推廣國際主義教育等。

其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報紙被視為「最尖銳的武器」之原因，該文用整個第三大段的篇幅在論述其重要性。顯然中共已經認識到黨內已經出現驕傲自滿的情緒、缺乏接受勞動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評態度，或脫離黨委領導的傾向，需要廣開言路來加以整頓。

該段點出「批評的目的是為了有利於人民的事業、有利於黨的工作和黨的團結，不是為批評而批評。」⁵⁹中共將報紙做為鞏固「黨的領導」的工具，並非揭發社會黑暗面，或者讓媒體發揮自由性的去做客觀報導。

筆者以為該文件的核心在第六段：「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關鍵，是加強各級黨委對自己機關報的領導。」雖然指示不干涉編輯部日常工作，但賦予各級黨委對自己機關報所屬人員的思想教育任務，甚至要運用黨性堅強、有新聞工作能力的黨員，以及政治上可靠的非黨幹部，加強報紙編輯部⁶⁰。

七、社會主義改造

對於私營新聞事業（國民政府時期留下的私營報紙及外籍人士的辦報），進行清理、整頓與改造。針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等所謂「反動勢力」的新聞媒體，直接查封與接管，改造為共黨的媒體，其餘的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 1950 年初，大陸共有私營報業 58 家（如《大公報》、《文匯報》、《新民報》等），透過合併改組、公私合營等方式介入報社經營，最終將所有報業都收歸公營，到了 1954 年，所有私營報業在中國大陸消失⁶¹。

1954 年 8 月，中共確立全國國營、地方國營、公私合營的報社由中央人民

⁵⁹ 〈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1954 年 7 月 17 日；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中卷，頁 323。

⁶⁰ 〈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1954 年 7 月 17 日；同註 59，頁 328-329。

⁶¹ 行政院新聞局 編，《中國大陸大眾傳播事業及其管理概況》（臺北：新聞局，民 93），頁 35-36。

政府出版總署與各級出版行政機關統一管理，而企業編輯部的業務與幹部工作，則由當地各級黨委直接領導（如此便形成「雙重領導」的形式）。此時加強新聞出版單位的企業經營管理之目的有三⁶²：

1. 保證他們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務。
2. 為國家節省資金
3. 提高工作效率。

八、隨著政治運動起伏，報紙發行量隨著劇烈波動

既然報業有宣傳經濟工作的任務，在大躍進時期，報紙亦在經濟條件不佳的情況下配合「大躍進」，1957年透過郵局發行的報紙總數為1325種，1958年更增加到了1776種。到了「三面紅旗」政策失敗，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期，新聞媒體隨之裁減縮編，1963年報紙總數下降至289種，1965年略微上升至343種，至1966年又降至49種⁶³。若從發行量來看也是相同的邏輯，1957年的24.2億份，此後逐年增加，到1960年時竟達到50.9億份之多，也是歷史的最高點。隨著經濟條件惡化出現的「三年困難時期」，發行量大減，1962年時只剩25.8億份。此後發行量起起伏伏，到「文革」發動的1966年，維持在36.7億份⁶⁴。

九、報紙創辦、停刊或改刊，須經中共中央或同級黨委批准

中共既然將「黨的領導」視為極為重要的政策方針，對於報紙的創刊、停辦、改刊也出台了相關規定，例如中共中央、國務院機關報須經中央政治局批准，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地（市）委的黨委機關報，則由同級黨委批准後，報中央政府文化部備案登記⁶⁵。

從上文可以得知，中共在建政後，逐步加大對報業的控制力度，從報紙發行量、版數、出版方式、出版內容，報紙創辦或停刊，甚至是對報社人員的「雙重

⁶²〈中共中央關於統一和加強國營、地方國營、公私合營報社、雜誌社、出版社企業管理的指示〉，1954年8月；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中卷，頁340-341。

⁶³ 方漢奇等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三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頁255。

⁶⁴ 同註63，頁254-255。

⁶⁵〈中共中央關於報紙和期刊的創辦、停辦或改刊的辦理手續的幾項規定〉，1956年2月；同註62，頁481-482。

領導」，最終將報業改造為服膺政治任務而生存的企業，由同級黨委或上級機關完全掌控，失去了媒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第三節 「文革」初期的新聞界奪權與小報的萌發

到了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卻又出現未納入黨政部門的組織體系、脫離中共黨組控制、無總編輯負責制、未經宣傳主管部門批准就隨意刊行、時辦時停的革命群眾報刊，這又是為什麼呢？

原來毛澤東在 1957 年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曾給過指示：「一九五七年中國革命創造了一個最革命最生動最民主的群眾鬥爭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革命的內容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形式。從此無論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問題，無論是革命的問題、建設的問題，都可以用辯論的形式去迅速地解決。」⁶⁶這種包括「大字報」在內的「四大自由」，被視為「民主的群眾鬥爭方式」，到了「文革」爆發時，基層群眾照樣沿用此模式了。

一、對報刊的奪權

1. 《人民日報》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象徵「文革」正式啓動。5 月 28 日，該次會議上，重新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為副組長，一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⁶⁷，並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向毛澤東建議，派遣臨時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領導報社並改組報社的領導班子⁶⁸，代表原來黨委領導機制遭到破壞。同年 6 月 2 日，《人民日報》不僅全文刊出北大學生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並且以「本社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⁶⁹一文。對北大學生更有激勵性的是，6

⁶⁶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1957 年 10 月 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1/content_2400224.htm，新華網，檢索日期：2014 年 1 月 4 日。

⁶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 588。

⁶⁸ 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 19。

⁶⁹ 〈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人民日報》，1966 年 6 月 2 日。

月3日，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宣佈：「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⁷⁰筆者認為這代表兩個意涵：第一，中共中央公開承認基層群眾大字報的「政治正確」，並且直接促使黨委領導的倒台。第二，未經相關機構審核的「大字報」有公開發表的契機。

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在此情況下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短短幾天內，全國許多大、中學都出現「學生造反」，在學校裡貼大字報、開辯論會，批判校黨委、黨支部領導和教師，校園開始出現無政府狀態⁷¹。6月12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提到「文革」的搞法：「過去教學改革、學制改革搞不動，改不了。這次要趁此來個大改革，大、中、小學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學師生要互教互學。學生不讀書了，半年之內我看不讀書，最活的是讀報紙。」⁷²既然毛都肯定讀報紙比讀書更有益，群眾對報紙的重視程度也就日益增加。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⁷³張春橋、姚文元率先於上海發動奪權的「一月風暴」，這股風潮很快就蔓延全中國。而且同年1月，毛澤東對於革命群眾向報刊奪權就持肯定的態度，他說：「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要大量轉載紅衛兵報的文章，我們的報紙很死。許多事情宣傳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⁷⁴毛不僅肯定小報，也支持紅衛兵組織加入宣傳工作。

到了1968年9月，全中國就有29個省、市、自治區的中共黨委陸續遭到奪權⁷⁵，各地黨委機關報自然也在被奪權的範圍內，大批新聞工作人員被迫離開

⁷⁰ 〈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1966年6月3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⁷¹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頁764。

⁷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593。

⁷³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原載於《人民日報》、《紅旗》雜誌，1967年1月1日。

⁷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30；1967年1月10日。

⁷⁵ 方漢奇等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三卷，頁331-332。

職位，正式出版的報紙總數大為減少，如 1965 年全國郵局發行中央級與地方級的報紙共 413 種，1966 年降為 390 種，1967 年降到 334 種⁷⁶，減少近 20%。

2. 《重慶日報》（《新重慶報》）

以當時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為《重慶日報》為例，隨著重慶市委 1967 年 1 月遭到造反派組織奪權，《重慶日報》從 1967 年 1 月 1 日起停刊，改出《新聞報道》，於革聯會成立之後，同年 2 月 1 日改為《新重慶報》⁷⁷。受到重慶武鬥嚴重的影響，紙張等物資缺乏，1967 年 7 月 2 日起《新重慶報》每日只出半張（兩版）。8 月初「楊家坪武鬥」，造反派中的「八·一五」派與「反到底」派爭奪建設機床廠、空氣壓縮機廠，不僅市區電話與交通中斷，物資也脫銷，8 月 5 日起《新重慶報》更是減少發行量，僅供應部份零售，訂戶在 9 月底才恢復正常收訂⁷⁸。最嚴重的是，1968 年 4 月 11 日至 5 月 16 日，該報停刊長達 35 天之久，從 5 月 17 日起只出電訊版，直到同年 6 月 2 日重慶市革委會成立，《新重慶報》改回《重慶日報》，為重慶市革委會的機關報。1971 年 5 月中共重慶市委恢復，同年 8 月 25 日《重慶日報》才又重新成為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直至今日。

《重慶日報》創刊時，雖有印刷廠，但設備陳舊，除了印報車間有 2 台自動控制的輪轉機，其餘全靠手工操作或半機械化作業。到了 1954 年才從德國新購入了 2 台 64 吋輪轉機，而當時單日印刷量尚不足 50 萬對開張，排字車間完全靠工人的手工作業，一個排字工人一天也只能揀 8 至 9 千字，效率很低⁷⁹。由此可知，在「文革」初期身為黨委機關報的印刷量也不高，更遑論其餘革命群眾小報的發行量了。

表二《重慶日報》沿革

作者制表

時間	報刊名稱	說明
1952.8.5-1966.12.31	《重慶日報》	1952 年創刊，為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

⁷⁶ 方漢奇 等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三卷，頁 332。

⁷⁷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出局，2010），頁 124。

⁷⁸ 同註 77，頁 308。

⁷⁹ 文屢平 等編，《重慶市志：報業志》（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頁 229。

		至 1966 年 12 月 25 日被「文革」造反派組織「魯迅戰鬥團」宣布奪權為止 ⁸⁰ 。
1967.1.1-1.31	《新聞報道》	文革造反派改《重慶日報》為《新聞報道》，專門刊登「兩報一刊」的社論、文章，以及新華社電訊 ⁸¹ 。
1967.2.1-1968.6.1	《新重慶報》	群眾革命組織「重慶市革聯會」1967 年 2 月 12 日成立後，《新聞報道》改為《新重慶報》，為革聯會機關報 ⁸² 。
1968.6.2-迄今	《重慶日報》	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在 1968 年 6 月 2 日成立，同日《新重慶報》改回《重慶日報》舊名，為革委會機關報 ⁸³ 。 1971 年 5 月中共重慶市委恢復 ⁸⁴ ，同年 8 月 25 日該報重新成為重慶市委機關報 ⁸⁵ 。

3. 《武漢晚報》（《長江日報》）

武漢地區的情況是，創刊於 1949 年 5 月 23 日的《長江日報》，為中共中央華中局（後改為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漢市委的機關報。隨著中共中央在 1952 年決定撤銷大區一級的黨報，該報在同年底終刊，由武漢市委機關報《新武漢報》續用《長江日報》之名，在 1953 年元旦繼續出刊。1960 年 12 月，《長江日報》、《湖北日報》合併，《長江日報》在 1961 年 1 月 6 日起停刊，部分人員在同年五月一號出版《武漢晚報》作為武漢市委機關報。「文革」開始後，武漢市委領導人遭受批鬥，各級機關於 1967 年 1 月底陷入癱瘓狀態，該報被污為「資產階級復辟的工具」、「大毒草」，報社大樓於 1966 年 12 月 19 日被造反派群眾組織封閉而停刊⁸⁶。1967 年 1 月 21 日，該報以《長江日報》之名復刊⁸⁷，迄今仍為

⁸⁰ 文屢平等編，《重慶市志：報業志》，頁 258。

⁸¹ 同註 80，頁 258。

⁸²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頁 124、128。

⁸³ 同註 80，頁 258。

⁸⁴ 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四川省組織史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頁 252。

⁸⁵ 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編，《重慶市志》（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頁 431。

⁸⁶ 宋曉丹，〈《武漢晚報》的誕生〉，《武漢文史資料》2012 年第 9 期（武漢：武漢文史資料雜誌編輯部，2012），頁 59。

⁸⁷ 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武漢市志：報業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頁 159-160。

武漢市委機關報。

二、革命群眾報刊的萌發

也正由於各地群眾革命組織紛紛成立，紅衛兵也有各自的勢力與派系，革命群眾報刊（簡稱「文革小報」）就如雨後春筍般增加。根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地區的「文革小報」總數近 1000 種、8770 期；全國出版的「文革小報」（含鉛印與膠印）超過 6000 種⁸⁸。

1. 重慶的革命群眾報刊

以重慶來說，自 1966 年 12 月 9 日第一份由造反派組織編印的小報《八·一五戰報》面世以來，各造反派組織紛紛出版自己的小報鞏固輿論陣地打派仗。據重慶市檔案館對現存「紅衛兵小報」的統計，「文革」期間在重慶編輯發行的派報達 1639 種，由造反派中「八·一五派」辦的有 313 種，另一派「反到底派」辦的有 195 種，來自全國各地、四川其他市縣，以及軍隊造反派組織辦的共有 1131 種⁸⁹，絲毫不亞於北京的出刊量。除了定期或不定期出刊那些有期號的小報，尚有專刊或增刊出現，例如針對小說《紅巖》的作者羅廣斌，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刊物《山城紅衛兵》，於 1967 年 6 月 30 日出刊的《羅廣斌問題專刊》第 1 號⁹⁰，或是特別爲了 1967 年 10 月 27 日「林園血案」，解放軍總字四一二部隊、重慶市第十五中學紅色造反團出刊的《10.27 大血案專刊》⁹¹。

本者在前三段有提到，《新重慶報》因武鬥影響，生產中斷、紙張缺乏，出刊數量與時間並不穩定，紅衛兵小報也是如此。例如 1968 年 2 月 7 日出現「八·一五」派小報（包括《山城戰報》、《八·一五戰報》、《八一戰報》、《山城紅衛兵》、《星火燎原》、《機關戰報》）的聯合版；1968 年 8 月反到底派小報（《文攻報》、《機關反到底》、《山城紅旗》）也出了聯合版⁹²。

⁸⁸ 方漢奇等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三卷，頁 335。

⁸⁹ 文慶平等編，《重慶市志：報業志》，頁 143。

⁹⁰ 宋永毅 (Yongyi Song) 主編，《新編紅衛兵資料 III》第 38 冊，頁 16294-16297。

⁹¹ 周院 (Yuan Zhou) 主編，《新編紅衛兵資料 I》第 20 冊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99)，頁 9439-9458。

⁹² 何蜀，《爲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頁 308-309。

2. 武漢的革命群眾報刊

比重慶稍早，在 1966 年 10 月 20 日「武漢市中等學校紅衛兵總部」就已經將其刊物《紅衛兵》發刊至第 4 期。而大專學生也在同年 11 月 24 日，以「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總指揮部政治部」的名義，出刊《紅衛兵戰報》到第 18 期。可見武漢比重慶更早出現革命群眾的自辦報刊，而且上述兩組織都屬於「保守派」。

當時出刊的革命群眾報紙，如《揚子江評論》、《江城前哨》、《新湖大》、《新華工》、《武漢烈火》較為知名⁹³。筆者根據《新編紅衛兵資料 I》、《新編紅衛兵資料 III》整理出發行於武漢地區的革命群眾報刊約有 100 種，其中發行期數最多的是《新華工》，共 104 期，但含專刊僅收錄 17 期；發行期數次多的是《新湖大》，共有 97 期，但含合刊僅收錄 12 期。現存數量最多的是造反派「鋼二司」之刊物《革命造反報》（後改名《武漢鋼二司》），含專刊、聯合版共 66 期。以上皆為「造反派」之報刊。

三、中共曾經欲約束「文革小報」卻效果不彰

「文革」發動之後，對「文革小報」並不是完全放任的狀態，如〈中共中央關於改進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中發〔67〕157 號）⁹⁴：首先肯定「革命群眾組織編印的各種報刊，傳單，在宣傳戰線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後面點出七個要點：

1. 依照中共中央領導人指示，以及「兩報一刊」的社論和評論進行宣傳。
2. 中共中央領導人講話、內部文件、會議紀錄，不得擅自刊登印發。
3. 不得公開發表反對人民解放軍的文章和報導。
4. 嚴格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
5. 報導內容突出政治，不搞庸俗低級。
6. 對國際問題的發言權集中於中央。

⁹³ 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主編，《武漢市志·新聞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頁 154。

⁹⁴ 〈中共中央關於改進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中發〔67〕157 號），1967 年 5 月 14 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7. 不輕信和傳播政治謠言。

筆者數次與研究重慶文革史的何蜀先生通信請教相關疑問。2014年3月24日，他在給筆者的回信中，對上述七個要點做出以下分析：

第1條，基本上都做到的，而且都非常自覺，因為人人都想表示自己「最革命」，執行中央指示最堅決。不過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於下文另有陳述。

第2條基本上都違背了，各小報都爭相刊登自己整理的中央首長講話，以及從不同渠道得到的對自己一派有利的中央文件。而中央對此也睜隻眼閉隻眼，並未明令禁止。

第3條執行困難。因「人民解放軍」只是一個籠統的抽象概念，而毛提出要揪出打倒「混黨裡、政府裡、軍隊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麼針對這些「軍內一小撮」的文字是算「反對人民解放軍」還是算執行毛的指示？各地造反派小報中幾乎都有針對當地軍隊領導人的批判文字，同時又聲稱自己擁護解放軍，兩者相互矛盾。

第4條，這一條也未經常做到。例如當時的一些中央文件，明確寫明是「機密」、「發至縣團級」，而許多地方甚至由駐軍部隊支左辦公室之類機構公開印發張貼。群眾組織小報刊登自然也就不在話下。

第5條亦執行困難。因為「庸俗低級」沒有一定的標準。例如揭發某些官員的腐化生活，中央領導人會認為那是庸俗低級，但群眾會認為應該揭發，中央與地方具有認定上的差異。

第6條也未能嚴格執行。因當時造反派都認定要「解放全人類」，例如對香港問題，「火燒英代辦」之前都紛紛發表自己的意見，立場一個比一個更要更左。

第7條，因當時中央領導人就經常出爾反爾，說不清哪句話是真話還是政治謠言。比如1967年1月19日，陳伯達、江青等人在京西賓館全軍文革及軍委常委會上大批蕭華，首都紅衛兵「天派」當晚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批鬥蕭華大會（彭真、羅瑞卿、劉志堅等陪鬥），原擬到會接受批判的蕭華因接「毛辦」通知而未到會。「地派」得知毛表示要保蕭華，遂衝擊會場造反。周恩來深夜召集大專院

校兩派頭頭緊急會議，被迫對《中央首長批判蕭華的講話》「闢謠」。其實群眾都知道那不是謠言，只是上邊的領導人說話不認帳。

除了下達對革命群眾報刊的指示，1967年3月，中共中央下達相關規定，指示各省市自治區報社在省、市等黨政委機關遭奪權後：1.報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喉舌，決不能成爲一個革命組織攻擊另一個革命組織的工具。2.應接受臨時權力機構或軍管會的領導。3.宣傳方針，應嚴格遵守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並參照「兩報一刊」的社論和評論進行宣傳，不得宣傳與黨中央精神相對立的口號。4.報社內部在派別鬥爭嚴重的情況下可以實行軍事管制。5.禁止刊載戴高帽子、掛黑牌子、罰跪、開鬥爭會等圖片，以及謾罵的詞語。6.國際問題的發言權集中於中央。7.保守黨和國家機密。8.報紙不能發表攻擊人民解放軍的文章和報道。⁹⁵

但就重慶的發展態勢來看，中共中央下達的指示，地方上並未完全遵守。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自從1966年12月底遭到奪權之後，到「重慶市革委會」成立前，「重慶市革聯會」是唯一的權力機構，《新重慶報》成爲其機關報之時，「革聯會」成員中多親「八·一五」派，輿論也就倒向了對「八·一五」派有利的風向，於是《新重慶報》也趁機批判了造反派中的砸派（西師「八·三一」、交院「九·一五」）與保守派：

（四）正確對待革命小將

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交通學院「九·一五」戰鬥團等組織是革命群眾組織，在運動前一階段起了積極作用；雖然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的關鍵時刻，違背了這個鬥爭大方向，犯了嚴重錯誤，但仍不失爲一個革命群眾組織。希望他們正視自己的錯誤，改正自己的錯誤，放下包袱，在新的鬥爭中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作出新的貢獻。

⁹⁵ 〈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自治區報紙的幾項意見〉，中發〔67〕104號，1967年03月16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2年。

(七) 關於保守派組織

「思想兵」、「赤衛軍」、「戰鬥軍」、「文藝軍」等保守派組織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御用工具，這些組織的頭頭必須老實承認錯誤，不許糾集原班人馬打著「造反」旗號，恢復原有組織，更不許招降納叛，改頭換面重建組織。否則，立即解散，對於首要份子，必須依照情節輕重依法懲處。對於這些保守派組織中的一小撮頭頭，處心積慮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停止生產，中斷交通，破壞國家財產，造成嚴重損失者，以及進行打、砸、抓、搶者，必須查處，對於保守派組織中的牛鬼蛇神必須堅決鎮壓。⁹⁶

該文章署名「革聯會」，竟又在指示下達後，於機關報上繼續批判其他群眾組織，甚至連已在當年 1 月宣告解散的西南師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毛澤東思想赤衛軍」都不忘鞭屍。由此可知，儘管《新重慶報》已經是地方性的臨時權力機構，對中央下達的指令並不會完全的遵守。

四、小結

早在 1966 年 8 月底，毛澤東就曾對一些幹部受衝擊提出看法，他說：「全國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準備個別中央局、一部份省委、一部份市委垮台。」⁹⁷代表毛已有心要大起整黨之風。1967 年元旦，《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發表社論：「1967 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967 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⁹⁸有了毛澤東與黨中央媒體的號召，全中國掀起奪權風潮，以上海的「一月風暴」（或稱「一月奪權」）為開端，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北京等省市的中共黨委陸續遭到癱瘓。以中共政權「以黨領政」的邏輯，黨組織廢弛，政府以及相關法令失去執行功能以及

⁹⁶ 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關於目前重慶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幾個問題的通告〉，《新重慶報》第五版，1967 年 4 月 6 日。

⁹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 619。1966 年 8 月 29 日。

⁹⁸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1967 年 1 月 1 日。

約束的力量，本章第二節提到若干對於新聞報刊的控管命令，形同具文。地方上也陷入造反派互相反覆奪權的傾軋，光是上海在 1967 年 1 月中旬至 2 月初，就發生過四次奪權⁹⁹，政局不穩定至此，可見一斑。同時也給革命群眾報刊很大的創刊自由與空間。神奇的是，完全的報刊「新聞自由」出現時，卻又符合了馬克思的初衷：廢除書報檢查制度以及真正屬於人民群眾的「人民報刊」。



⁹⁹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 377。

第三章 革命群眾報刊的功能

上一章筆者談到馬克思、列寧，以及毛澤東等人對於新聞報刊的態度，還有中共在建政之後對報刊的種種管制與在「文革」期間的放鬆。接下來本章選擇重慶與武漢兩地的革命群眾報刊，去比較、觀察基層群眾報刊之間對於「文革」政策的態度，以及比較各派系之間的差異與論戰。

第一節 爭奪印刷工具和輿論戰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 1966 年 5 月 16 日下發〈中共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共 39985 份¹，且僅限 17 級以上的幹部才能在 5 月 17 日政治局仍在開會時接觸到這份文件²，真正解密公開，是直到隔年 5 月 17 日才在《人民日報》上廣為人知。然而，時任重慶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的吳宓，在 1966 年 5 月 4 日³、5 月 7 日⁴、5 月 10 日⁵、5 月 18 日⁶、5 月 30 日⁷分別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學習會，可見在同年 6 月 1 日《人民日報》刊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之前，基層群眾就已經有人接觸到「文革」發動的概念，而且是在大學校園之中。武漢方面，中共武漢市委在 1966 年 5 月 23 日根據「五·一六通知」，發出《高舉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的通知》⁸。顯然最遲在 5 月下旬「文革」發動的訊號已被基層群眾獲悉。

一、爭奪印刷工具

根據革命群眾報刊《八·一五戰報》主編周孜仁的回憶，1966 年 11 月 19 日，重慶的造反派「重大八·一五」成功奪佔了重慶大學印刷廠，從此他們就有了自己的輿論工具，並在 12 月 9 日開始發行自己派系的報刊《八·一五戰報》

¹ 〈中共中央委員會通知〉，中發〔66〕267 號，1966 年 5 月 16 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²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 著，關心 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59。

³ 吳宓，《吳宓日記續編》第七冊（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426。

⁴ 同註 3，頁 427-429。

⁵ 同註 3，頁 430。

⁶ 同註 3，頁 436。

⁷ 同註 3，頁 443。

⁸ 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武漢市志·大事記》（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頁 246。

⁹。同樣身為造反派的「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也在同年 12 月 16 日出版《山城紅衛兵》第 6 期。由此判斷，從 1966 年 5 月至 12 月，革命群眾組織受到「文革」號召漸漸成立後，並且已經注意到宣傳的重要性。

1967 年 1 月 12 日，西南師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簡稱「思想兵」）1005 團和「毛澤東思想赤衛軍」（簡稱「赤衛軍」）等保守派組織宣告解散；受《人民日報》刊載「上海工人赤衛隊」承認政治錯誤影響，保守派之一的「重慶工人戰鬥軍」（即「工人糾察隊」）成員，也在 1 月底寫出請罪書¹⁰，從此保守派組織煙消雲散，退出歷史的舞台。不久之後，同月 17、18 日，重慶市印製一廠、印製七廠遭到廠內外造反派聯合查抄¹¹。另一例證據是，同年 8 月 14、15 日，造反派之中的「反到底」派江北指揮部，炮擊嘉陵江大橋南橋頭並攻佔與「八·一五」派反覆爭奪的嘉陵印刷廠，造成 11 死、多人受傷。市二輕工業局、重慶市六中醫棟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與部分設備燒毀¹²。根據「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總部常委、江陵兵團負責人李木森的回憶，這次炮擊是給敵對的「八·一五」派之「生日獻禮」。¹³在攻下嘉陵江大橋南橋頭後，李看到二輕局、嘉陵印刷廠被打得稀爛、千瘡百孔，「這些都給我『勝利者』的心頭蒙上了一層陰影。當時搞起武鬥來，一心只想到『為毛主席而戰』，子彈、砲彈不長眼睛，自己要是被打死了就當『烈士』，哪裏會去多想可能給社會造成的損失呢？」¹⁴

「八·一五」派在之後的報刊中提及這次戰鬥，卻絕口不提遭到挫敗：

軍工峨嵋山（按：應為軍工井岡山）江陵兵團的一小撮砸派匪徒在「走資派」和牛鬼蛇神的支使下，步蔣介石之後塵，置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而不顧，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從八月十一日開始，連繼用「三七」砲和重型武器對我重大八·

⁹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17。

¹⁰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2010 年），頁 116-117。

¹¹同註 10，頁 116。

¹²同註 10，頁 220-221。

¹³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頁 83-84。

¹⁴同註 13，頁 89。

一五進行了瘋狂砲擊。我戰鬥團本著停戰協議精神，以大局為重，多次向其提出嚴重抗議和警告，但其砸性不移，毫無悔改之意。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八月十五日被迫採用了相應措施，對這一小撮匪徒進行了毀滅性打擊，匪徒傷亡慘重。

15

站在道德制高點，解釋自己是「自衛反擊」，忽略己方損失，強對敵方傷亡。筆者認為，這種敘事符合了「政治正確」原則，是免於打擊己方士氣、損及運動積極性，與毛澤東在 1959 年認為新聞工作者要適時反映真相，但要配合政策去做報導的作法不謀而合。

受到敵對派系炮擊影響，《八·一五戰報》從第 36 期至第 40 期（8 月 15 日至 9 月 20 日），僅能使用重慶大學內的印刷廠排印，連周孜仁都承認，紙質和印刷品質非常糟糕。重慶市區戰事頻仍，從 34 期起開始，只能象徵性的印 1、2 千份，由編輯部拿到街上去叫賣¹⁶。在之前 8 月 8 日的第 35 期，是因為先將文稿、圖案備齊，送進城裡的八一印刷廠製作印刷，再想辦法運回，如此印刷質量才會高¹⁷。從此可知革命群眾組織極為在意爭奪報刊印刷機具控制權，不惜發動大規模武鬥，動用三七砲與二五砲炮擊。

二、派性的輿論戰

1967 年 1 月 12 日後保守派組織消亡，中共重慶市委在 1 月底也遭到奪權，但「重大八·一五戰鬥團」認為「他們還會裝死躺下，窺視方向，操縱受他們蒙蔽的御用組織，易名換姓，改容更裝，打起造反的旗幟，喊起奪權的口號，混水摸魚，攪亂我們的陣線，保護他們自己過關。」¹⁸該文中雖未清楚點名是哪個特定組織或人物，但也代表他們觀察到保守派消亡後，其中有人加入了造反派組織中，重新舉起革命的大旗。

1967 年 2 月 8 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正式成立（簡稱「革聯會」），

¹⁵ 〈戰地黃花〉，《八·一五戰報》第三十七期，第 1、6 版，1967 年 8 月 28 日

¹⁶ 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193。

¹⁷ 同註 16，頁 64、218。

¹⁸ 〈只准左派奪權，不准老保翻天〉，《八·一五戰報》第八期，第 2 版，1967 年 1 月 27 日。

由於造反派中的「八·一五」派在「革聯會」12席常委中佔了有7人（八一兵團、二七戰鬥團、紅巖八三一戰鬥團、紅農八·一五、財貿八·一五戰鬥團、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的權力分配不均，導致反「革聯會」的勢力在日後不斷對其抨擊。針對這些言論，《八·一五戰報》撰文反擊，稱：

在那些陰暗的角落裡，還有那麼幾隻碰壁的蒼蠅，他們嗡嗡嘶叫什麼「打倒周氏新市委」呀，什麼「革聯會非垮台不可」呀，什麼「砸爛非法革聯會」呀，並揚言要搞什麼「第二次奪權」。……可惜，歷史的發展規律卻絕不會以他們幾個小丑的意志為轉移。革聯會的成立，代表了運動的大方向；革聯會的成立，是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必然，是完全符合山城革命造反派和廣大革命群眾的願望和意志的。革聯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¹⁹

雙方繼續就「革聯會」性質糾纏的難分難解。1967年4月，反「革聯會」的勢力集結，在4月12日發動以「砸爛革聯會」為號召的大遊行，故此派稱為「砸派」（7月後稱「反到底」派）。「砸派」在4月底也在《山城紅旗》創刊號上說：

今天我們站起來了，請您老人家放心，要問我們今後幹什麼？一句話：堅決砸爛偽「革聯」，將革命進行到底！……我們砸爛偽「革聯」，就是要徹底粉碎劉、鄧企圖在四川地區製造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就是要把劉、鄧在重慶的死黨斬盡殺絕，就是要徹底肅清劉、鄧反動路線的流毒，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²⁰

除了將敵對方形容為劉、鄧在四川的代理人，亦請「首都紅代會赴渝戰鬥隊宣傳組」發表題為〈革聯會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一文，力挺「西師八·三一」、「交院九·一五」、「後字242紅總」等「砸派」組織。²¹企圖透過更具知名度的「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首都紅代會」）來壓倒對方，突顯自身的政治正

¹⁹ 叢中笑，〈樹立革聯會的革命權威〉，《八·一五戰報》，第九期，第2版，1967年2月17日。

²⁰ 〈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山城紅旗》第一期，第1版，1967年4月30日。

²¹ 〈革聯會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重溫毛主席的第一張大字報〉，《山城紅旗》第一期，第2版，1967年4月30日。

確；嚴厲的抨擊，實為爭奪文革中的領導權與話語權。

不久之後《八·一五戰報》隨即發表評論，指稱：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非法來渝的某些混蛋，打著「紅代會」的金字招牌，盜用「中央派來的」的名義，到處招搖撞騙，儼然以「救世主」自居，在山城幹了不少壞事，這裡我們向大家揭露一件事實。「紅代會」中某些混蛋，敗壞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的聲譽，不顧黨紀國法，他們為了使自己非法來渝的身份「合法」化，竟敢偽造「調查證」，企圖欺騙四百萬山城人民。這是地地道道的特務活動，必須予以揭露。現將這些混蛋在重慶新華印刷廠偽造的所謂「調查證」，作為附件公諸於世，以正視聽。²²

「八·一五」派巧妙的利用「首都紅代會赴渝戰鬥隊宣傳組」的身份瑕疵，提供私自印刷的「調查證」作為證據控訴。儘管敵對派系擁有來自「首都紅代會」的支持，照樣也能連消帶打、做出反擊。

除了針鋒相對的批判，在 1967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簡稱「紅五條」，或稱「中央五條」）發布後，「八·一五」派終於認清自己是真正的勝利者，開始以勝利者的姿態揮舞橄欖枝，以成篇累牘的文章呼籲和平、停止內戰²³。重大《八·一五戰報》主編周孜仁稱，此時向「反到底」派組織「西師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發表態度和緩的公開信，文中稱：

我們希望你們能夠正視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的確，在前一段時間我們沒有很好地聽取不同的意見，沒有很好地團結那些與自己持有不同觀點的同志。……但是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無論是過去和現在從來就是把你們視為我們的戰友的！」²⁴

文中五次以「同志們、戰友們」稱呼對方，顯然是用檢討自己以釋出善意，有意要爭取對方的支持。然而「西師八·三一」也知道同意對方的和平呼籲等同

²² 〈不准玷污「紅代會」的光榮〉，《八·一五戰報》第十八期，第 2 版，1967 年 5 月 5 日。

²³ 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160。

²⁴ 〈致西師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等革命同志的一封公開信〉，《八·一五戰報》第廿四期，第 3 版，1967 年 6 月 3 日。

於束手就擒，與其被蠶食消解，寧願拚個魚死網破，策略是攪亂局面、尋找機會以奪取政權，文宣上繼續堅持「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誓與山城趙永夫血戰到底！」²⁵，立場絲毫沒有因中央「紅五條」而有所改弦易轍。

按李木森的回憶，「紅五條」儘管肯定了 54 軍在支左中的成績，但也指出軍隊對革命群眾組織支持一方（「八·一五」派）、壓制另一方（「砸派」）的錯誤；況且「紅五條」沒有提到兩大派爭論的「革聯會」問題，在中央未明確承認革聯會的情況下，對「砸派」來說已經是大勝利²⁶。甚至在「紅五條」發布的隔天，「砸派」在重慶舉行大遊行慶祝，李認為這是砸派的翻身，不再挨批鬥受打擊²⁷。

由「紅五條」事件可以得知，中央文件的下達對於輿論戰是有所影響的，兩派都做出了反應。然而缺乏雙方公認的解釋權權威，詮釋就流於兩派各說各話，出現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勝利者的奇怪景象。

第二節 中共中央文件與紅衛兵批判地方領導人的關聯

「文革」發動以後，頻繁的政治運動與奪權，使中共中央並非對每個地方都直接指導運動的進行。筆者發現重慶和武漢在批判地方領導人時，由接收到的訊息與否，衍生出來的模式也不盡相同。

一、重慶「由上而下」的模式

1967 年 5 月 16 日，「紅五條」發布，公開批判前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

重慶市各革命組織應當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指向重慶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在軍隊內，在群眾中，對劉，鄧，李，任等人在罪惡，進行充分的揭露和徹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開宣佈撤銷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和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撤銷任

²⁵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160-161。

²⁶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頁 49。

²⁷同註 26，頁 50-51。

白戈兼任的重慶軍分區第一政委的職務²⁸。

「八·一五」派的《八·一五戰報》在第 22 期轉載「紅五條」全文，並搭政治動向的順風車，發表〈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任白戈的三反言論〉、〈土皇帝李井泉反毛澤東思想罪行錄〉（續四）、〈堅決擁護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群眾大會一給毛主席的致敬電〉、〈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對山城文化大革命的再次嚴正聲明〉等文章，聲稱「宣告了劉鄧路線在山城的徹底失敗，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任白戈及其同夥的死刑。」²⁹

無獨有偶，「反到底」派的《山城紅旗》也撰文批判「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是山城無產階級革命派不共戴天的敵人」，並且將武鬥流血事件有增無減、逐漸升級，幹部遭到迫害，砲打中央的反革命逆流氣焰囂張，以及革籌小組遲遲不能執行中央賦予的權力，責任全都歸向「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³⁰由此可以觀察出，雖然兩派針鋒相對、勢不兩立，對於中央下達批判任白戈時，立場卻是完全一致的，這也證明，「文革」時期，重慶革命群眾仍重視中央下發的文件精神，體現了中央權威的貫徹，形成亂中有序的現象。

二、武漢「由下而上」的模式

然而在武漢方面就不是「由上而下」的模式了。1966 年 5 月底中央下發〈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³¹，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任該小組的副組長之一，7 月成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時，王擔任委員；9 月他還以中南局第一書記、武漢部隊政委的名義給大會寫了一封公開信³²，顯然政治地位很穩固。然而關於慶祝人民共和國 17 週年國慶大會上的報導，出現的是湖北省委代

²⁸ 〈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中發〔67〕159 號，1967 年 5 月 16 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²⁹ 〈打倒劉、鄧、李、任，實現革命大聯合—熱烈歡呼中共中央關於處理重慶問題的意見〉，《八·一五戰報》第廿二期，第 4 版，1967 年 5 月 26 日。

³⁰ 〈長纓在手縛蒼龍〉，《山城紅旗》第七期，第 1 版，1967 年 6 月 7 日。

³¹ 〈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中發〔66〕281 號，1966 年 5 月 28 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³² 〈王任重同志給大會的一封信〉，《武漢晚報》第一版，1966 年 9 月 10 日。

理第一書記張體學、武漢部隊負責人陳再道的名字，絲毫未見王任重³³。筆者保守猜測，王在 10 月初已經失勢。

相隔一個月之後，《革命造反報》在 11 月 9 日就轉載了王寫給湖北省常委的一封信，題為〈關於中等以上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並認定「這封信，是湖北省委在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所推行的一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黑綱領，是一封道道地地的黑信。對這封信，必須進行徹底的批判。」

³⁴這也是筆者發現最早出現在武漢革命群眾報刊中批判王任重的言辭。

緊接著革命群眾開始接露王任重的「黑材料」，發表題為「湖北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鐵證——王任重是湖北省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一文³⁵，並於 11 月 11 日召開大會，向湖北省委「開火」³⁶。

11 月 18 日，關鋒、戚本禹和「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團的談話時，關示意可以批判王任重，學生就說：「我們現在逐步認識到王任重是湖北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指揮，總後台。」而關、戚聞言後相視而笑，並連連點頭說說：「啊！你們現在才意識到」³⁷。顯然這是中央文革小組在等待地方群眾揭發王任重的錯誤之後才做的表態。由這裡看來，武漢的情況是「由下而上」，等待基層群眾的挖掘之後，中央才公開出擊批判，與重慶的狀況恰恰相反。

後續效應是，除了湖北省委領導人遭到批判，其機關報《湖北日報》亦被勒令停刊，而武漢市委機關報《武漢晚報》並未受到影響，繼續發行³⁸。王任重亦在 12 月 25 日被造反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東方紅紅衛兵」從廣州揪回武漢³⁹，兩天後 19 個造反組織成立「批王聯合指揮部」，並在 1967 年 1 月初舉行

³³ 〈武漢五十餘萬群眾集會遊行慶祝光輝節日〉，《武漢晚報》第三版，1966 年 10 月 1 日。

³⁴ 《革命造反報》第二期（武漢），第 4 版，1966 年 11 月 9 日。

³⁵ 《革命造反報》第四期（武漢），第 4 版，1966 年 11 月 16 日。

³⁶ 《革命造反報》第四期（武漢），第 1 版，1966 年 11 月 16 日。

³⁷ 〈關鋒戚本禹與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團的談話〉，1966 年 11 月 18 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³⁸ 《革命造反報》第五期（武漢），第 2 版，1966 年 11 月 20 日。

³⁹ 〈王任重和保皇派〉，《革命造反報》第十二期（武漢），第 2 版，1967 年 1 月 2 日。

三次群眾大會來批判王⁴⁰，可謂名聲掃地。

相較於重慶遵循中央的指示，武漢在另一件事情上也並未遵循中央指示辦事，體現在塑造毛澤東塑像的問題上。1967年7月，中共中央對建造毛澤東塑像下達相關指示：

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這只能由中央統一規劃，在適當時機，適當地點建造，才可能做好。現在某些群眾組織那種匆匆忙忙的做法，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會造成政治上的損失。毛主席七月五日指示：『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制止，勢必會刮起一陣浮誇風。』希望你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⁴¹

但在同年的10月7日，武漢「中阿友誼廣場」落成了高達16公尺的毛澤東巨型水泥塑像，並由康生陪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謝胡一同參觀⁴²。武漢「新華工」組織枉顧7月份的中央指示，依然建成了毛澤東塑像，加上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對此除了未加譴責批評，竟帶領外賓參訪，對此顯然表示肯定。武漢地區「由下而上」的模式再次受到肯定。

第三節 對中共中央領導人言論、「兩報一刊」社論的反應

一、對中共中央領導人講話的評價

由於「文革」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遭撤銷，本文提到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乃指中共中央委員會、國務院、中共中央軍委會、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人。

重慶《八·一五戰報》摘登了〈林彪同志號召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群眾運動推向新階段〉⁴³，也轉載了江青、陳伯達於1967年1月18日談奪權的問題⁴⁴。這裡出現了「北京聯絡站來電」的署名，筆者猜測，這是前一年9月「重大八·

⁴⁰王紹光著，王紅續主譯，《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89。

⁴¹〈中共中央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中發(67)219號，1967年7月13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⁴²《新華工》第六十期第3版，1967年10月18日。

⁴³《八·一五戰報》第二期，第1版，1966年12月18日。

⁴⁴北京聯絡站來電，〈中央首長談奪權〉，《八·一五戰報》第八期，第2版，1967年1月27日。

一五」到北京參加毛澤東第三次檢閱紅衛兵運動後，留在北京的人員組成的聯絡站，負責人還是「八·一五」派的知名人物周家喻⁴⁵。

武漢「七·二〇事件」前夕，重慶「八·一五」派、砸派一同受到謝富治、王力的接見，王力提到：「54軍是毛主席的好部隊，是可以信賴的。……你們如果把54軍看成壞的部隊，就會提一些錯誤的口號，比如什麼『黑司令部』呀，『要揪出山城趙永夫』呀。這些口號不要提好不好。」⁴⁶由於54軍向來支持「八·一五」派，《八·一五戰報》隨即在該文下方發表短評，稱砸派在過去的期間不斷抨擊54軍的行徑，「這就是道道地地的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迎合了李任死黨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進行反革命復辟的需要，也就是在今天的新情況下，執行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⁴⁷由於謝、王給予「八·一五」派明確的支持，所以該刊匯整出13條的〈砸派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行備忘錄〉⁴⁸，繼續批判「砸派」反中央的立場。這是兩派在接受到同一個訊息時的不同反應。

再舉個例子，江青在1967年7月21日至22日接見河南赴京代表團時，曾經肯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她說：

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議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當他們不放下武器，拿著槍枝、長矛、大刀對著你們，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你們要吃虧的。⁴⁹

卜偉華認為這個口號促使造反派大肆搶奪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和物資，釀成全四川武鬥不斷升級⁵⁰。上海《文匯報》在次日就刊登這則講話⁵¹，《八·一五戰報》

⁴⁵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頁49。

⁴⁶〈王力同志講話〉，《八·一五戰報》第卅二期，第2版，1967年7月24日。

⁴⁷〈「辛辛苦苦」幾個月，捕風捉影一場空〉，《八·一五戰報》第卅二期，第2版，1967年7月24日。

⁴⁸〈砸派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行備忘錄〉，同註47。

⁴⁹〈中央首長第七次接見河南赴京代表團紀要〉，1967年7月21至22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⁵⁰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579。

⁵¹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196。

主編周孜仁說：

我在第一時間看到權力很大的毛夫人「懿旨」，總的感覺就是傻了眼。這種感覺說明我對日益惡化的戰爭狀態憂心忡忡，對可能實現的和平還心存僥倖。把《文匯報》交給大家傳閱的時候，我只說了一句話：「既然中央都不想控制局面了，我們還等什麼？」……大家說：「那就打吧！破罐子破摔，就名正言順亂打他一氣吧！」⁵²

然而「反到底」派的李木森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說：

在我的記憶中，江青七月二十二日那個肯定河南二七公社「文攻武衛」口號的講話，似乎對我們影響並不大，那個講話是什麼時候傳到重慶來的，我在什麼時候看到的，都毫無印象了。因為當時武鬥戰火已經成為燎原之勢，真可以說是「大勢所趨，欲罷不能」，有沒有她那個講話，重慶的武鬥都一樣會發展起來。⁵³

基於《文匯報》發行範圍甚廣，「八一五」派都能取得，沒道理「反到底」派領導人對此中央首長的指示一無所知，筆者猜測也許只是工人出身的李木森當時並未留意而已，加上小報主編周孜仁長於文字工作，對此訊息格外敏感。

武漢群眾組織「鋼二司」的《革命造反報》（1967年6月22日起改名《武漢鋼二司》）對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只是刊登的期數較《新湖大》、《新華工》還要更多，共有11期，佔全部出刊期數的六分之一。該刊上曾刊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王力、陶鑄、粟裕，可見該刊編輯對於中央領導人的言論極為重視。根據該刊顯示，其中從1967年7月17日、8月9日及8月26日，短短一個月多時間，「鋼二司」竟獲得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王力等中央領導人的三次接見，8月9日那次還是特地用專機接武漢「三鋼」（鋼工總、鋼二司、鋼九·一三）、「三新」（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三司革聯」的主要負責人至北京，突顯了當時中共中央在「七·二〇事件」前後對武漢的重視程度。而這三次的接見，都以談話紀要的形式在該刊呈現，成為「鋼二司」重

⁵²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197。

⁵³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頁71。

要的政治資本。

除了直接刊發接見談話紀要，1967年9月20日，毛澤東在武漢的指示，自然也成爲重中之重。毛在張春橋、楊成武、余立金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武漢，接見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政委劉豐，並做出幾點指示，「鋼二司」將其總結成爲四點⁵⁴：

- (1)關於形勢。毛認爲武漢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可以搞「三結合」⁵⁵了。
- (2)關於幹部問題。要解放一大批幹部，並要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對於犯錯誤的幹部要允許別人改正，要給人家改正的機會。
- (3)關於政策和作風問題。毛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並說要團結一批評和自我批評一團結，凡愛整人的人，整來整去最後都要整到自己頭上。
- (4)關於革命大聯合問題。毛不希望工人階級內部分成兩大派，並指示曾、劉給他們解些歷史、黨史、軍史，還稱過去幾個蘇區裡面打內戰，無非是馬克思主義多一點、少一點的問題。

雖然該期《武漢鋼二司》有將毛對武漢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的評價寫出，但也就只有輕描淡寫的「對百萬雄師、獨立師揪得這麼厲害，那就不好。」筆者根據《毛澤東年譜》找到較完整的對話內容：「對『百萬雄師』不要整得那麼狠，壞的還是少數，廣大群眾是好的。對獨立師也不要整，幹部、戰士都是受蒙蔽的。總要給犯錯誤的人以出路，包括陳再道。不知誰批准的搞『噴氣式』、掛牌、戴高帽，紅衛兵還引用我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但那時是對土豪劣紳的。」

⁵⁶《武漢鋼二司》對敵對派系「百萬雄師」，以及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批判文章共有21篇之多，時間幾乎集中在1967年的7月至8月間。倘若此時因毛的此番言論推翻過去該刊的狠批立場，那就不免陷入了被動，甚至落入「反毛主席」的「反革命行徑」中。所以即使知道毛有意放過「百萬雄師」和陳再道，

⁵⁴《武漢鋼二司》第五十三期，第1版，1967年10月11日。

⁵⁵「三結合」指：在對中共地方黨委奪權之後，以革命領導幹部、革命造反派、解放軍三者結合，成立「革命委員會」，取代地方黨組織成爲地方繼續進行「文革」的主導力量。

⁵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頁125。

也要對此視而不見，採取隱蔽的方式避重就輕，便可繼續立於「政治正確」的不敗之地。

二、對「兩報一刊」社論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堪稱是當時中共黨內最重要的三個媒體，這三者也堪代表中共中央當時對於時局的態度，群眾報刊轉載「兩報一刊」社論，也代表了政治表態。武漢的《革命造反報》在 1966 年 11 月 9 日就轉載了同年 11 月 1 日《紅旗》雜誌社論〈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⁵⁷；1967 年 3 月，《紅旗》雜誌第五期刊出〈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是首次不點名地稱劉少奇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⁵⁸；同期另外刊出〈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一文提到：

《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談，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脫離革命，脫離政治鬥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宣揚唯心主義的修養論，轉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按照這本書去『修養』，只能是越養越『修』，越修養越成為修正主義。對這本書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對這本書的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⁵⁹

對於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進行嚴厲批判，代表毛要對劉的問題給予升級並加以公開批判⁶⁰，於是同年 5 月武漢《革命造反報》、《新華工》便出現 5 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

另外，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⁶¹，

《人民日報》10 月 25 日社論為〈大、中、小學校都要復課鬧革命〉，《新湖大》

⁵⁷ 《革命造反報》第二期（武漢），第 1 版，1966 年 11 月 9 日。

⁵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頁 68。

⁵⁹ 《紅旗》雜誌評論員，〈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紅旗》1967 年第五期，1967 年 3 月 30 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⁶⁰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頁 468。

⁶¹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中發〔67〕316 號，1967 年 10 月 14 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在 12 月初的社論就是〈掀起復課鬧革命的新高潮〉⁶²。根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革命造反報》轉載、響應「兩報一刊」社論共有 9 期，《新華工》則有 1 期。

重慶的部份，除了《八·一五戰報》第二期刊載〈熱烈歡呼《紅旗》雜誌第十五期社論的發表〉⁶³，該刊第三號也轉載《人民日報》、《紅旗》1967 年的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全文，並發表〈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文響應，另外又刊載通知聲明：「我團全體戰士，必須努力學習，認真研究，認真討論，必須掌握社論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精神。」⁶⁴該刊第五號同樣轉載了《人民日報》、《紅旗》的社論〈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⁶⁵，頭版全文刊登，並報導沙坪壩區「八·一五」派獲得這個訊息以後雀躍的表現⁶⁶。除了照登《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亦會再轉載這一報一刊上的轉載文章，例如《紅旗》雜誌轉載《文匯報》的〈革命造反有理萬歲〉一文，該文也出現在《八·一五戰報》第六號上⁶⁷。在黨委機關報遭到奪權之後，革命群眾報刊自認為代表人民群眾的正確道路，負起了為黨中央、地方革委會宣傳政令的功能。

第四節 革命群眾報刊的其他面向

一、批判地方黨委與領導人的統計

筆者遍查武漢地區革命群眾報刊現存刊數最多的三者，依序是：〈革命造反報〉（同〈武漢鋼二司〉，66 期），〈新華工〉（15 期），〈新湖大〉（12 期）。從刊登的主題頻率來看，發現這三個刊物皆批判過陳再道的總計 14 期，其中兩刊批判王任重的有 16 期，批判中共湖北省委或中南局的僅 14 期。湖北省委遭批判，其機關報《湖北日報》以及武漢市委機關報《武漢晚報》也受到牽連，批判的文

⁶² 〈掀起復課鬧革命的新高潮〉，《新湖大》第五十六期（湖北），第 1 版，1967 年 12 月 2 日。

⁶³ 《八·一五戰報》第二期，第 2 版，1966 年 12 月 18 日。

⁶⁴ 《八·一五戰報》第三號，第 4 版，1967 年 1 月 2 日。

⁶⁵ 《八·一五戰報》第五號，1967 年 1 月 12 日。

⁶⁶ 〈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奪取革命生產雙勝利〉，《八·一五戰報》第五號，第 3 版，1967 年 1 月 12 日。

⁶⁷ 《八·一五戰報》第六號，第 2、4 版，1967 年 1 月 23 日。

章也有 14 篇。

若論刊登的篇數計算，批判王任重的文章算是最多的，多達 32 篇，時間跨度從 1966 年 11 月至 1968 年 6 月，時間長達一年七個月。陳再道繼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批陳的文章也就居次，達 29 篇，其中《新華工》的〈討陳專刊〉⁶⁸以及《新湖大》的六篇〈打倒陳再道〉系列文章別具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武漢創造出「武老譚」這樣的人物，意思是「武漢地區譚震林式的人物」。這個典故起源於 1967 年 2 月 16 日，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譚震林在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議上，指責張春橋不要黨的領導，目的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⁶⁹，對「文革」主導者康生、陳伯達等人的做法極度不滿。隔天譚震林寫給林彪的信中提到：

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鬥，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就是如此。我們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北京《群醜圖》出籠後，上海、北京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護。這些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老幹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⁷⁰

2 月 19 日，毛澤東對譚震林等人在 16 日在懷仁堂的發言做了嚴厲批評，並要求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請假檢討」，並在 2 月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召開七次「政治局生活會」，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進行批判，江青稱他們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後稱「二月逆流」）。既然譚震林被塑造為反對「文革」的典型人物，武漢的《革命造反報》（《武漢鋼二司》）亦在同年 6 月 8 日、6 月 22 日、7 月 12 日共三期上發表 6 篇挖掘「武老譚」式

⁶⁸ 〈討陳專刊〉，《新華工》，1967 年 8 月 1 日。

⁶⁹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頁 450。

⁷⁰ 譚震林、林彪，毛澤東，〈譚震林給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澤東的批語〉，1967 年 2 月 17 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人物的文章，可謂上行下效。

二、緬懷烈士

「文革」，重慶和武漢發生多起的「武鬥」事件，傷亡都非常慘重。為了紀念死去的「革命戰友」，兩地的革命群眾報刊都有「緬懷烈士」的文章出現。重慶《八·一五戰報》就對「八·一五」派在武鬥中的死難者，如唐世軒、張全興、李盛品⁷¹、謝宗正、張顯明、陳茂明、蘇玉發⁷²等人有全版的悼念文。

武漢比重慶早出現此類文章，1967年6月22日、6月28日、7月4日這三期的《武漢鋼二司》分別悼念在6月13日、6月17日、6月24日死難的「烈士」文章有5篇。該類文章不外乎先介紹「烈士」生平：「這位女英雄叫朱慶芳，出身在職員家庭，16歲，是市八中初二(5)學生，鋼二司戰士。朱慶芳同學從小學到中學一貫表現很好，熱愛集體，文化大革命前，擔任學生會文體部長，踏實肯幹，從不表現自己。」接著就是：

武老譚準備對工造總司這個紅色革命根據地下毒手了，在這個萬分危急的時刻，朱慶芳同學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然地主動參加了工造總司紅色根據地的保衛戰，決心用自己年青的生命來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最後在她身受重傷之際，「慘無人道的百匪朝著小將的胸部就是一刀，隨即又在她前額、腰部和腹部兩側各殺一刀，在她倒下的時候，口裏還唸著：『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周圍目睹的群眾無不為之啞然失聲，淒然淚下。⁷³

首先介紹家庭出身背景、個人特質，再講投身「革命」的豪情，最後如何英勇的就義，口中還叨念著崇高理想。為此《武漢鋼二司》在出版專刊紀念朱慶芳，甚至在8月21日舉行追悼大會⁷⁴，這種敘述模式塑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烈士」，表彰為革命犧牲奉獻精神的可貴。

三、兩地群眾互相聲援

⁷¹ 《八·一五戰報》第卅五期第3版，1967年8月8日。

⁷² 《八·一五戰報》第卅六期第2版，1967年8月15日。

⁷³ 〈為有犧牲多壯志一記朱慶芳烈士〉，《武漢鋼二司》第卅三期第3版，1967年7月4日。

⁷⁴ 〈紀念朱慶芳烈士專刊〉，《武漢鋼二司》，1967年8月30日。

筆者發現到，當時革命群眾組織雖然各自為政，但亦有到各地去串聯或者打聽消息，並將消息刊登在自己的報刊上的現象，互相聲援以壯聲勢。

武漢《革命造反報》刊登題為〈打倒李井泉 解放大西南〉的報導，內容是：

五月十一日，武漢地區大中學校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舉行了隆重的集會遊行，聲援四川革命造反派。會上宣讀了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十項決定，宣讀了武漢地區大中學校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關於成都「5·6血案」的聲明及給四川革命造反派的慰問電，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戰士，成都「5·6血案」的受害者XXX在會上控訴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壓制革命造反派，迫害革命群眾的滔天罪行。會後，數萬革命造反派走上街頭，舉行了盛大的示威遊行。

大家一致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十項決定，堅決支持四川的革命造反派，和四川革命造反派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遊行隊伍不斷高呼：「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揪出武老譚，解放全中原！」「打倒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⁷⁵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才下達，撤銷李井泉西南局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才隔四天的時間消息就傳到武漢，並且組織起批判李的批鬥大會，效率不可不說極佳。這個例證同時也再一次證明，革命群眾組織對中共中央發出的文件的重視程度，實際的反應就是用示威遊行的形式來回應。

不只武漢聲援重慶，重慶也對武漢「七·二〇事件」有所認識，報導如下：

七月二十三日，沙坪壩區八·一五革命派、我團戰士和我校革命師生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憤怒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陳再道的滔天罪行，堅決聲援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毛主席和捍衛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處於兩個階段、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決戰的關鍵時刻，鑽進武漢地區黨、政、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陳再道負隅頑抗，明目張膽地煽動百萬雄師這個保守組織中的反革命份子，圍攻、侮辱和鬥爭中央特派赴武漢解

⁷⁵ 〈打倒李井泉 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報》第廿七期第4版，1967年5月18日。

決文化大革命問題的謝富治、王力同志，猖狂地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上午十時許，沙坪壩區八·一五革命派懷著對劉少奇、陳再道一伙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的無比仇視的心情，響應毛主席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高舉毛主席的畫像和紅旗，抬著標語牌，走出工廠，湧出校門，走向街頭。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振臂高呼：「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打倒陳再道！」「堅決支持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一切革命行動！」「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整個示威遊行過程中，我們情緒高昂，鬥志旺盛，充分顯示了八·一五革命派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氣概。⁷⁶

「武漢事件」發生在 1967 年 7 月 20 日，相隔三天後重慶的革命群眾組織就發起了聲援武漢造反派組織的示威遊行，然而報導中未提及參與遊行的人數以及具體的組織名稱。筆者研判，也許是由於組織動員的時間不足，導致參與人數比估計的更少，所以並未明確在報導中寫出。

武漢、重慶的互相聲援行為可以歸納成幾個特點：

- (1) 進行方式：都是以示威遊行的方式進行。武漢「鋼二司」於 1967 年 5 月 11 日舉行遊行；重慶「八·一五」派則於 1967 年 7 月 23 日進行。
- (2) 遊行時間：皆在文件下達或事件發生後的三至四天內。由當時的通訊條件來看，湖北與四川重慶比鄰，消息在四天內傳達到對方城市已經十分迅速。
- (3) 明確指出鬥爭對象：四川李井泉、武漢陳再道。
- (4) 聲援對方的消息見報。

⁷⁶〈沙區八一五革命派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八·一五戰報》第卅三期第 4 版，1967 年 8 月 1 日。

而兩地不同的特點在於：

- (1)外地組織（「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參與了武漢的集會遊行，而重慶遊行未見有外地革命組織參加。
- (2)武漢使用了自創的「武老譚」名稱批判四川領導人，但未見重慶「八·一五」派發明類似稱呼批判武漢的陳再道，這是由於重慶駐軍 54 軍向來偏向「八·一五」派的緣故。重慶另一造反派「砸派」未得軍方支持，就稱 54 軍軍長韋統泰、副政委藍亦農為「山城趙永夫」⁷⁷。

由於革命群眾報刊涉及的主題眾多，筆者匯整了一些出現頻率較多的報導主題分類，製成表三以便呈現，僅供讀者參考：

表三 武漢地區「革命小報」報導主題統計

作者製表

內容	報刊	革命造反報	新湖大	新華工	總計期數
刊載指示	中央機關	5	0	0	5
	「兩報一刊」社論	5	0	0	5
	中央領導人	11	3	3	17
	地方領導人	5	2	1	8
	總計	26	5	4	35
批判領導人、機關黨委、其他群眾組織	中央（劉少奇、陶鑄、王力）	8	0	2	10
	地方領導人（王任重、陳再道、「武老譚」）	25	7	1	33
	地方黨委（中南局、湖北省委）	10	0	4	14
	地方機關報（湖北日報、武漢晚報）	5	0	0	5
	其他群眾組織	5	5	1	7
	總計	53	12	8	69
響應文章	奪權後的革命大聯合	7	0	1	8
	「兩報一刊」社論	4	0	1	5
	總計	11	0	3	13
對國際事件的報導		1	1	0	2

從筆者整理的表格看來，武漢地區「文革小報」的批判文章占最大宗，其次

⁷⁷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頁 316-317。

才是刊載指示，最少的是報導國際事件，僅僅出現 2 期，也就是《革命造反報》批判蘇聯軍警毆打中國留學生⁷⁸，以及《新湖大》報導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來華⁷⁹。也許是中國政治動盪，境外消息難以跨境流通，也有可能是革命小報的編輯者把重心放在國內的緣故。

四、小結

從本章的論述可以得知，基層群眾組織不論是中央文件的下達、中央領導人指示、對「兩報一刊」社論的響應、批判地方黨委和領導人，仍然是跟隨政治大風向起舞，緊扣主旋律。少數幾點不同的，就在於派姓鬥爭上，各執己見、互不相讓，也唯有在此處才會選擇性的服從中央指示。也就是說，基層群眾報刊還是被「文革」的大旗所籠罩，並未能擺脫時局的影響而獨樹一幟。



⁷⁸ 《革命造反報》(武漢)第廿一期，1967年2月9日。

⁷⁹ 《新湖大》第四十七期，1967年10月11日。

第四章 革命群眾組織報刊編輯以及經歷者的反思

上一章筆者論述了關於革命群眾報刊的功能及內容，具有其時代的特殊性。本章將以個人對「文革」武鬥、瘋狂行爲、集體狂熱等行徑的經歷，以及事後反省爲基礎，描繪出基層群眾對於「文革」的意象。

第一節 《八·一五戰報》主編周孜仁（重慶，「八一五」派）

周孜仁，「文革」發生時是重慶大學電機系五年級三班的學生，也是業餘文工團美術隊隊長。1966年重慶「八一五事件」發生後，與同伴到北京告狀，並在8月20日、21日受到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的接見。是年11月，周在成都的老家遭到抄家。12月「一二·四事件」當天，夥同幾個同學砸爛保守派組織「工人糾察隊」總部，同月9日《八·一五戰報》發行創刊號。1967年2月，轉任「革聯會」機關報《新重慶報》言論組組長。3月，改任「革聯會」的《山城戰報》文字編輯。

周孜仁的才華被同校的動力系學生劉福所發掘，被延攬一同創立《八·一五戰報》¹。雖然後來該刊編輯部最興盛時多達十幾人，但周、劉二人還是該刊的要角。在當時的小報上，文章通常不會署名作者姓名，而是以「某某戰鬥組」、「某某編輯部」代替，例如當時被封爲五大「毒草」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評四川時局〉²一文也只是署名《山城戰報》、《八·一五戰報》編輯部。會這麼做，一是爲了避免突出個人形成偶像崇拜（除了毛澤東以外），二是局勢瞬息萬變，萬一文章出了問題也好由集體共同承擔³。因此周雖然是《八·一五戰報》編輯部成員，有機會撰文使自己聲名大噪，卻也不敢在文章上署名讓自己出鋒頭。

一、「文革」意象

1966年8月，四川省重慶師範專科學校發生「八一五事件」⁴。事件發生之

¹ 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18。

² 《八·一五戰報》第四十七期第1-3版，1967年12月1日。

³ 同註1，頁33。

⁴ 「八一五事件」，發生在1966年8月15日，地點在四川省重慶師範專科學校。事件起因是重

後，周被推舉為代表上北京告狀。此行也成為周對「文革」的最初意象。根據周孜仁回憶，在北京六天的時間裡，看到幾個紅衛兵衝上公交車，滿車搜索並殺氣騰騰的大喊：「狗崽子搞階級報復啦！狗崽子翻天啦！瞧老子抓住你！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挑出你的五臟六腑！」另一天，他看見一隊穿著舊軍裝、銅頭皮帶的中學生，「怒呼口號，瘋叉叉地向什麼地方狂跑。……我想：不知哪一個不幸的家庭又會遭殃，又會血濺靜夜，屍橫街衢了。」⁵周孜仁上北京感受到的，是充滿肅殺氣氛、激進口號的環境，雖然未親眼見到血腥場面，光憑想像，也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然而，沒料到類似的狀況很快就發生在他的身上。1966年11月，周在成都的老家遭到抄家，「空蕩蕩的屋裏已一無所有，連地板都被撬得精光，冰涼的泥地上就扔了幾捆稻草。年過七旬的父母親蜷在雜亂的草堆中。無處藏身的饑鼠在稻草中穿來穿去。灶台被徹底夷平，爸爸媽媽只能用三塊磚頭圍起來，像開野炊一樣做飯。」⁶當時的他認為，是由於宗教狂熱與年輕人的虛榮心膨脹，促使他有積極表現的動機，加上家庭先天不足帶來的自卑感，必須表現的比他人更激進、格外的超然，於是他在當時的日記中只記載了：「家被抄了，很冷落，也沒什麼了不起。大革命嘛，不打破一些罐罐怎麼行呢？」⁷對被抄家這等大事以此寥寥數語草草帶過，正是最好的例證。多年以後，周回想到這段往事有著深刻的悔悟：「當父母的墳頭早已衰草離離，當我千里歸掃，跪倒在家鄉潮濕的泥土和散發著刺鼻腐臭的落葉之上，我默默祝禱老人的亡靈在遠方安息，我總要痛徹詛咒自己的自私和卑賤。」⁸

另個深入周孜仁心中的觀念是「知識分子向工農兵學習」。在「文革」發生的前一年，周前往四川達縣參加為期七個月的「四清」運動，就是為了響應「知

慶大學、師專附中、重慶市六中的師生，共四千餘人前往重慶師專聲援該校「輕騎」、「排砲」兩個小組，被維護工作組的一些群眾包圍在師專操場上，雙方展開激烈辯論

⁵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20。

⁶同註 5，頁 21。

⁷同註 5，頁 21。

⁸同註 5，頁 22。

識分子向工農兵學習」的精神，甚至已經固化成爲潛意識或本能。周當時看到「窮鄉野地的小生產者，他們的狹隘、偏見乃至於讓人很感可笑的自私……但當時我們卻不願意想這些，即使看見了，想到了，也必然會馬上自警：快快煞車！這是知識份子的偏見作祟！毛主席教導我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但還是『比知識份子乾淨得多』。」⁹顯示周在成長階段接受到的是，刻意貶低知識分子地位的教育，並且內化很深。

「文革」初期，毛澤東鼓動大、中學生組成紅衛兵造反，「可此後不過兩年，他便怒氣衝衝將工、軍宣隊開進大學去教訓不聽招呼的娃娃兵了……從此中國的知識份子全體蒙冤，當了整整十多年的『臭老九』」¹⁰周對此下個了評語，他認爲「在毛的眼裏，知識份子只是一種尙未進化完全的脊椎動物，必須隨時隨地地讓工匠或者農婦進行圈養馴化。」¹¹由周接受到的教育以及事後的反思，兩者互相映證可得知，毛並不相信知識份子，甚至是利用、防範的態度。

二、對衝突事件的回憶

「文革」初期，保守派與造反派群眾有相當多的衝突，其中之一是趁著敵對派系召開大會時去鬧場。身爲「八一五」派健將的周，把大會造反總結出了既定的公式：「糾集人員—衝擊會場—搶奪話筒—發表造反聲明—佔領主席臺，最終取而代之。」這種擾亂的行爲，簡單一點就是讓大會中斷，更嚴重些就是拳腳相向，雙方爆發武鬥，接下來必然就是「鬧事者『強烈抗議走資派挑動群眾鬥群眾』」，把事情鬧大，最好是讓北京方面來插手、說話¹²，這也就符合了毛澤東所期望的「天下大亂」，並使當權派垮台。正因爲局勢「亂」，才有打破既定的權力結構以及被壟斷的可能，造反方也才有機會「奪權」。在群眾瞭解到「權力」是可以經過這種手段取得時，「你唱罷來我登場」，互相奪權便層出不窮。王紹光認爲，這不能僅僅用「混亂」、「發了瘋」來描述，他傾向用理性抉擇論解釋，群眾基於理

⁹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45。

¹⁰同註 9，頁 45-46。

¹¹同註 9，頁 46。

¹²同註 9，頁 25。

性思維判斷出奪取權力的最可行方式，而又以學生、落後工人具有相對低的起點（thresholds，亦即需要付出的代價少），參與造反運動者就在不斷增加的狀況下累積，最後超過一個節點，形成大潮¹³。

例如「一二·四事件」，就是一個實踐例子。1966年12月4日，在重慶大田灣體育場，保守派組織「重慶工人戰鬥軍司令部」（同「工人糾察隊」）組織召開批判西南局、省市黨的誓師大會¹⁴。造反派一方，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為首的「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前去攪局、鬧場，安排負責衝主席臺、控制兩側看臺、卡住大門，主席臺後方馬路擺放三輛救護車方便運送傷患。若此計不成，備案是將「八一五」派的隊伍引導至市中心解放碑另開大會，堵塞遊行通道，與保守派組織分庭抗禮¹⁵。雖然後來造反派順利佔領會場，但由於傳出傷亡發生，周孜仁聽說死亡人數從個位數增加到十位數，頓時義憤填膺，和幾個同學上街將沙坪壩街道刷滿「以血還血，以命抵命」等標語，並衝到重慶大學松林坡頭砸毀「工人糾察隊」總部。憑著一時的血氣和憤怒，長驅直入、以寡擊眾竟然沒有遭遇任何抵抗，周判斷「工人糾察隊」自覺理虧沒有阻擋，最後他們砸櫃子、桌子、凳子，將油印機、點心、所有紙張全部帶走。在激進的行為之後，周的情緒是「又慶幸又害怕」，怕的是若對方稍微有一點勇氣，當天的遭遇就不堪設想¹⁶。

三、對待感情的態度

青少年時代，總是對異性有著嚮往，周孜仁雖身處「文革」的大時代中，卻也未能逃開屬於青春期的悸動。他在當時暗戀著一個女同學，日記上清楚的記著：「在大街上，人的海洋裏，我看到一雙特別的眼睛和那張白皙的面孔，是她——就是過去『我相信我有一句話要對她說』的那位姑娘。她正和另外一個同學一起。」

¹³王紹光 著、王紅續 主譯，《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9），頁 11。

¹⁴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24。

¹⁵同註 14，頁 26。

¹⁶同註 14，頁 29。

最後是他自己的心理狀態：「很久沒見了，久別重逢，砰然一震，什麼也沒說就走了。心裏老不平靜。真的，太不平靜了！」¹⁷周感覺到自己怦然心動、難以平復。但他卻只能用「日復一日的反修大辯論、階級和階級鬥爭教育以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隨時都在告知我們，整個世界正在墮落並等待拯救，偉大的黨所賦予的使命那麼神聖而激動人心。任何兒女私情都是不可寬恕的罪愆。」¹⁸來壓抑對愛情的渴望。然而，他也明白這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劇。

四、駐軍支持創辦《山城戰報》

中共中央等機關在 1967 年 1 月底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指示一出，重慶駐軍順勢倒向人多勢眾、奪權順利的「八·一五」派。駐紮重慶的 54 軍，軍長韋統泰、政委謝家祥及藍亦農等高階將校，迅速召見「重大八一五」總團勤務組周家喻、吳慶舉、熊代富等人。韋統泰直稱「重大八一五」是「左派組織」，表示堅決支援，並要求其主動聯合其他造反組織聯合奪權¹⁹。不久後的同月 28 日，駐軍中近多達兩千名的指戰員響應、認可「重大八一五」等造反組織的奪權舉措，以實際的行動，「武裝」示威（手持鋼槍）遊行支持之²⁰。

同年 3 月，「革聯會」決議創辦《山城戰報》，並由解放軍總後勤部駐渝辦的一位軍官擔任社長。會另外創辦此刊也是有些原因：

1. 機器困難：重慶印刷毛澤東著作的任務量大，其他印刷品只能暫緩印行。
2. 紙張困難。筆者猜測是因為創刊小報太多導致市面上流通的紙張缺乏，要整合其他報刊聯合出版。
3. 《新重慶報》暫時不宜為「革聯會」發聲，按系統歸口，只辦《山城紅衛兵》（「紅衛兵造反司令部」機關報）和《工農兵戰報》。由《工農兵戰報》

¹⁷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65。

¹⁸同註 17，頁 66。

¹⁹同註 17，頁 69。

²⁰〈誰敢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堅決鎮壓！本市駐軍誓作革命造反派堅強後盾〉，《新聞報道》第 29 號第 1 版，1967 年 1 月 29 日。

改爲《山城戰報》重新發行。²¹

重慶駐軍在政治立場上肯定「八一五」派，並動員兩千名指戰員武裝遊行，以及協助「革聯會」創辦新刊物以壯聲勢。不過此時因爲局勢粗定，剛成爲新秩序的「革聯會」機關報《新重慶報》不允許亂發雜音，周孜仁所在的言論組也就沒有發揮作用。既然「革聯會」有了《山城戰報》做爲另一個發聲管道，總後勤部的軍官社長又指名編輯部由重大和師專的人員爲主²²，自然將遭投閒置散的周孜仁延請來委以文字編輯的重任。

周孜仁成爲當權派的筆桿子，當時不懂得「最高權力機構」必須要透過政策法令與政治手腕（包括輿論）來平衡各階級、階層、各社會勢力、各個利益集團的矛盾，乃至於衝突，使其平衡且和諧²³，卻是反其道而行，在創刊號寫出如〈八一縱隊一命嗚呼 二四二「紅總」壽終正寢/難兄難弟 一樣下場〉嘲諷之：

馳名山城的「反右」急先鋒西師八·三一和後字二四二「紅總」等自二月「反右」、「反革聯會」以來，苦心經營三十餘天不能奏效，卻把老本輸得精光，終於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屆時垮台。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悲乎！惜乎！²⁴

另外還有〈借問瘟君欲何往 紙船明燭照天燒/三司駐渝總站十大罪狀〉，文中細數「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所犯的「十大罪狀」：**1.破壞大聯合。2.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3.結黨營私，搞革命小聯合。4.惡毒攻擊革聯會。5.攻擊、破壞無產階級專政。6.破壞革命的「三結合」。7.運動群眾，在山城製造混亂。8.攻擊、中傷革命左派組織。9.破壞「抓革命，促生產」。10.假借名義，招搖撞騙。**²⁵也許周孜仁與「八一五」派奪權太過順利而得意忘形，且始終認爲敵人未完全消亡，繼續成篇累牘的攻擊特定派系，企圖維持壓倒一切、偏頗又片面的派性高姿態，最終只會成爲眾人反撲的對象。用中共的話語體系來說，也許用知識份子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病」來形容較爲貼切。

²¹同註 17，頁 99。

²²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99。

²³同註 22，頁 101。

²⁴《山城戰報》創刊號第 3 版，1967 年 3 月 14 日。

²⁵同註 24。

五、充版面的文章：陳里寧的狂人日記

周孜仁曾稱《山城戰報》有著筆力雄健的文字編輯群，亦有畫板樣、定字體、字型大小的技術編輯，還有負責畫報頭、題花、漫畫、標題提字的版畫教授，又在專業印刷廠印刷。總而言之，他評價這是在版面安排、版式、質量、字體多樣性、美術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專業水準的報刊。²⁶

但是，由於「八一五」派掌握的「革聯會」受到敵對勢力的反撲，《山城戰報》突然刊登了陳里寧的長篇連載文章〈狂人日記〉²⁷。該文〈編者按〉介紹到：這是陳里寧同志的日記、信件和有關材料。以鐵的事實控訴了劉、鄧反動路線對革命同志實行反革命專政的滔天罪行²⁸。周孜仁對此文的評價是「這個長篇日記非常玄乎，真假莫辨……其實，這篇奇文我壓根兒就沒看過，刊登它唯一的好處就是它長。在編輯部思想混亂、不知何云的時候，用這種文字垃圾佔領版面實在是最佳選擇：既符合大方向，又不用向讀者表明自己對現實問題的態度。」²⁹這種不負責任的編輯態度，與周所聲稱的編輯專業水準大相逕庭，形成強烈的反諷。

六、其他「八一五」派群眾的心理狀態

若要探究紅衛兵的心理狀態，及對事後的態度，當天本是受邀嘉賓、卻衝上主席臺搶話筒強行發言的周家喻，時為重慶大學無線電系六八級學生，並擔任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乃重慶「八一五」派的核心人物，他的反思也具有代表性。「文革」結束後，1978年他被以「『四人幫』在四川的代理人、幫派頭子、現行反革命」等罪名遭逮捕監禁。1982年1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判決書上有四項罪名：「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當他出獄後，周孜仁向他問起心境，周家喻說：關進去了，也就沒

²⁶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102。

²⁷《山城戰報》第七、八、九、十期，1967年4月6日、4月10日、4月13日、4月16日。因《新編紅衛兵資料 III》未能完全收錄《山城戰報》所有期號，現存僅有上述四期刊載此文。

²⁸《山城戰報》第七期第1版，1967年4月6日。

²⁹同註26，頁124。

有了任何慾念，也沒有了任何鬥爭了。心境如水。「有點像進度假村」。³⁰

鄭全體，重慶大學採礦系六六期學生，「一二·四事件」中身先士卒，舉著紅旗衝在最前面，帶領隊伍衝上主席臺。鄭在 1967 年 1 月的「一月風暴」奪權運動中，帶著中央辦公廳電報，秘密前往上海緝拿藏身於市委瑞金街招待所的前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要李回四川接受批判，稱「智擒李井泉」事件。後來卻也因為此事件被開除黨籍、公職，心灰意冷，也根本不想回憶過去，只想著現在怎麼賺錢³¹。

包括周孜仁在內，這些曾經的積極份子們，奮不顧身的投入「文革」大潮中，但當各地「革命委員會」成立、秩序漸漸恢復時，這些革命群眾失去了舞台，領導人朝令夕改的態度，使周在事後反省道：

其實神（或聖人）和自己有什麼不同呢？悲劇在於，人們總是要等到完全絕望、等到被神（或聖人）狠狠給一巴掌，這時才會想到該抬起頭來，不再那麼膽怯地審看一下偶像和自己到底有何不同。宣告八一五派政治死刑的「三·一五指示」³²就是這樣的一巴掌。這時候他們才有可能不再那麼戰戰兢兢——不光是對關於自己個人的命運的段落，還包括他們所崇拜和恐懼過的一切——並把聖光完全剝去。以往奉為聖典的所謂首長講話再也不神聖了。人們甚至感覺到他們簡直就在信口開河。³³

沒有了評判對錯的標準、道德評價，缺乏行為規範，北京再也不需要誰來造反或打倒一切了。誰乖乖聽話、誰就是左派，不聽話就是壞人、「黑手」。從 1966 年夏天開始的「文革」，過了兩年後又回到了原點。紅衛兵作為毛澤東時代一個

³⁰同註 26，頁 26。

³¹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27。

³²「三·一五指示」：指 1968 年 3 月 15 日，周恩來等人在接見四川省革籌、成都軍區和五十軍、五十四軍領導人時提到：「主席許多小報都看了。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主席說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塗，還有什麼《嘉陵江上煙雲滾滾》，主席都看了。」毛澤東批「八·一五」派《八一五戰報》的評語，成為「反到底」派的一大利器。

³³同註 31，頁 280。

畸形的政治群落，從被利用到被遺棄，它短若蜉蝣的生命，已經開始消亡。³⁴這是周孜仁對身為紅衛兵小報主編經歷的評語。除了痛斥時代的荒謬，周在 1968 年接受審查時，違心地誣陷了《山城戰報》李乃如是〈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一文的後臺。他在回憶錄表達了懺悔之意：「幾十年後，檢討自己一生行爲，我爲此深感痛悔。如果李先生健在，我願意真心地向他表示我的歉意。」³⁵

第二節 「六大司令部」總勤務組組長李木森（重慶，「反到底」派）

配合 1960 年代的「三線建設」計畫，重慶成爲當時中國的常規兵器生產基地，江陵機器廠負責生產小口徑砲彈。在重慶軍工體系中，建設機床廠、長安機器製造廠、江陵機器廠、望江機器廠爲「反到底」派的組織「軍工井冈山」佔優勢，而 1966 年的李木森 28 歲，是江陵廠技術科的工藝研究所工裝研究室技術員，負責壓鑄炮彈引信上的慢藥盤，並參與工廠文工團演出。

1967 年 5 月底，出任「軍工井冈山」總部勤務組組長，6 月兼任「工總司」勤務組長；8 月中旬，計畫並執行了砲擊、攻占嘉陵江大橋南橋頭。10 月，「工總司」、「農總司」、「機關司令部」、「大專院校司令部」、「中學生司令部」、「文藝界延安兵團總部」等六大司令部成立聯合總勤務組，李木森被推舉爲組長。1968 年 6 月，被推選爲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短暫分管過一段時間的國防工業口。

一、投身「文革」

「文革」發動不久後，軍工系統並未馬上加入革命造反的大潮，工廠職工只是在每天下班後，多了一個小時的政治學習。例如 1966 年 8 月〈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在《人民日報》、《重慶日報》及《武漢晚報》刊登之後，政治學習內容又更增加許多。以當時同在重慶的吳宓爲例，於 8 月 8 日至 12 日，短短 5 天內參與學習「十六條」的活動就達 8 次之多。

³⁴同註 31，頁 295-296。

³⁵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301。

³⁶同年 9 月下旬，江陵機器場動員約 2 千名職工，這也是李木森首次以職工身分實際參加「文革」，任務是阻止「重大八一五」從沙坪壩區通過往江北區的石門大橋。從晚間 8 點半集合至 11 點撤回廠裏，雖然只是在公路上或站或蹲、什麼都沒做，但李還是感到高興和自豪的³⁷。

參加了阻止造反派組織「重大八一五」學生過河的行動後，李木森下定決心，「一定要在黨委領導下積極投身這場運動，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只是當時根本不知道要怎麼把「文革」進行到底，李木森個人不知道、黨支部也心中無數，廠黨委狀況也差不多³⁸。可見雖然密集的學習「十六條」或相關文件精神，工廠職工仍然不清楚「文革」要做什麼。截堵「重大八一五」的行動，還只是聽說他們是聚眾鬧事的暴徒，搞反對共產黨的「匈牙利事件」，而且圍攻打罵革命幹部與革命群眾，所以積極配合上面的指示被動員而已。

11 月下旬，由於技術科黨支部書記張角光無意透露該科人員的「排隊」³⁹名單，李木森自認「我這麼聽黨的話，這麼積極工作和參加政治學習，怎麼把我劃在二類？不管怎樣我也該是一類嘛！」⁴⁰於是自組成立「尖刀戰鬥隊」，後來串聯車間、科室成立「紅軍戰鬥兵團」，這也是李第一個參加的造反組織。隨著串聯形勢大好，江陵機器廠的「紅軍」、「紅旗」、「紅衛」三個兵團聯合組成「軍工造反江陵兵團」，也是江陵廠的第一大造反派組織，擁有近 5 千人。1967 年 1 月，又聯合了長安機器廠、長江電工廠、無線電廠、望江機器廠、建設機床廠、空氣壓縮機場、嘉陵機器廠等，共同成立「軍工造反兵團」總部⁴¹，李僅是總部的工作人員，無其他職務。

1967 年 1 月，在「一月風暴」的影響下，中共重慶市委遭造反派組織奪權，政治呈現真空狀態，正好創造了「革聯會」成為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的有利條件。

³⁶吳宓，《吳宓日記續編》第 7 冊，頁 514-518。

³⁷李木森 回憶，何蜀 整理、註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頁 29。

³⁸同註 37，頁 29。

³⁹當時將群眾從政治上分成四類：一類是依靠對象，二類是團隊對象，三類為批評教育對象，四類是打擊處理對象。

⁴⁰同註 37，頁 31。

⁴¹同註 37，頁 34-35。

2月12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召開成立大會，基於響應毛澤東「造反派聯合奪權」的指示，「軍工造反兵團」也申請加入「革聯會」。根據李木森回憶：「我們軍工造反兵團按照革聯會籌備組的要求，組織了一千人的隊伍前來參加大會。我們身穿整齊的勞保服，胸佩紅底黃字的胸章，……我們一千名軍工戰士，一千雙眼睛望著軍工造反團的大旗在主席臺旁高高飄揚，內心無不感到光榮和自豪。」⁴²

但是由於江陵機器廠另一造反派「八一兵團」有意排擠「軍工造反兵團」，加上「重大八一五」的學生組織基本上把持了「革聯會」、排斥工人群眾的組織，使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西師八·三一」）、重慶交通學院九一五戰鬥團（「交院九·一五」），以及「軍工造反兵團」等組織匯流，成為「砸爛革聯會」的主要力量，後稱為砸派、「反到底」派。李木森稱這是「被推到反革聯會一邊」，似乎是相當被動、無奈的舉動。

二、遭到批鬥

1967年2月，造反派中的「八一五」派掌控「革聯會」，且重慶駐軍54軍明確表態支持，於是迅速發動「二月鎮反」鎮壓異己。從2月底到3月初，「西師八·三一」、「軍工造反兵團」、「交院九·一五」的總部陸續被砸抄，核心負責人員遭逮捕⁴³。李木森說「我們那時候的思想，只知道武鬥是錯誤的，『要用文鬥，不用武鬥』是毛主席的號召，是『十六條』的規定，必須堅決執行。從這一點來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的造反精神確實比不上八一兵團。」筆者以為，李當時是非常無奈、悔恨的，而且是以「遵守規範」的角度來批判敵對派系。另外他想不通的是「一個多月前，我們和八一兵團還是親密的戰友，共同對付工人戰鬥軍，現在，怎麼又變成我李木森站在工人戰鬥軍那樣的位置上了呢？」⁴⁴其實這也不是不好理解，奪權完成之後勢必要進行權力分配，沒有任何組織願意主

⁴²李木森 回憶，何蜀 整理、註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頁 39。

⁴³同註 42，頁 45-46。

⁴⁴同註 42，頁 47。

動將權力與他者共享，能夠獨佔就獨佔，並且不會給予潛在的反對派系有生存空間或任何機會。李木森就在這種情況下被勒令去寫檢查交代，並於 3 月江陵機器廠軍管會所組織的大會上，低頭請罪、接受批鬥。後來還因為在批鬥中彎腰的弧度大，得到「認罪態度最好」的評價⁴⁵。

三、翻身任高位

筆者在第三章有說到，1967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簡稱「紅五條」）下達，使得砸派得以快速翻身、不再挨批。李所屬的派系恢復活動後重新進行串聯，並將「軍工造反兵團」更名爲「軍工井岡山」，5 月 21 日成立新總部。李木森對自己派系的評估是，雖然總人數與「八一兵團」持平，但「軍工井岡山」總部和下屬各團勤務組的工程技術人員多（大學生、大專生、中專生、留蘇學生），文化層次高、活動力強，優於「八一兵團」。隨後因各廠對負責人有些許意見，經人事調整之後，李木森一躍成爲總部一號勤務員。

四、敢於抵制重慶駐軍

1967 年 6 月 8 日，砸派的「軍工井岡山」與「八一五」派的「重大八一五」在重慶施家梁武鬥，「軍工井岡山」縛獲四名 54 軍的軍人，放走三名，關押一名。同月 11 日，解放軍重慶警備司令部向「軍工井岡山」發出一份《公函》，文中稱：「我們嚴正指出，軍工井岡山必須立即釋放連長陳幹清，並對這一事件進行賠禮道歉。……否則，如對我們的勸告置若罔聞，一切後果，由你們完全負責。」公函最後還註明是「抄送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各革命群眾組織」⁴⁶。李木森回憶：「天哪！軍隊向群眾組織發出《公函》，口氣又這樣嚴厲，有心臟病的人一定會被嚇死，無心臟病的人也會被嚇昏，軍隊向群眾組織發出這樣的《公函》，在全川，乃至全國，都是極爲少有的，是不是算一項『史無前例』的紀錄呢？」該派並認爲，重慶駐軍在「支一派壓一派」、故意大造輿論，幫助「八一五」派

⁴⁵李木森 回憶，何蜀 整理、註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頁 48。

⁴⁶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警備司令部，「(67)警司字第 22 號」，《八一五戰報》第廿七期，1967 年 6 月 18 日。

壓制「軍工井岡山」。李木森想著：「造反派一心要『誓死保衛毛主席』，『提著腦袋也要跟著毛主席幹革命』，死都不怕，還怕你警告、威脅、造輿論？」⁴⁷

於是「軍工井岡山」宣傳部在 12 日迅速發表《復函》回應重慶警備司令部，不理會任何要求，並用傳單、大字報把《復函》散布給全市所有革命群眾。沒想到這種作法使「軍工井岡山」一時間聲名大噪、門庭若市，乃至於迅速崛起茁壯。這都是李木森與「軍工井岡山」其他負責幹部始料未及的。在革命群眾報刊方面也對 54 軍副政委藍亦農（後升政委）、副軍長白斌大加撻伐，如砸派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刊物在 7 月 3 日刊登〈藍亦農、白斌回頭是岸〉的文章；7 月 17 日，解放軍後字 242 部隊（重慶後勤工程學院）「紅色造反者總團」發表〈敦促藍亦農、白斌二同志改正錯誤書〉⁴⁸都是「軍工井岡山」《復函》持續發酵後的產物。

除了「《公函》事件」，1967 年 6 月底，屬於砸派的望江機器廠「東方紅公社」阻止前來制止武鬥的 54 軍指戰員從碼頭上岸。為此，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簡稱「省革籌」）用「張、梁、劉、張」⁴⁹四位首長的名義特地向「軍工井岡山」發出指示⁵⁰，要求「軍工井岡山」對望江「東方紅公社」做思想工作，讓軍隊上岸執行制止武鬥的任務。但是，當時武鬥早已結束，「軍工井岡山」總部認定 54 軍另有陰謀，李木森除了懷疑，態度也很消極：

因為我的思想就不通，當然也不可能把鄧長春（按：鄧長春為望江機器廠工人，反到底工總司勤務組常委，軍工井岡山總部負責人）他們的思想工作做通，我也根本沒有打算去做什麼說服工作，僅僅只是當傳話筒傳個話而已。⁵¹

一天之後，「省革籌」副組長張西挺親自打電話和李木森說：

你們軍工總部是怎麼搞的？張、梁、劉、張四位首長的指示你們為什麼不

⁴⁷同註 45，頁 56。

⁴⁸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頁 188。

⁴⁹「張、梁、劉、張」，指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前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挺、前宜賓市委書記張西挺。此四人奉 1967 年 5 月 7 日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籌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張國華任組長，梁興初、張西挺任副組長。

⁵⁰李木森 回憶，何蜀 整理、註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頁 62-63。

⁵¹同註 50，頁 63。

聽？.....我不聽你的解釋，你一定要親自去望江廠，一定要把上岸工作做通，儘快讓解放軍上岸！不然，你們不是什麼很被動的問題，而是要犯很大的錯誤！我不管你們思想通不通，一定要讓解放軍儘快上岸！⁵²

李聽完電話後的想法是：

只准我聽，不准我說，不聽我解釋.....叫我去做工作，那我的工作誰來做？我自己都思想不通，能去做通別人的思想工作嗎？但是不通也得通，這是省革籌首長的指示，也是命令。平常我們都喊「張、梁、劉、張好幹部，敵人反對我擁護」，這時不擁護，能不照辦嗎？我放下電話後想了很久，我不親自下望江廠是不行的。工作是一定要去做，至於能不能夠做通，那我就不管了.....⁵³

最後李木森與鄧長春商議的結果，是讓望江「東方紅公社」兩名持不同意見的代表進行辯論，誰贏了就照哪個意思辦。李「懷著矛盾的心理，既希望同意上岸的觀點辯論贏，好落實省革籌的指示，了結這一事件；又希望反對上岸的觀點贏，因為那才是我們的心裏話.....到底誰贏了好？我也說不清，想不明，只好聽天由命了。」⁵⁴

李木森矛盾的心理，筆者以為這可以反映出造反派普遍的狀態：既反權威、卻又服從權威。他意識到「省革籌」是新生的革命政權，政治正確、理應服從，但 54 軍卻是打壓「軍工井岡山」、支持敵對派系的軍方勢力。倘若辯論會中反對軍隊上岸的觀點獲勝，象徵派性壓倒一切，「省革籌」的指示被忽視，1967 年 6 月 6 日中共中央等發出〈關於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的通令〉：「嚴禁武鬥、行兇打人和搶奪個人財物。對於肇事者、背後挑動者、打人兇手，衛戍部隊和當地駐軍有權逮捕和拘留，依法嚴懲。」⁵⁵該通令權威性被無視。照道理說，

「省革籌」指示和中央通令並不存在執行與否的彈性空間，但「軍工井岡山」卻以辯論的方式去決定要不要執行，這種「彈性」恰好就是「文革」發動之後，舊

⁵²李木森 回憶，何蜀 整理、註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頁 63。

⁵³同註 52，頁 63-64。

⁵⁴同註 52，頁 64-65。

⁵⁵〈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通令〉，中發〔67〕178 號，1967 年 6 月 6 日；引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秩序崩解，新權威尚未完全建立或成爲全社會的共識。此時出現的「自由空間」，既造就了群眾報刊的大鳴大放，又給予群眾組織領導者們無所適從的不確定感。

第三節 《新華工報》編輯魯禮安（武漢，「新華工」）

一、遭到抄家

華中工學院船舶工程系 65 級的魯禮安，與周孜仁同樣有著被抄家的經驗。魯禮安的父母曾在 1942 年左右擔任過漢陽二小、三小教員，雖在 1955 年政治審查通過，確認政治上沒有問題⁵⁶，但在「文革」發動後的 1966 年 9 月，因爲這個疑似在汪精衛政權當過教師的「歷史原因」，被保守派紅衛兵「八一戰鬥隊」、「中南海紅衛兵戰鬥隊」以「汪偽國民黨漢奸魯松茂馬淑芳的住宅實行抄家的革命行動」⁵⁷的名義衝擊，至少被抄家三次，最後家中連棉襖、皮襖、毛衣、綢褂、緞面被褥等稍微值錢一點的衣物都被搜刮一空⁵⁸。魯禮安也被視爲是「黑五類」的「狗崽子」，連同年 11 月華中工學院爲了仿效當年中共紅軍從江西走到陝北延安的壯舉，決定派出長征隊，魯因爲「家庭成份」問題不能成行。後他積極爭取，不惜咬破手指血書「請准許我長征」，才獲得批准⁵⁹。

二、翻身契機

1967 年 1 月，上海「一月奪權」事件所造成的奪權風潮，促使魯在長征途中趕回武漢，此時保守派組織已經潰不成軍，「血統論」也不再被提及，魯禮安及其家人便獲得了一次翻身機會。保守派組織不僅向其父母賠禮道歉，魯本人也獲得「革命小將」、「革命闖將」的稱號⁶⁰。不久後魯被吸收進「紅司新華工」，成爲新華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成員，後調至「新華工報編輯部」當編輯⁶¹。

⁵⁶魯禮安 著、王紹光 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頁 87。

⁵⁷同註 56，頁 85。

⁵⁸同註 56，頁 90。

⁵⁹同註 56，頁 114。

⁶⁰同註 56，頁 143。

⁶¹同註 56，頁 145。

但他在《新華工報》的編輯部工作時間較短，僅短短三個多月⁶²。1967年「一月風暴」開始，武漢地區造反派組織的頭目為爭奪在「奪權」之後的領導權，互不信任、勾心鬥角導致「奪權」迅速流產。但魯禮安並不關心這些，也不習慣依照組織負責人（包括司令、常委、勤務員等名稱）的意志寫「遵命文章」，他只在乎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為革命「吶喊」⁶³。然而因武漢「鋼工總」、「鋼二司」等組織在同年2月8日的《長江日報》發表聲明（「二八聲明」），猛烈抨擊「工造總司」、「新華工」、「新湖大」是「托派」、「分裂主義組織」、「湖北黑省委的第五縱隊」，引起造反派內部一場空前的大論戰。

2月11日，毛審閱〈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修改稿，其中第四條為「各級軍事領導機關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奪權，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衝擊。」⁶⁴而同一天，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正受到造反派中的「鋼工總」、「鋼二司」攻擊⁶⁵。王紹光認為，毛只是想稍微遏制造反派的激進行為，並未失去對其的信任，但武漢軍區的領導人卻會錯意，揣測毛的非激進化政策是想削弱甚至解散造反組織⁶⁶。所以武漢軍區在2月18日發布「嚴正聲明」，批評「二八聲明」以及稱「二八聲明」是「香花」的造反組織，並於隔天在武漢市中心舉行閱兵式以表軍威⁶⁷。

魯禮安的判斷和王紹光非常接近，他說「站在造反派的立場上，我感到對『二八聲明』的批判，已經超出了批判的範圍，演變為對造反派的全面否定。從軍區領導人那些殺氣騰騰的話中，我感覺出對造反派的一次大規模的鎮壓已經開始了。」⁶⁸當北京傳來對譚震林等人的整肅消息（即「二月逆流」），群眾組織領導人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此大環境與魯在《新華工報》編輯部受箝制，不准按自己想法發表文章的際遇相結合，魯禮安最後離開了編輯部，並用李白的詩

⁶²同註 56，頁 145-149。

⁶³魯禮安 著、王紹光 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祿》，頁 147。

⁶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頁 51。

⁶⁵王紹光著，王紅續主譯，《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頁 114。

⁶⁶同註 65，頁 113。

⁶⁷同註 65，頁 114。

⁶⁸同註 63，頁 148。

以表己志：「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⁶⁹

儘管魯禮安和周孜仁同樣都投身於革命群眾報刊的編輯工作，前者感到世局紊亂欲獨善其身，且堅持透過發表文章達成自我實現的理想而不可得，透過自身敏銳的觀察力，毅然決然掛冠而去。1967年3月17日，「鋼工總」近500名成員遭武漢軍區司令部逮捕，幾日後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被命令立即解散，接著「新華工」被指控與「鋼工總」有過勾結，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一個負責人也說，這次運動就是要整你們這些牛鬼蛇神。你們現在表演夠了，該我們表演了⁷⁰。這似乎成為最佳的註腳；後者擔任重慶「八·一五」派極重要的刊物《八一五戰報》主編，沉浸在造反派不可一世的榮光之中，卻是等到自己的大作〈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遭到毛澤東「評價」後才幡然醒悟，兩者的洞察力可謂高下立判。

三、秉筆引禍、自立門戶

魯禮安雖與群眾組織漸行漸遠，但也不忘宣揚自己的一些想法，卻也為自己惹來更大的麻煩。1967年3月，他批判了一篇題為《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文章，文中稱該中學在軍訓團的幫助下，僅用一天的時間就完成全校大聯合，令人難以置信。但該文已被毛澤東肯定，並作出批示「此件似可轉發全國，參照執行」。魯禮安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質疑這是一篇虛假的材料，貼出大字報批判該文。「新華工」組織的領導人緊急為此事開會，討論是否要處理對毛主席不忠的魯禮安⁷¹。

此時魯又批判了一份中央印發的文件《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認為這些人是深受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之毒害，盲目服從上級，而且自首出獄的主要責任不在他們身上，而是在該案背後存在一個極大的陰謀⁷²。同樣的，對中央有所質疑，就是革命意志不堅定的表現，這麼出風頭未來很可能會連累整個組織，於是魯禮安被開除出「新華工」。

⁶⁹同註 63，頁 149。

⁷⁰魯禮安 著、王紹光 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祿》，頁 148。

⁷¹同註 70，頁 150。

⁷²同註 70，頁 153。

不甘於此的魯禮安，自己拉起了隊伍，成立「新華工敢死隊」，且為打響名號，並擊退「二月逆流」與保守派組織的反攻，主張為當時被軍區鎮壓的「鋼工總」翻案，寫了三篇文章：《從阿基米德的一句話談起》、《從阿基米德的一句話繼續談》、《鋼八司是工總翻案不徹底的畸形產物》，肯定「鋼工總」是武漢地區不可或缺的工人群眾組織⁷³。這三篇文章馬上引起極大迴響，各個組織紛紛以大字報或傳單來傳抄，甚至被《新華師報》全文刊登。

四、身陷囹圄

武漢地區造反派在 1967 年「二八聲明」事件後分裂成兩大派，一派為「三新」（新華工、新華農、新湖大，簡稱為「新派」），另一派則為「三鋼」（鋼工總、鋼二司、鋼九·一三，簡稱為「鋼派」）。魯的「新華工敢死隊」雖脫胎自「新華工」，但又被其視為叛徒。所以 1968 年 5 月 16 日，魯禮安在去黃石的路上被「新派」的組織「鐵山聯防」挾持，指責他「反對過毛主席」、「為叛徒集團翻案」，要他交代出黑後台，背負著上述嚴重的罪名，開始了他長達 11 年半的牢獄之災⁷⁴。

魯禮安在獄中才明白，他會身陷囹圄是因為「犯了嚕蘇的毛病」，他當時不懂得要服從、乖乖聽話。他後來也總結自己被關的根本原因：「偉大領袖已經不要你嚕蘇了，明確地警告說『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你聽不進，還要一個勁地嚕蘇，你能不倒楣嗎？」⁷⁵荒謬的年代，使他出獄時他得到這樣的判決書內容：

本院認為魯禮安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分裂群眾，破壞團結，製造散佈反動輿論，危害了黨，危害了人民。現考慮上述問題是在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的影響下出現的，可不以反革命論處。但其支持反革命份子王仁舟帶著受蒙蔽的農民來漢鬧事，在破壞團結，破壞工農業生產和城鄉社會秩序上是有罪的。現本著對過去從寬的精神，特判決如下：免予魯禮安刑

⁷³魯禮安 著、王紹光 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祿》，頁 160。

⁷⁴同註 73，頁 271、284。

⁷⁵同註 73，頁 542。

事處分。⁷⁶

魯禮安看到判決時百感交集，啼笑皆非，「耗費國家無數人力物力財力，將眾多株連者長期關押致使其中許多人精神失常，並殃及數十萬無辜群眾的『欽定大案』」，以「免予刑事處分」結案。他不僅不符，並認為在開展「四大自由」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這類大字報根本不能算是犯罪⁷⁷。

然而魯禮安並不是完全否認自己在「文革」中一點過錯都沒有。他說雖然自己挨過整，也確實傷害過人。例如張體學在華中工學院演說時提到「友軍相遇，打了誤會戰」的觀點，魯秉著「十六條」精神，硬是把張批判一番，並上升到「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高度批，還為此洋洋得意，認為自己的階級覺悟高。現在看來，是要感到內疚的⁷⁸。



⁷⁶同註 73，頁 600。

⁷⁷魯禮安 著、王紹光 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祿》，頁 600。

⁷⁸同註 77，頁 163。

第五章 結論

從 1966 年的下半年至 1968 年秋，革命群眾報刊極為興盛。作為首都北京、國際大都會上海之外，「文革」群眾運動最激烈兩個城市：重慶與武漢，前者有嚴重的血腥大武鬥，後者涉及武漢軍區的「七·二〇事件」，都紛紛誕生自己的革命群眾組織與其報刊，投身滾滾「革命」洪流之中。雖然重慶「八一五」派得到駐軍 54 軍大力支持，最後卻也難逃覆滅的下場；武漢造反派組織力抗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與武漢軍區，也仍遭到取締與勒令解散。在「文革」之中，革命群眾組織不是最後的勝利者，僅僅只是與發動「文革」者的相互為用。也正是詭譎多變的時局，使有心人得以打著革命大旗、攫取政治資本，藉由「文革小報」宣傳自以為掌握的正當性，睥睨一切。以下筆者將就「文革」中的人、事、物等總結本文幾個關懷層面。

第一節 參與者對「文革」的懺悔

不論從「文革」激進運動逐漸落幕的 1968 年，或者官方宣示「文革」結束的 1976 年，將近 40 年來，還是有許多「文革」參與者對當年的所作所為耿耿於懷。不管是寫書、出回憶錄，或是接受記者訪問、開記者會，除了是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一段特殊的紀錄，為時代做見證，也在完成心靈上的救贖。筆者在第一章呈現的，是 14 位中老年人或是自發、或是受到感召，直面當年的過錯。然而其中 6 人在北京，其餘在山東（2 人）、河北、陝西、湖南、福建、安徽、四川（皆為 1 人），除了北京，分布的地理空間十分遼闊，以統計學的概念來說，是具有隨機抽樣的代表性。其中陳小魯、宋彬彬、溫慶福¹，均為所屬學校的「革委會」主任、副主任，對指導該校「文革」運動發展有指標性作用，不可忽視。

報導稱，雖然溫慶福在「文革」中從沒對人動過手，但若看到有學生對老師動粗，他會反感，不敢當面制止，他便「把頭撇開，或者走開」。他稱「因為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誤的，同時怕站錯隊，有壓力。」對於當年深夜帶人

¹ 溫慶福，「文革」發生時為湖南省益陽市三中共青團書記、「革委會」主任。

去逮捕老師張瓊英並抄家的行爲，他反思道：「如果還不道歉，那我們就都太老了，就真的來不及了。」²值得一提的是，在筆者搜集到的革命群眾道歉報導中，僅有落戶陝北余家溝的北京知青王克明、四川涼山自治州西昌高中造反派「地總」紅衛兵楊里克公開承認曾經動手打人³，甚至開槍殺死俘虜⁴。其他人只是反省曾參與批鬥會、抄家等「沒動手打人」的行爲。無論否認是否屬實，鬥爭他人事小，動手打人、殺人，在革命群眾的內心中儼然是難以承受之重。

然而，諸如陳、宋、溫等人雖爲革命群眾組織領導人，其事蹟與反省也見報，仍遠不及回憶錄、日記等記載的詳實。於是筆者選取重慶的周孜仁、李木森，武漢的魯禮安等有出版個人回憶錄的革命群眾作爲第四章的分析重點。以周孜仁爲例，他的回憶錄不僅有當年的日記內容，身爲革命群眾報刊編輯的他，也深知群眾組織內部決策的過程，以及中央文件、領導人指示、當下發生的時事如何引導革命群眾報刊的報導走向。

周孜仁在「文革」爆發後，曾至北京「告狀」。在北京期間他感受到了「文革」的肅殺氣息以及許多不理性行爲。在回到四川老家後，他見到的是被抄家後的舊宅，當時雖感家中的冷清，但隨即糾正了自己的想法：「大革命嘛，不打破一些鑊鑊罐罐怎麼行呢？」⁵然而經過許多年，他在父母過世之後卻「默默祝禱老人的亡靈在遠方安息，我總要痛徹詛咒自己的自私和卑賤。」⁶顯然他在內心深處並未完全用「政治正確」說服自己，因此浮現了這樣的悲痛情緒與反省。

當重慶市造反派取得勝利、成功奪權之後，周孜仁出任重慶臨時最高權力機關「革聯會」的《山城戰報》編輯，並且快速對曾經的政治盟友一造反派中的砸

² 〈趟過 45 年的心靈救贖〉，《瀟湘晨報》A05 版，2013 年 7 月 27 日。

³ 王克明，〈我打谷志有〉，《炎黃春秋》2008 年第 5 期；
<http://www.yhcqw.com/html/qlj/2008/531/08531143618BAKBJ25998F3F2A1JDBH6954.html>，
檢索日期：2013/9/4。

⁴ 劉霄，〈文革武鬥懺悔者：當年開槍殺人是爲了掩飾膽怯〉，《廉政瞭望》2014 年第 7 期；
<http://news.sina.com.cn/c/2014-04-01/115129839855.shtml>，新浪網，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8 日。

⁵ 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21。

⁶ 同註 5，頁 22。

派（「西師八·三一」、後字二四二「紅總」）作出攻擊⁷，並細數「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的十大罪狀⁸（因「首都三司」以首都紅衛兵的高姿態自居，又支持砸派），如此企圖壓倒一切的態勢，最後卻因 1968 年的「三·一五指示」，「八一五」派一夕之間從天堂掉到地獄。周孜仁才發覺，原來以前奉為圭臬的首長講話，在神聖的光芒落盡之後，竟然僅是一句又一句的信口開河⁹。他對「文革」除了反思也有歉疚，他當年誣陷李乃如是〈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一文的後臺，回憶錄中針對此事說到：「幾十年後，檢討自己一生行為，我為此深感痛悔。如果李先生健在，我願意真心地向他表示我的歉意。」¹⁰

不同於擅長文字工作的周孜仁，李木森擔任造反派中砸派（後稱「反到底」派）的領導核心，並規劃、執行 1967 年 8 月砲擊、攻占嘉陵江大橋南橋頭的軍事行動。面對砲擊後一片破敗的景象，「這些都給我『勝利者』的心頭蒙上了一層陰影。當時搞起武鬥來，一心只想到『為毛主席而戰』，子彈、砲彈不長眼睛，自己要是被打死了就當『烈士』，哪裏會去多想可能給社會造成的損失呢？」¹¹也許與周孜仁類似的「政治優先」心理，李當時想大不了就成為「烈士」，其餘的事情就不是那麼重要。

在 1967 年 6 月底的阻止解放軍上岸事件期間，李木森出現了派性與首長指示之間的思想鬥爭。一方面堅持己方站在「政治正確」的制高點，對支持「八一五」派的重慶駐軍多有怨懟，一方面又受制於中發〔67〕178 號文件（〈關於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的通令〉）與「省革籌」的權威，「懷著矛盾的心理，既希望同意上岸的觀點辯論贏，好落實省革籌的指示，了結這一事件；又希望反對上岸的觀點贏，因為那才是我們的心裏話……到底誰贏了好？我也說不清，想不明，只好聽天由命了。」¹²最終還是非常不情願的屈服於政治壓力之下。

⁷《山城戰報》創刊號第 3 版，1967 年 3 月 14 日。

⁸同註 7。

⁹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 280。

¹⁰同註 9，頁 301。

¹¹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頁 89。

¹²同註 11，頁 64-65。

武漢的魯禮安也曾任造反派組織刊物（《新華工》）的編輯，不過因為當北京傳來對譚震林等人的整肅消息（即 1967 年「二月逆流」），群眾組織領導人如驚弓之鳥，卻又彼此鬥爭，惶惶不可終日。如此險惡的外部環境，與魯在《新華工報》編輯部受箝制，不想依照組織負責人的意志寫「遵命文章」，又不准按自己思路為「革命」吶喊抒懷，魯禮安選擇離開了編輯部。

筆者觀察到，周、李、魯三人在「文革」期間都會有高度的政治參與感，相信「革命」大潮中能有一番作為，並且是符合「政治正確」的。只是並不理解瞬息萬變的高層政治動向，使他們的努力、理想一一破滅，甚至懷疑這場「革命」發起的正當性。事後的追悔與反思，他們開始關懷與悲憫自己與週遭人、事、物的境遇，就已經代表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革命」的意義。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中共定義的報刊功能

筆者在第二章提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馬克思與列寧，都曾對新聞媒體提出自己的見解。馬克思認為唯有書報檢查制度廢除，並用法律加以保障，才有真正的言論自由。而報刊應該辦成「人民報刊」¹³，貼近人民的日常生活與情感，並且存在監督政府、討論公眾議題等職責，使社會更加完善。對於「黨報」，恩格斯用「民主集中制」的觀點來解釋，意即在黨內可以廣泛、充分討論具體的問題，但不涉及質疑黨的意識型態路線¹⁴，加上捍衛黨的理念與駁斥敵對政黨的論斷¹⁵，防止社會主義理論遭到曲解。從「人民報刊」變成「黨報」，所謂的「自由」就已經是有限度的自由。

列寧締造了全世界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捍衛社會主義祖國不遺餘力，包括出版自由也僅僅給共產黨所認可的特定政黨或公民團體¹⁶，並非國內所有政治組織都能夠擁有。列寧稱這是暫時性的手段，黨要為減少乃至完全取消這

¹³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上冊，頁 352。

¹⁴ 楊開煌，〈社會主義新聞自由之評析〉，收錄於《台大新聞論壇》第一卷第二期，頁 4。

¹⁵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四卷，頁 300。

¹⁶ 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頁 372。

些手段而努力¹⁷。換言之，在階級敵人以及對立的孟什維克派仍存在，爲了統一思想，言論管控制度就必須存在。列寧較馬克思更進一步的是，他認爲「報紙應當成爲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寫作者一定要參加到各個黨組織中去。出版社和發行所、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營業所，都應當成爲黨的機構，向黨報告工作情況。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注視這一切工作，監督這一切工作。」¹⁸黨要更加全面的掌控輿論，使媒體貫徹黨的意志。

相較於馬、恩、列，毛澤東對言論自由就更加毫不諱言的表示：「對待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等必須實行獨裁、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權。」¹⁹自此，言論自由的有或無，就在於身分是「人民」還是「敵人」。

自中共建政之後至「文革」前夕，對報刊的管控愈加嚴格，例如對報刊的名稱、出版地點、發行對象、性質與內容、編輯方針、領導機關與負責人、編輯人員簡歷、出版頻率、每期出版頁數與份數、發行範圍、預訂和零售比例等，都需經由當地黨委向上級黨委宣傳部報告，最後呈請中宣部批准。特別是省市以上的報紙及主要雜誌，發行份數皆要經過中宣部審核、出版總署通知執行，未經批准不得自行增加發行份數²⁰。1954年7月〈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²¹更是具有指標性意義。該決議強調報紙須加強四個要點：理論宣傳、黨的生活重大問題的宣傳、經濟宣傳、國際問題的宣傳。明確規定報刊具體的報導主旋律，無疑也是限縮報刊自由發刊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到了「文革」爆發之際，革命群眾引用毛澤東在1957年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肯定「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指示。雖然僅是認可大字報，但筆者以爲，這已經是從理論上獲得能出版以紙張爲載體的宣傳物，在沒

¹⁷ 《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二分冊，頁42。

¹⁸ 〈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列寧全集》第二版第十二卷，頁93。

¹⁹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1364。

²⁰ 〈中共中央關於報刊發行問題的指示〉，1952年12月；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中卷，頁231。

²¹ 〈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1954年7月17日；同註20，頁320-322。

有明令禁止的情況下，「文革小報」的出版空間自然也在其中。在文革最初的 1966 年 6 月，毛澤東也認為「學生不讀書了，半年之內我看不讀書，最活的是讀報紙。」²²既然毛都肯定讀報紙比讀書更有益，群眾對報紙的重視程度也就日益增加。隔年 1 月，毛更是肯定「文革小報」的積極性：「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要大量轉載紅衛兵報的文章，我們的報紙很死。許多事情宣傳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²³正面肯定了小報的宣傳作用遠勝於黨報與宣傳部門。

面對「文革小報」的欣欣向榮，中共中央在 1967 年 3 月和 5 月分別發出〈關於各省市自治區報紙的幾項意見〉、〈關於改進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企圖給革命群眾報刊設下一些限制，然而成效不彰。原因在於，經過 1967 年的「一月風暴」之後，重慶雖然成立了臨時最高權力機關「革聯會」，卻遭造反派的「八·一五」派把持，另一造反派「砸派」根本不認同它的權威性；而武漢的革命群眾聯合組織「紅代會」，遲至 1968 年 1 月份才成立²⁴。中共地方黨委遭到奪權，新的革命政權不被廣泛認可或成立時間晚，使中央下達的命令缺乏督促革命群眾組織遵守的力量，群眾也可以選擇性的加以解釋。王紹光稱：

在「文革」期間，當中央的號召過於籠統時，各省的幫派就會或是陽奉陰違，或是根據其自身的最佳利益來解釋它們。如果中央的指示極為具體，尤其是當中央決定否定這個或那個團體時，那麼，幾乎沒有人敢對中央決定的正確性產生懷疑。²⁵

中央下達的意思過於籠統，以 1967 年 5 月 16 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就（「紅五條」）是很好的例子，重慶的「八一五」派、「砸」派都認為自己獲得中央支持、是勝利者，甚至舉辦大遊行慶祝；中央的指示非常具

²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 593。

²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 30；1967 年 1 月 10 日。

²⁴ 王紹光 著、燕青山 等譯，《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 182。

²⁵ 同註 24，頁 145。

體，則可以用《八一五戰報》刊載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評四川時局〉遭毛澤東批判、周恩來轉述，後被點名成爲五大「毒草」之一。

對於同樣的中央首長講話，同一地的兩派群眾也有著不同理解。1967年7月江青肯定了「文攻武衛」的口號，重慶「八·一五」派的周孜仁對日益惡化的武鬥感到憂心忡忡，「反到底」派（原稱「砸」派）的李木森對此沒太多印象，甚至認爲無論有沒有江青的講話，武鬥同樣都會發展起來，否定了「文攻武衛」口號的促進作用。

除了對中央下達指示的解釋不同之外，重慶、武漢的「文革小報」雖然都有許多篇幅都在批判地方黨委或其領導人，但筆者發現重慶和武漢對於批判地方領導人時，呈現出來的，分別是「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模式的不同。重慶的革命群眾組織在1967年「紅五條」下達以後，才開始鋪天蓋地批判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在此之前未有明目張膽批判地方領導人的行爲。武漢的情況與重慶相反，在1966年11月之前，北京中央並未大張旗鼓點名批判原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但群眾已經先行一步，開始稱王爲「湖北省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此說法在11月18日獲得關鋒、戚本禹的認可，顯然這是中央文革小組在等待地方群眾揭發王任重的錯誤之後才做的表態。

重慶、武漢兩地雖有相異之處，卻也有共同點，例如武漢、重慶的小報有互相聲援的現象。1967年《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下達不久的四天後，武漢《革命造反報》刊登當地組織發起批判李井泉的批鬥大會報導。同年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重慶「八·一五」派馬上舉行聲援武漢造反派組織的示威遊行。兩地消息互通速度極快，除了和四川與湖北是鄰近省份，有著地緣關係，也代表革命群眾相當注意各自的動態。

再者，兩地皆有給軍隊領導人冠上綽號的習慣。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發生，譚震林被塑造爲反對「文革」的典型人物，武漢的《革命造反報》（《武漢鋼二司》）亦在同年6月8日、6月22日、7月12日共三期上發表6篇挖掘「武

老譚」(武漢地區的譚震林)式人物的文章。重慶的情況是，同年5月「紅五條」下達，重慶「砸」派誓要與「山城趙永夫」(54軍領導人)血戰到底²⁶。不論是「武老譚」或「山城趙永夫」，皆為揪典型人物的一貫作法。

第三節 革命群眾報刊對於「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

筆者所見最早開始研究革命群眾報刊的學者印紅標，總結了「小報」的特性：

1966年夏秋至1968年秋季小報的興旺，是「文化大革命」所特有的現象，而不是「新聞自由」、政治民主的表現。實際上，小報不享有報道、評論的自由，不能發表獨立的不同政治見解。小報的興旺也不是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實踐，因為小報必須服從「文化大革命」發動者、領導者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任其掌握小報的政治方向和生殺之權。小報的出版發行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特殊形式，特殊之處在於：一方面小報是大字報的延伸，另一方面它不像「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被規定為一般的「大民主」形式，可以經常地運用，而僅僅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兩年，在允許群眾造反組織活動的一段時間內才被允許存在的。²⁷

筆者對印文有著不同的看法，以下分成幾點陳述作為最後總結：

一、關於「新聞自由」

從本文第二章以及第五章可知，「文革」發生時，中共對於新聞媒體管控能力的弱化，使得「文革小報」一一興起，其報導題材、出版頻率、每期出版頁數與份數、發行範圍等都無須同級黨委或上級黨委審批即可出刊，沒有書報檢查制度，真正實現了馬克思「人民報刊」的理念，享有的自由程度是中共建政以來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言論自由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否定中共既有的意識形態。

二、發表不同的政治見解

文化大革命是以「革命」作為號召興起的政治運動，也是唯一的中心思想。雖然「文革小報」們也服膺「革命」的理念，但對於中央領導人(含機關)的指

²⁶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160-161。

²⁷印紅標，〈文革中的群眾組織小報〉，《新聞與傳播研究》1992年第1期，頁154-155。

示、地方權力如何重組、領導人過去的言行、各個革命群眾組織的作為與政治態度等，都具有一定的發言權，或褒或貶，不一而足。

三、小報的存廢與群眾組織的關係

前面筆者也說到，小報的創刊或停刊，完全依照各個群眾組織的需要調整，地方權力機關並無強制干涉報刊的能力。雖有如武漢軍區一時間強制取締群眾組織，但要隨時恢復其所報的報刊也不是難事。即使到群眾運動逐漸冷卻消亡的 1968 年，各個報刊也是自動停刊，並非「革委會」強制下的結果。筆者未見到關於小報只可以辦 2 年時間的相關規定或是中共領導人談話，小報作為群眾組織的機關報或喉舌，群眾組織興起它就起、消亡它就亡，「文革小報」對群眾組織存在高度依存關係。

四、結語

中國新聞史向來將「文革」作為新聞發展的空白時期或破壞期，甚少有著作提及此時段的新聞事業發展。革命群眾報刊可謂橫空出世的「亂世奇觀」，體現著除了中共高層領導人與地方草根人物之外，地方層級集體意識的塑造與認知。從第三章筆者整理的表三可知，武漢地區現存期數最多的三大群眾報刊來看，批判中央地方領導人、機關黨委，以及其他敵對群眾組織，幾乎是最重要的主題，出現像〈討陳專刊〉（《新華工》）、〈打倒陳再道〉（《新湖大》）等連篇累牘的系列文章，一再衝擊中共領導人的威信，被稱為破壞期似乎也不為過，也象徵著當時群眾熱衷鬥爭黨政要員。

從史料價值來看，革命群眾報刊，這種來自底層社會的史料蒐集困難，並且紙張歷時已久難以保存。筆者能夠輕易獲得，實賴宋永毅、周院等研究者費心的編纂整理才有今天的面貌。革命群眾報刊也更大程度展現了基層群眾的生活面貌與當時人們關懷的事物，儘管大多數是批判的言論，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從中共黨史研究的意義觀之，本研究不僅僅是「文革史」（政治史與社會史）的範疇，更是橫跨中國新聞史的空白領域，描述了關於中國 1960 年代報刊出版的新局面與新氣象，反映基層群眾有了自己掌握的傳媒，更能傳達出他們所想要

說的話語。

除了上述所說，本文也存在著一些缺點。首先還是史料的問題。宋永毅等人儘可能的蒐羅全中國各種鉛版印刷的「文革小報」，經複印之後整理出版，但也難免有所遺漏，例如武漢地區重要的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之刊物幾乎不存，以及油印小報未能收錄其中。第二，重慶與武漢作為當代中國西南、中南地區的重鎮，卻也因只選取兩座城市，代表性不夠廣泛。未來應朝向中國各省市所有留存的「文革小報」做一次更全面性的研究與歸納。

回歸歷史本身對人們的影響，可能是磨難、痛苦，也可能是欣喜、愉悅等其他各種五花八門的回憶。今日得以逐漸解構中共官方壟斷的「文革」詮釋，打破禁區，加入基層群眾的觀點，重新塑造集體記憶，才能使中華民族徹底反省這個發生在近 50 年前那場驚天動地、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文化大革命。



表四 重慶武鬥大事紀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6.6.21	重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被定位為黑幫並停職	
6.22	《重慶日報》點名批判鄭思群。工作組 300 人進駐重慶大學，「抓鄭思群黑幫」	組長為副市長余躍澤為組長、政委為五十四軍副政委鍾池、副組長為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崔成禮
7.1	穆欣，〈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紅旗》雜誌。批判重慶市委第一書記、重慶市長任白戈	首位尚未被撤銷職務、所在地區黨組織與上級領導皆不知情下，突然遭到公開批判
7.6	《重慶日報》刊載此文	
8.2	鄭思群自殺身亡	1.工作組鬥黑幫過激造成領導幹部非正常死亡，引發師生與工作組對立，率先向市委造反。 2.重大造反派人數眾多，為運動初期稀有的多數造反派。
8.8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8.1-8.12）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即「十六條」，首次提出「武鬥」 8.9 重慶日報 1-2 版刊出
8.13	重大學生周孜仁起草《致全市大專院校革命同志的一封公開信》	
8.14	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載於重慶日報	
8.15	重大反工作組派+重慶師專（排砲、輕騎） V.S. 重慶師專文革籌	1.師專工人支持重大學生，成為日後「工人造反軍」（朱登明） 2.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辛易之出面調停無果
	八一五事件後，重慶市委發出四點指示	「四點指示」被視為「鎮壓群眾運動」的「黑指示」，遭到批判
8 月下旬	造反派（重大八一五戰鬥團）、保皇派（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群眾、基層群眾）成形	
8.17	毛澤東《砲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砲打司令部」、「砲打司令員」、「引火燒身」口號興起
8.18	北京召開慶祝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毛澤東首次檢閱紅衛兵	
8.20	重慶文革首次散發傳單	重大造反派所為
8.24	重慶各大專院校成立「毛澤東思想赤衛軍」 重慶醫學院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紅五類教職工為主的官辦群眾組織，主要負責人：王遠舉、李傳芳、李長春、梁經權 紅五類學生(幹部子女)為主

8.25	重慶市委召開「炮轟市委」會議 重大赤衛軍召開批鬥校黨委宣傳副部長鄧時澤、校團書書記劉稚民的大會	西南局宣傳部長劉文珍到會講話 奉旨造反，鄧、劉二人在6月時已經被定性為「鄭思群黑幫」，並在《重慶日報》點名批判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6.8.26	造反派「重大八一五戰鬥團」成立	主要負責人：吳慶學、黃順義、周家喻、熊代富、秦安全、查正理、蔡增華
8.27	中共重慶市委主動召開大專院校革命師生代表會議 重大毛澤東思想赤衛軍在市體育場舉行誓師大會	號召革命左派「集中火力炮轟市委」。李井泉到會講話，宣佈將任白戈罷官。 赤衛軍負責人：王遠學、李傳芳、李長春、梁經權
8.28	八一五戰鬥團至江北區「宣傳『十六條』」，張貼《集中火力，炮轟市委》大字報，受到江北區教師的阻撓而發生衝突	毛的《炮打司令部》作為高級機密卻向基層幹部、群眾封鎖；反右運動的前車之鑑，不敢真的炮轟黨組織
8.31	重慶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聯絡站在重慶醫學院會議室成立	
9.1	重慶市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成立	西南局宣傳部長劉文珍促成
9.3	西南師範學院成立「八三一戰鬥縱隊」 重大赤衛軍將前黨委副書記宋殿賓、其妻張道臻、鄧時澤(校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正榮(無線電系黨總支副書記)、賀學洪(冶金系黨總支副書記)、王德倫(教務處副處長)抓回重大批鬥	造反派，與重大八一五對立。負責人：岳朝亮、羊衍海、李盛龍、胡繼澤、張闖、周德英、周榮 首開醜化、武鬥領導幹部的先例
9.5	重大八一五戰鬥團赴北京告狀	
9.6	北京國關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傳單《特急號外》	
9.8	毛澤東主義(思想)紅衛兵總部成立； 劉桂蘭，〈向解放軍學習，永遠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士〉，《重慶日報》	紅五類學生(幹部子女)為主，政委為劉桂蘭，總指揮李長春。54軍軍長韋統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門任輔導員 宣告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政治綱領
9.9	〈向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電〉、社論〈向英雄的紅衛兵致敬〉，《重慶日報》	鼓勵「送子參軍」
9.11	留渝重大八一五成員發表傳單《重慶反革命大反撲的宣言書》，澄清828慘案	
9.16	劉文珍斷絕中學生紅衛兵的物質供應、撤出市委聯絡員	

9.20	重慶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中學生紅衛兵被迫合併，改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9.21《重慶日報》刊登	又稱為「思想兵」。負責人：總指揮李長春、政委劉桂蘭、副政委兼糾察總隊政委及組織部長孟軍、副總指揮李傳芳、副總指揮沈誠、常委王桂香、王大慶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6.9.24	中學生紅衛兵靜坐抗議，反對合併，並有八項要求	9.27 上京告狀、10.6 抵達。重慶市第一個全市性的造反派群眾組織：重慶市中學紅衛兵
9.29	「外地赴渝 45 院校八二八事件聯合調查團赴京匯報小組」，〈關於重慶八二八事件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報告〉	支持八一五戰鬥團
10 月	中央工作會議	劉少奇、鄧小平都作了檢查，各級領導幹部被迫「轉彎子」，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為大勢所趨。
12.4	「一二·四」大會，為全中國大規模武鬥開端	保守派工人戰鬥軍（原工人糾察隊）在重慶市體育場召開誓師大會，官方組建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文藝革命軍等「保皇四軍」齊聚，造反派重大八一五鬧場，場外發生武鬥，兩派大肆打、砸、搶、抄、抓
12.5	上午，重慶市文聯文革小組舉行「一二·四」烈士追悼會 下午，造反派在體育場舉行控訴大會	羅廣斌、楊益言領導。指稱工揪打死造反派 斷言造反派被打死了人，刊在《八一五戰報》創刊號(1966.12.9)、第二期(1966.12.18) 保守派反擊上述謠言，但十分無力
12.8	造反派八一五派的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致全市人民一封信》	對抓人問題做出七點決定 刊於《紅巖》第 4 期(1966.12.22)
12.17	首都三司誓師大會	三司紅衛兵、羅廣斌、陳伯達肯定「一二·四」事件中「工揪打死造反派」。 重慶工人糾察隊赴京告狀團駐地遭首都造反派查抄
12.25	召開批判《重慶日報》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重慶日報編委、報道組長沈世鳴，發言《戳穿重慶市委操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黑幕》
1967.1.1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紅旗》社論 《重慶日報》因被造反派奪權，從 1967 年元旦起停刊，改出《新聞報道》	
1.12	西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1005 團、赤衛軍解散	
1.17-18	重慶市印製一廠、七廠遭造反派奪權	查抄赤衛軍的《赤衛軍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紅衛兵》報

1.22	《人民日報》社論：「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捲全中國，震動全世界。」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 1.21 晚上廣播。象徵「一月奪權」風暴開始，全面奪權。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7.1.23	《八一五戰報》特刊第六號：「『八一五』革命派必須『大亂』」 ※響應 1966.8.23 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主要問題是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亂它幾個月。堅決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呢！《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社論，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運動；提倡文鬥，不要武鬥。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抓出來，驚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	自「十二·四」事件後，重慶造反派(八一五隊派)內部對如何對代工糾、如何對待被懷疑為烈士的屍體、是否召開「一·四大會」、羅廣斌問題、對重慶駐軍評價，就有很大爭論。
1.26	42 個群眾組織在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開會，商討奪權後的掌權事宜	
1.29	重慶造反派群眾和解放軍駐渝部隊指戰員 30 多萬人在市體育場舉行「大聯合大奪權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	宣佈造反派已在解放軍支持下奪取了重慶市黨政機關一切權力，並將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書記處書記魯大東、辛易之、孫先余、廖蘇華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劉文珍等揪到會場批鬥示眾。
1.30	〈山城革命造反派掌權黑市委完蛋〉，《重慶報道》	
2.8	李井泉，《關於我在重慶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的檢查》 重慶市革聯會正式成立	造反派組織聯合發表《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公告》，負責行使黨政財文大權，號召繼續奪權
2.19	市革聯會在市中區珊瑚壩集會批鬥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魯大東	
2.23	八一五派組織人馬抄砸了設於市總工會的工人造反軍總部	
3.26	54 軍致革聯會公函：「原保守派組織的鬥爭大方向是錯誤的。他們是李井泉通過原市委一	刊載於 1967.3.31 《重大八一五》第二 2 號

	手炮製的。.....目前保守派組織中的某些少數人員企圖重新恢復組織，我們是堅決不贊成，不支持的」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7.3.31	重慶市委、市人委機關革命造反總部在人民大禮堂召開了批鬥任白戈大會	屬於革聯會派
4月初	重慶井岡山紅衛兵成立	反對革聯會，重師附中、重慶三中六七戰鬥團、一中紅衛兵、六中紅衛兵、重大紅巖公社，6/1改組為重大井岡山公社。(砸派、反到底)
4.4	《關於四川宜賓地委劉結挺等平反的通知》	認定劉結挺、張西挺是堅持黨的原則的好同志
5.7	《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	「紅十條」，撤銷李井泉西南局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一政委。 成立四川省革籌小組，張國華（成都軍區第一政委）為組長，梁興初（成都軍區司令員）、劉結挺（前宜賓地委書記）為副組長。
5.14	〈中共中央關於改進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	8. 依照中共中央領導人指示，以及「兩報一刊」的社論和評論進行宣傳。 9. 中共中央領導人講話、內部文件、會議紀錄，不得擅自刊登印發。 10. 不得公開發表反對人民解放軍的文章和報導。 11. 嚴格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 12. 報導內容突出政治，不搞庸俗低級。 13. 對國際問題的發言權集中於中央。 甲、不輕信和傳播政治謠言。
5.16	《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	「紅五條」，批劉鄧李任，將前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任白戈定為走資派 成立重慶市革籌小組，藍亦農（54軍副政委）為組長，白斌（54軍副軍長）為副組長
5月下旬	因「紅五條」另建革籌組，重慶市革聯會成為八一五派統一指揮機構	各區縣革聯會更名為「捍衛紅色政權指揮部」（或聯合總部），八一五派指揮武鬥的專門機關
5.22	〈立即制止武鬥〉，《人民日報》	
5.23	石油技工學校武鬥	
5.24	河運學校航鋒戰鬥團（砸派）、石油學校大慶公社（八一五派）武鬥	八一五派死 1 人
5.26	54軍致電成都軍區、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	毛批示 54軍工作做的不錯。八一五派對此大肆宣揚，砸派卻仍認定 54軍領導人是「帶槍的劉鄧路線」

6.1	解放軍後字 242 部隊（後勤工程學院）兩派武鬥 重慶發電廠、電力技工學校、楊家坪武鬥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7.6.2	重慶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武鬥 重鋼、嘉陵機器廠、江陵機器廠武鬥	傷數十人
6.3	重慶三中（今南開中學）武鬥	死 1 人
6.5-6.8	「六五—六八事件」，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砸派）、春雷造反兵團（八一五）武鬥	6.8 結束，武鬥並未死人。 重大八一五負責人、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被俘
6.6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通令》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除國家專政機關奉命依法執行逮捕拘留外，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抓人、私設公堂。 2. 各級黨政軍機關的檔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搶奪，竊取和破壞。 3. 國家、集體財產不可侵犯、侵佔、砸搶、破壞。 4. 嚴禁武鬥、行兇打人、打群架、搶奪個人所有的財物。 5. 除國家專政機關奉命依法執行任務外，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對任何團體和個人，進行搜查和抄家。 6. 對肇事者和背後挑動者、打死和打傷人的兇手，衛戍部隊和當地駐軍，有權逮捕和拘留，依法懲處。對於破壞，侵佔和搶奪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和個人財物的，必須追回或按價賠償。對於違犯上述各條的團體，分別情節輕重，在一定的範圍內通報批判。 7. 各革命群眾組織，應執行本通知，並協助衛戍部隊和駐軍進行政治思想工作。
6.9	砸派與重慶駐軍衝突	軍工井岡山（砸派）關押偵查連長陳幹清
6.10	重大八一五建立「衛戍司令部」	下轄專業武鬥隊 301 野戰隊(梁文福)、302 部隊
6.11	解放軍重慶警備司令部發佈「(67)警司字第 22 號」文件公函	
6.12	重慶市革籌組、解放軍重慶警備區聯合通知	禁止武鬥的八條禁令
6.12-6.15	北碚區砸派在西南農學院成立猛虎團	
6.23	八一五派武鬥指揮部攻擊重醫附小，兩派武	小學被燒毀，武鬥中死 4 人，傷百餘人，財產

	鬥	損失 3 萬餘元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7.6.30	反到底派河校航鋒、重醫兵團，《東方欲曉》「六二三」特刊	報導 6.28 重醫兵團烈士追悼會
7.1	重慶印刷工人、二十九中紅一方面軍、六中指揮部（砸派），刊物《小人物》第三期 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武鬥	〈用人民戰爭制止武鬥〉，開始使用「人民戰爭」 使用鋼釘、刺刀、自製燃燒瓶等，死 2 人，傷數十人，附一院門診部全天停診。重慶醫學院 66 級畢業生、反到底派《東方欲曉》報主編于可被鋼釘刺死。
7.5	西師春雷造反兵團（八一五），《春雷》	〈打一場人民戰爭，粉碎反革命復辟逆流〉
7.7	新六中 3211 戰鬥團、27 戰鬥團總指揮部（八一五派）攻擊嘉陵江大橋南橋頭的二輕兵團（砸派）	首次使用步槍，並且有人員死亡。
7.12	反到底派河校航鋒、重醫兵團，〈擦乾眼淚，接過戰旗〉，《東方欲曉》第 12 期	報導 7.4 追悼會
7.13	軍工井岡山望江東方紅公社、重慶井岡山紅衛兵總部（砸派），《井岡山》 砸派改稱「反到底派」	〈人民戰爭救山城〉，「用革命的武裝力量和強大的政治攻勢來制止武鬥」
7.20	武漢「七二〇事件」	
7.21-7.22	中央首長第七次接見河南赴京代表團紀要	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劉建勛等。江青肯定「文攻武衛」
7.25	七二五事件，文攻武衛指揮部（八一五）強攻重慶工業學校的紅巖兵團（反到底派）。	八一五派兩學生（張全興、唐世軒）死亡，為重大在武鬥中最先死難者。 其後全市相繼發生搶劫國防工廠、駐軍武器和彈藥事件，武鬥全面升級。
7.27-7.28	嘉陵機器廠、建設機床廠、望江機器廠軍械庫遭到兩派搶奪。空氣壓縮機場八一五派將坦克開至楊家坪示威	槍、炮、砲彈工廠主由反到底控制；坦克、子彈工廠由八一五控制。駐軍支持八一五，明搶暗送 7.28 重大八一五 301 武鬥隊兩次搶奪沙坪壩區武裝部槍械彈藥
7.28-7.29	市中區、沙坪壩區、江北區、九龍坡區、北碚區武裝部的武器槍枝遭到八一五派數次搶劫	明搶暗送，為全國普遍現象，毛與中央都知情
8.1-8.3	楊家坪武鬥，爭奪建設機床廠、空氣壓縮機廠	建設廠、二十中、三十五中、衛校、財貿八一五派敗退。 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兩死十傷

日期	事件	說明
		空壓場，重大八一五 301 戰鬥隊 3 死 1 傷 8.2 八一五佔領空壓廠，殺害無辜 8 人。 8.2-8.3 建設機床廠火燒謝家灣「彎彎大樓」(建設機床廠職工宿舍)，反到底派進攻該場軍庫多人身亡 建設、空壓廠區武鬥，8.2 起 2 字頭市話全中斷 受武鬥影響 8.5-9 月底《新重慶報》僅供應零售報，停止發送訂戶。交通中斷，物資脫銷
1967.8.3	望江機器廠武鬥隊炮擊重慶軍分區交通艇	艦上 3 名軍人罹難
8.4	楊柳街血案，重慶財貿工人八一五戰鬥團總部遭到反到底派武鬥隊襲擊 8.4-9.9 兩派開始在重慶警備區司令部(54 軍軍部)主持下和談	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學生死亡 6 人、重大學生死 1 人 類似當年「重慶談判」：邊打邊談、針鋒相對
8.5	建設廠清水池武鬥	動用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死 22 人，傷多人
8.8	八八海戰，軍工井岡山望江機器廠東方紅公社金猴戰鬥隊(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艦隊」運送物資給建設機床廠的建設兵團，沿途遭八一五派砲擊 〈死難烈士永垂不朽/重大八一五舉行烈士追悼大會〉，《八一五戰報》第 35 期	24 死、129 傷，沉船 3 艘、打壞 12 艘，長江交通為之中斷 報導 7.29 重大「八一五廣場」追悼會，紀念「七二五事件」死難的學生：張全興、唐世軒
8.11-8.12	重大八一五 301 武鬥隊攻下嘉陵機器廠；反到底派砲轟重慶大學	兩派直接參戰 5、600 人，支援人數上萬，動用槍炮、戰車、坦克，死亡數十人
8.11-8.13	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八一五)攻打交電大樓「完蛋就完蛋」廣播站(反到底)	交電大樓、化工原料公司、針紡公司、數十民宅遭焚毀
8.12-8.13	望江機器廠武鬥隊進攻駐廠部隊指揮部(郭家沱中學)	重慶軍分區參謀長張廷勤和兩名戰士、一名工人死亡
8.14-8.15	反到底派江北指揮部砲擊八一五派六中 3211 戰鬥團駐守的嘉陵江大橋南橋頭，後由反到底派長安機器廠的「六月天兵」攻佔成功。 8.15 重大八一五武鬥隊砲班反擊江陵機器廠反到底派	11 死、多人受傷。市二輕工業局、重慶市六中醫棟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與部分設備燒毀。市委大院由反到底派佔領。 工人兩人、學生一人死亡，傷七人
8.18-8.20	潘家坪武鬥，文攻武衛指揮部(八一五)攻打反到底派司令部—重慶醫學院(重醫兵團)，重慶河運學校(航鋒戰鬥團)，郵電器材廠，潘家坪高幹招待所 8.18-8.19 反到底派繼續砲擊重慶大學	榴彈砲、三七砲、高射機槍、坦克，死上百人(重大八一五 301 戰鬥隊 8 死 7 傷) 各武鬥隊指揮員中，不少是有作戰經驗或受正規軍事訓練的轉業復原軍人

日期	事件	說明
8.20	反到底派在南岸區成立「黃山警備區司令部」	
1967.8.21	中央調查組 30 餘人由成都抵達重慶，陳彬任組長（總參軍務部副部長，少將）	
8.22	反到底派「黃山警備區司令部」向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佔領的南岸區武裝部、區委大樓等地進攻 寬銀幕電影院事件，54 軍 2 死 4 傷	死傷數十人，房屋七棟損毀，抄砸部隊機關企業商店 17 所、民居 34 戶，搶走辦公用具、電訊器材、手錶等 9183 件，糧食 2650 餘公斤 三個持反到底派觀點青年所為
8.25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	
8.27	54 軍副軍長白斌召集兩派各 12 人	傳達中央《關於開展擁軍愛民的號召》
8.28	八一五派攻下北碚歇馬場解放軍總字 424 部隊（通信兵技術學校），反到底派 424 紅聯撤離，八一五派佔領北碚全區。	動用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高射機槍、一二二榴彈砲、迫擊炮、無後座力炮，死傷數十人
8.29	白斌主持召開兩派談判代表預備會 8.29-8.30 兩派在璧山縣、綦江縣搶奪武器	
9.1	兩派達成《關於立即停止武鬥的第一號協議》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響應「擁軍愛民」運動 2.信任中央調查組 3.同意從 9.2 起無條件全面停火 4.將被抓的革命群眾全部釋放 5.禁止向解放軍、駐地、巡邏哨、軍車等檢查或射擊，不准干預解放軍執勤，解放軍指揮機關不准外部人員進駐，解放軍武器、裝備、物資不許侵犯 6.在 9.4 前分點封存一切武器、彈藥、軍用物資 7.恢復生產、保障市場供應
9.5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九五命令）	兩派武鬥規模稍微縮小，轉移到周邊區、縣，但未完全停止，在 1968 年 4 至 8 月再次熱戰
9.6	重慶工人造反軍司令部，《戰惡風》報第二期武鬥中的中間路線	呼籲兩大派迅速停止武鬥，組織力量下鄉搶收、搶種，要求下屬組織支援農業雙搶命令。
9.9	〈我團戰士紛紛報名參加 301 部隊〉，《八一五戰報》第 38 期 〈中央文革辦事組電話指示〉，《八一五戰報》第 38 期	小報歌頌八一五派的專業武鬥隊 301 野戰隊 23 日晨 4 點 20 分，中央文革辦事組給重慶警司來電並要求轉交支革派和反到底派。電文內容是： 根據中央調查團的反映重慶武鬥情況嚴重。

		<p>1.必須立即停止武鬥。希望兩派做到立即停止對一切工廠、學校、商店、街道和居民點進攻和射擊。請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立即停止對空壓廠的進攻，並撤除包圍。</p> <p>2.絕對不允許對防地巡邏哨和軍車射擊。</p> <p>3.雙方立即達成協議並保證切實執行。</p> <p>中央文革辦事組，1967.8.23</p>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7.10.1	〈毛澤東思想的一曲凱歌/記我們身邊的麥賢得一董繼平同志〉，《八一五戰報》第 42 期	小報歌頌重大八一五、618 分團的董繼平
10.7	中央轉發《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	稱「毛主席說，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10.17	重慶市市中區革委會成立	主任高平，副主任郝俊生、薛震魯、王玉峰等 6 人，共 15 人任常委。
10.18	〈踏著烈士的鮮血前進，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團舉行段亞偉等 13 位烈士追悼大會〉，《八一五戰報》第 43 期	報導 10.9 在重大的追悼大會，紀念武鬥以來犧牲的 13 名大學生
10.27	林園血案，解放軍總字 412 部隊（通信兵工程學院）	八一五派學生至反到底派財貿井崗山宣傳隊的表演鬧場，該學院勤務聯開槍攔阻，造成 32 死 53 傷 →部隊向八一五派學生開槍，極為罕見！
10.28	西師 831（反到底派），〈謠言殺不了英雄的猛虎團〉，《紅巖》	自比為中共，將對立派比為「國民黨反動派」 →武鬥得以越打越大的思想根源
11.4	412 部隊紅旗造反團（反到底派），〈不准把猛虎團打成反革命〉，《風展紅旗》第 17 期	
11.25	市革籌發出《關於大、中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	
12.1	周孜仁，〈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一評四川時局〉，《八一五戰報》第 47 期	挺梁興初。與《山城戰報》第 38 期合刊
12.11	望江機器廠武鬥，八一五派佔領全廠	反到底派撤到涪陵
12.18	毛接見謝佩奇為首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談到各地武鬥時說：「要打就打，我主張打。他要打嘛，不是我要打。凡是打得厲害的地方，解決問題比較容易。北京不疼不癢，太文明了。」	

12.24	八一五派春雷造反兵團，《春雷·無產者專刊》第二版，廖少雲，〈接過紅旗，勇敢前進〉	追悼春雷在武鬥中戰死的烈士專號。廖少雲悼念亡夫周虎溪，吳宓認為祭文僅有政治正確。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7.12.26	〈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反復辟鬥爭進行到底—三評四川時局〉，《八一五戰報》第 54 期	劉、張是四川復辟資本主義的元兇。與《山城戰報》第 54 期合刊
12.27	重慶大學革委會成立	
1968.1.12	上海《文匯報》，〈論派性的反動性〉	掀起「圍剿派性」風潮
2.6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令〉（「二六命令」）	將破壞鐵路交通、炸毀橋樑建築、襲擊列車、殺人劫貨等情況視為「反革命的土匪行爲」，解放軍得在其抵抗、逃竄時將其追擊聚殲。
3.15	「三一五指示」，八一五派受挫	周恩來、江青、康生等人接見張國華（成都軍區政委，四川省革籌組組長）、梁興初（成都軍區司令員，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劉結挺（成都軍區副政委，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張西挺（四川省革籌組成員，政工組負責人）、李大章（前四川省省長）、謝家祥（成都軍區副政委，原五十四軍政委）、韋統泰（五十四軍軍長）、藍亦農（五十四軍副政委，重慶市革籌組組長）周說：「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主席說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塗」
3.20	〈關於堅決擁護中央首長「三一五」指示的聲明〉，《八一五戰報》第 60 期	公開承認自 1967 年 10 月以來「打劉、張」口號偏離了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與《山城戰報》第 50 期合刊。
3.22	「楊、余、傅事件」、「三反一粉碎」 嘉陵機器廠制高點被八一五派攻陷	反到底派大糾八一五派的「小爬蟲」、「變色龍」 54 軍繼續默許八一五派「明搶暗送」，反到底派武器大多已上交
3.24	建設機床廠武鬥，八一五派攻佔廠區與周圍高地	死 1 人
3.25	八一五派搶奪江陵機器廠武器，部隊制止無效後開槍 二鋼廠武鬥，反到底派撤離，全廠停產	1 死 6 傷 死十餘人
3.26	嘉陵江南橋頭武鬥 市中區所有燃煤脫銷	3 死，冶金局大樓被焚燬。特園因火災燒毀
3.27	八一五派攻佔反到底派工總司、機關司令部、化工總部（市革籌對面市委院內） 郵電學院武鬥	2 死，抓走數十人 反到底派撤離
4.7	長安機器廠武鬥	全廠停產
4.9	《新重慶報》宣告自 4.11 暫停出版	至 5.15 恢復日出半張(兩版)，只發新華社電訊

4.11	重慶鐵路分局九龍坡機務段武鬥	成渝鐵路一度中斷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8.4.12	電力學校武鬥	實習工廠紅旗電廠煙囪遭炸毀、六棟學生宿舍被燒燬、自備發電機被毀
4.13	長江航運分局武鬥	2 死，朝天門碼頭運輸癱瘓
4.14-4.15	長安機器廠武鬥	3 死，機器、廠房嚴重受損，全廠停產
4.20	《一部迎合右傾翻案風的代表作—評〈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八一五戰報》第 61 期	接續第 60 期，繼續自我批判
4.24	大坪地區八一五派搶奪駐地部隊武器，反到底派搶警備區司令部兩輛運糧專車	
4.27	四二七指示	只在內部傳達、無正式文本。批判重慶反到底派、成都兵團、八二六派，稱其「打謝(謝家祥，成都軍區副政委)反梁(梁興初)」。群眾意識到朝令夕改、出爾反爾，革命熱情消滅。
4.28	八一五派武鬥隊衝擊 351 倉庫、四〇五團，搶走槍枝 長安機器廠辦公大樓失火，重鋼三場反到底派誤傷消防幹警、軍人，9 死 17 傷，23 人被抓，打壞消防車輛 3 輛	周恩來指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搶槍影響戰備與援越抗美 1. 立即停止搶武器 2. 武器全部交回 3. 公開承認錯誤
4.29	周恩來致電張國華，要求處理 4.28 兩件事，否則按「九五命令」、「二六命令」辦	張國華、劉結挺、張西挺、韋統泰、藍亦農向在北京的「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兩派代表傳達指示，要求馬上落實
4.30	八一五派八個單位武鬥隊到駐軍上繳武器並作檢查	
5.2	重慶警備區司令部重申「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周恩來 4 月兩次指示，命令 5.7 將武器彈藥全部上繳、解散武鬥組織	
5.4	重大八一五迅速響應「五二通告」，決定 5.12 前把武器彈藥、爆破器材、軍事物資上交警備區，並解散一切武衛組織 〈周總理指示〉，《八一五戰報》第 62 期	《八一五戰報》第 62 期。 兩派專業武鬥隊（武衛組織）陸續解散。 〈周總理指示〉為 1968.04.28 指示張、梁內容
5.31	四川省革委會成立	主任張國華，副主任梁興初、張西挺等 重慶「反到底派」的省革委會常委：鄧長春（反到底工總司）、王興國（反到底紅大司） 重慶八一五派的省革委會常委：陳萬明（八一五工總部）、周家喻（八一五紅警區）
6.2	重慶市革委會成立	主任藍亦農，副主任白斌

	<p>成立大會上，二輕兵團抬屍衝擊主席台</p> <p>《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七千萬四川人民在前進——熱烈歡呼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p>	<p>「反到底派」副主任：黃廉、李木森（兩人皆屬反到底工總司）</p> <p>「八一五派」副主任：袁金梁（八一五工總部）、熊代富（重大八一五）</p> <p>反到底派市委常委：汪友根（反到底工總司）、蔣良知（反到底農總司）、徐光明（反到底井岡山紅衛兵）、雷中伍（反到底紅中司）</p> <p>八一五派市委常委：方文正（八一五八一兵團）、韓榮華（財貿八一五）、趙行貴（八一五農聯會）、段德昌（八一五機關總部）</p>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8.6.6	重慶市革委會，《關於維護革命新秩序的若干問題的決定》	解散武鬥組織、召回武鬥人員、拆除工事，6/12下午6點以前將軍火武器上繳
6.7	兩派在七星崗重慶市雜技團的砲聲隆廣播站槍戰	八一五派死一人 兩派人員厭棄文革政治原則，結成不講派姓、而講江湖義氣和個人利害關係的「兄弟夥」。
6.12-6.13	反到底派猛虎團、八一五派北碚捍紅總部在北碚第十三中、百貨大樓、新華書局等地武鬥	猛虎團負責人王樹良等共六人身亡
6.30	市革委、重慶警備部聯合發出通令，嚴禁武鬥	
6.30-7.1	長江電工廠武鬥	八一五派佔領全廠，運走大批子彈
6.30-7.2	建設機床廠武鬥	八一五派佔領全廠，運走大批槍枝
6.30-7.2	空氣壓縮機廠武鬥	八一五派攻佔全廠
7.3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布告》，七三布告	對廣西大規模武鬥嚴厲譴責，定性為反革命事件
7.6	江北大石壩地區武鬥，江陵機器廠等地遭砲擊	7.11 達成停火協議，但 7.12 武鬥重起
7.7-7.9	大坪地區武鬥	八一五派攻佔後字 242 部隊、煤炭設計院、地質部第二普查大隊、重慶醫學院、其附屬第一醫院 後字 242 部隊紅總負責人張龍寶身亡
7 月上旬	大坪、楊家坪武鬥	群眾傷亡慘重，兩路口至楊家坪無軌電車線網損毀，全線停車一年餘。
7.9-7.12	江陵機器廠武鬥	傷亡多人，八一五派攻佔全廠，並戒嚴、清鄉
7.16	八一五派及其他群眾組織武鬥隊在成渝鐵路線隆昌石燕橋、李市鎮、安富鎮搶劫軍火	周恩來聞訊電告張國華，認定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按「七三」布告辦事
7.17-7.18	交通學院武鬥	八一五派攻佔全校，實行戒嚴、清鄉

7.24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布告》，七二四布告	譴責陝西武鬥，定性「極為嚴重的反革命事件」
日期	事件	說明
1968.7.27	毛下令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	應清華 414 派請求，毛派工宣隊進駐清華，支持蒯大富用武力解決 414 派的問題，統一清華
7.28	毛「四不方針」，接見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象徵文革群眾組織的終結。	不干預政策：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毛希望他所支持的「左派」能以武力強行征服對立派，故要軍隊不要干預
8.5	〈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紀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兩週年〉，《人民日報》	不再發揚造反精神，暗示群眾組織的存在就是「另立中心」
10.12-10.31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會議	劉少奇遭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批判資產階級的「多中心論」
10.15	重慶市革委會舉行「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撤銷總部，掀起鬥、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	兩派即日起撤銷各自的總部
10.18	《重慶日報》頭版報導「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在鬥批改中立新功，本市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剷平山頭撤銷總部」	
12.22	《人民日報》發表毛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1969.1.3	重慶市革委會辦事組、政工組通知 【市革委第四次常委(擴大)會議決定】	1/8 前撤銷各系統總部與兩派大聯委、1/30 前上報經費、帳冊、物資、資料文件。 重慶市各級群眾組織基本上全部撤銷
11.17	四川省革委會發出通知，明確要求「全省所有的群眾的組織所辦的小報、刊物和有線廣播(站)一律撤銷」	
11.26	54 軍移防滇西，13 軍調重慶	「熱烈歡迎十三軍光榮進入四川和重慶大會」 大田灣體育場。 武鬥形式改為革委會及其所屬機構的刑訊逼供

筆者根據《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渝中區卷》、《重慶市志》整理而成

參考文獻

一、專書與學位論文

《一九六七匪情年報（十七年來匪情總覽）》，臺北：匪情研究雜誌社，1967。

《一九六八匪情年報》上、下冊，臺北：匪情研究雜誌社，1968。

《一九六九匪情年報》上、下冊，臺北：匪情研究雜誌社，1969。

《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二版。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二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中共北碚區委黨史研究室 著，《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北碚區卷》，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

中共江北區委黨史研究室 著，《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江北區卷》，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

中共沙坪壩區委黨史研究室 著，《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沙坪壩區卷》，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

中共渝中區委黨史研究室 著，《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渝中區卷》，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 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冊，北京，1988年10月。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中國共產黨四川省組織史資料》（1949-1987），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中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

- 方漢奇 等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三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 《毛澤東年譜》（1949-1976）共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王力，《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第二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
-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王家平，《紅衛兵詩歌研究》，臺北：五南出版社，2002。
- 王紹光 著，王紅續 主譯，《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 王紹光 著，燕青山 等譯，《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 王曉嵐，《中國共產黨報刊發行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 史實 編著，《文革中的檢討書》，臺北：時英出版社，2011。
- 白承旭 著、延光錫 譯，《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新竹市：交大出版社，2014。
- 《列寧全集》第二版第十二卷、第卅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
- 行政院新聞局 編，《中國大陸大眾傳播事業及其管理概況》，臺北：新聞局，民 93。
- 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臺北：正中，1994。
-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2010。
- 余仁，〈略論今日之四五運動〉，《四五論壇》第六期（北京：《四五論壇》編輯部，1979年2月25日）；轉引自《大陸地下刊物彙編（第一輯）》，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80，頁36。
-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 吳宓 著、吳學昭 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續編》第七冊（1965-1966）、第八冊（1967-1968）、第九冊（1969-1971），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 宋永毅 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下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 宋永毅(Yongyi Song)編，《新編紅衛兵資料Ⅲ》，Oakton, VA :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2007。
- 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
- 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台北：新銳文創，2012。
- 周院(Yuan Zhou) 編，《新編紅衛兵資料Ⅰ》，Oakton, VA :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1999。
- 林蘊暉，《國史札記：事件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 《武漢市志》大事志、新聞志、總類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1991，1998。
-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 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 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 編，《重慶市志》，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
- 重慶市沙坪壩區志編纂委員會 編，《重慶市沙坪壩區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重慶報業志編纂委員會，《重慶市志·報業志》，重慶市：重慶出版社，2000。
-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革命：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上冊、第二卷、第四卷、第六卷、第十四卷、

- 第卅八卷、第卅九卷、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5。
- 張化、蘇采青 主編，《回首「文革」》上、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 啓蒙社 莫建豪，〈啓蒙社宣言〉，1978年11月24日，原載於《情報專報》第十輯（67年）頁9-11；轉引自 劉勝驥，《北京之春（1978-1979）》（臺北：幼獅文化，1984），頁60。
- 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
- 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8。
- 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7。
- 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 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六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
- 葉言都，《臺海分治初期兩岸報業之比較分析（1949-1958）》，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9年12月。
- 鄒讜 著，甘陽 編、何高潮 等譯，《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 劉青峰 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
- 魯禮安 著、王紹光 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下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 羅金義、鄭文龍 編，《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1997。
-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 著，王笑歌 譯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共三卷，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2。
-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rick MacFarquhar)、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 著，關心 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台北：左岸文化，2009。
-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編，俞金堯 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二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二、 期刊論文

- 王克明，〈我打谷志有〉，《炎黃春秋》2008年第5期，頁64-67。
- 王家平，〈紅衛兵小報及其詩歌的基本型態〉，《文藝爭鳴》2000年第6期，吉林：文藝爭鳴雜誌社，2000年，頁4-9。
- 古陽木，〈紅衛兵小報興亡錄—中國報刊史上的亂世奇觀〉，《炎黃春秋》1994年03期，炎黃春秋雜誌社，1994年，頁40-49。
- 印紅標，〈文革中的群眾組織小報〉，《新聞與傳播研究》1992年第1期，頁146-162。
- 吳怡慧，〈製作毛澤東—以紅衛兵小報為研究中心(1966-1968)〉，《史苑》第70期，臺北：輔仁大學歷史系系學會，2010年7月，頁157-207。
- 宋曉丹，〈《武漢晚報》的誕生〉，《武漢文史資料》2012年第9期（武漢：武漢文史資料雜誌編輯部，2012，頁59。
- 李斯頤，〈也談建國初期私營傳媒消亡的原因〉，《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6卷第3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2009年。
- 郭若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小報」文獻及其研究價值〉，《黨史研究與教學》

2007年第5期(總第198期),福州: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省中共黨史學會,2007年,頁9-13。

曾憲明,〈解放初期大陸私營報業消亡過程的歷史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2期,北京:新聞與傳播研究編輯部,2002年,頁71-79。

賀吉元,〈「文革」小報——運動初期的亂世奇觀〉,《黨史博采(紀實)》2009年第4期,石家莊: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黨史學會,2009年,頁49-52。

賀吉元,〈「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報紙〉,《文史博覽》2005年07期,長沙:文史博覽雜誌社,2005年,頁38-41。

楊開煌,〈社會主義新聞自由之評析〉,收錄於《台大新聞論壇》第一卷第二期,頁1-28。

楊擊,〈文革小報《新復旦》和《復旦戰報》出版情況和話語方式初探〉,《新聞大學》2011年第2期 總108期,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頁108-112。

劉伯勤,〈鄭重道歉〉,《炎黃春秋》,2013年第6期,總第255期,頁83。

樊星,〈「文革」小報也算一種啓蒙〉,《粵海風》2010年第6期,廣州:廣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2010年,頁74-75。

三、報刊

《武漢晚報》,1966年7月-1966年12月。

《長江日報》,1967年1月-1968年12月。

《重慶日報》,1966年6月1日-1966年12月31日。

《重慶日報》,1968.6.2-1968年12月31日。

《新重慶報》,1967年2月1日-1968年6月1日。

《新聞報道》(重慶),1967年1月1日-1月31日。

四、多媒體資源

人民日報

大公網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

中國青年報

中國新聞週刊

南方周末

南方網

廉政瞭望

新京報

新浪網

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

瀟湘晨報

